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2
第3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2年9月 第3期(总第95期) 第24卷
Sept.2022 No.3 Sum.95 Vol.24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二年九月第三期（总第九十五期）第二十四卷

云南省首家州市中华文化学院 ——红河中华文化学院揭牌成立

云南省首家州市中华文化学院——红河中华文化学院近日在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揭牌成立。当天还举行了座谈会和中华文化讲座。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中华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副院长陈友康，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揭牌活动。活动由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态强主持。何云葵和朱毅共同为“红河中华文化学院”揭牌。



红河州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是云南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前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区位优势明显。红河州社院加挂红河中华文化学院牌子，是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和红河州共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红河大地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和实践，是红河州社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云南省委印发《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有关要求的具体行动。

会议强调，红河中华文化学院要坚持以《条例》和《实施细则》为遵循，充分挖掘红河文化资源，利用区位优势，开展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为建设新时代团结进步美丽红河而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何云葵代表云南中华文化学院对红河中华文化学院揭牌表示热烈祝贺，并提出三点希望：一要坚持“社院姓社”，努力把红河中华文化学院打造成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高地；二要突出红河特色，努力把红河中华文化学院打造成开展中华文化教育、研究、对外交流的文化阵地；三要注重联谊交友，努力把红河中华文化学院打造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交流园地。



陈友康教授作《中华文化精神与文化自信》专题讲座。为红河中华文化学院开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第一课。

省社院文化交流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红河州委州政府相关部门、红河州社院（红河中华文化学院）相关领导及教研人员、红河州社院中青班部分学员参加活动。

（供稿：云南中华文化学院诸芳、王璐 责编：李亚强）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2年第3期(总第95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罗建生

诸 芳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杨松禄

副 主 任:罗 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念兴昌 刘林华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与辩证向度 陈 曦, 许翔杰 (5)
- 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刘树升 (11)
- 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 李晶燕, 邓青州, 杨 丽 (17)
- 新的社会阶层双重性特征与政治引领分析 段 华 (23)
-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贵州地下党统战工作实践与当代启示 沈 港 (29)

● 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研究 杨喻童, 罗发洋, 周俊华 (38)
- 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以浙江省 X 县“请你来协商”中的“加梯”议题为例 徐伟安, 郑功帅 (47)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三种形态 王新红, 张 翠 (52)
- 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问题和进路研究 王 俊 (57)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实施路径研究
——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个案 罗成雁 (64)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6*2022-03]

●文化建设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笔谈

…………… 李勇刚, 樊泳涓, 卢光盛, 王燕飞, 尹子能, 王卫东, 杨松禄, 尹未仙 (72)

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诠释及译介方法略论 …………… 李志凌 (81)

塑造优良家风视域下的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研究 …………… 张昊雷, 宋青璐 (89)

●发展问题研究

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

——基于贵州省的调查数据 …………… 胡彬彬, 齐昕 (96)

新乡贤“告老还乡”: 动力、困境及实现路径 …………… 费婷 (106)

图书馆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有效服务路径研究

——以红河州为例 …………… 李炜 (113)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2, 2022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To Intensify the Logic and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People's Solidarity and the United Front
..... Chen Xi, Xu Xiangjie(5)
-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Ca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 Liu Shusheng(11)
- Practice, Predica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Constructing New Link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Lines in Yunnan Li Jingyan, Deng Qingzhou, Yang Li(17)
- Analysis of the Duality of and Political Guidance on New Social Strata Duan Hua(23)
- The CPC's Underground Work with the United Front in Guizhou during the Wartime of Liber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day Shen Gang(29)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Modern Management

- Study of the CPC-Directed Neo-Mod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 Yang Yutong, Luo Fayang, Zhou Junhua(38)
- The County-Level CPPCC's Influential Ways to Funda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emplified by the Proposal of "Elevator-Addi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oject of "Consultation
Invited" Held by County X in Zhejiang Province Xu Weian, Zheng Gongshuai(47)

Forging the Chinese People's Awareness of Community

- Three Types of Working Discourse Used for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 Wang Xinhong, Zhang Cui(52)
- Practice, Problems and Progress of Promoting National Lingua Franca in Region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Wang Jun(57)
-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Visual-Image-Building Project to Forge People's Awareness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Luo Chengyan(64)

Cultural Advancement

- Notes 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Spirit Li Yonggang, Fan Yongmei,
Lu Guangsheng, Wang Yanfei, Yin Zineng, Wang Weidong, Yang Songlu, Yin Weixian(72)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Proverbs and the Medio-translation Approaches
..... Li Zhiling(81)
- Forging Good Family Culture: A Study Inspired by the Household Tradition of "Offering Better Foster for
Brother's Child" in the Liang Dynasty Zhang Haolei, Song Qinglu(89)

Issues of Development

- Analysis of Living Condition's Influence on Social Credi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about Guizhou Province
..... Hu Binbin, Qi Xin(96)
- New Forms of Excellent Countrymen's Retiring to Hometown: Motivation, Dilemma and Practice
..... Fei Ting(106)
- Approaches for Effective Function of Libraries in Public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 Case of Honghe Prefecture Li Wei(113)

统战理论与实践

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的 内在逻辑与辩证向度

陈曦, 许翔杰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 杨浦区 200433)

摘要: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关系密切、相互促进。从历史逻辑上看,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 从内在联系上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同的宏伟目标,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共同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是共有的理论根源, 争取人心汇聚力量是共同的本质要求; 从辩证向度上看, 爱国统一战线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载体,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 中华儿女大团结; 爱国统一战线; 历史逻辑; 辩证向度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3-0001-0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指明不断巩固和发展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伟力的力量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①。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之际,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共创美好新时代的政治宣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论述, 厘清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 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逻辑: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历史关联性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致力于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一)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其“从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团结联合其他阶级阶层的战略思想, 赋予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使命”^②。抗日战争期间, 毛泽东呼吁“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③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包括一切抗日的各个阶级

作者简介: 陈曦,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 许翔杰,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② 中央统战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为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凝心聚力》,《人民日报》2021年8月25日,第11版。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阶层和各个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发展“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①，包括了广大海外侨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超过400万的海外侨胞为抗战捐款捐物，数万名侨胞参加抗战，在抗战最艰难时候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志愿回国参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提出“联合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展卓有成效的军事统战工作，傅作义、高树勋、曾泽生、吴化文等人纷纷起义投诚；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影响下，汇聚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重新集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广泛团结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有志青年，把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转送到解放区；邀请华侨代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海外侨领作为“团体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到人民解放事业和协商建国的序幕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摆在爱国统一战线的突出位置，强调“团结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③；改革开放后，爱国统一战线成员范围不断扩大，由“大陆内”向“大陆外”拓展，更多的海外华侨归国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广大港澳侨商率先在华投资兴业，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港澳侨商投资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海外投资的60%以上。由此可见，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

（二）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时代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更加注重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等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要加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指出“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④。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而“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不仅仅是爱国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直接体现，也是广大中华儿女实现梦想的强大动力，也是“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在具体工作中的直接体现，也是“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将他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2016年至2020年，民族八省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4203元增长到10770元，增长达156%”^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春苗行动”为180个国家的数百万海外侨胞、留学人员接种疫苗，不断完善远程医疗平台为侨胞提供在线服务。当前，我国虽然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但是国家综合国力提升明显，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这些都离不开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齐心协力和共同奋斗。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中华儿女大团结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不仅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时代主题，也是爱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新中国统一战线五十年大事年表》，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④ 刘维涛、王尧：《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14年6月7日，第1版。

⑤ 姜洁、李昌禹：《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人民日报》2021年8月26日，第4版。

国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

二、内在联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内在一致性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两者关系密切，具有内在一致性，表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同的宏伟目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共同的政治引领，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是共有的理论根源，争取人心汇聚力量是共同的本质要求。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同的宏伟目标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始终被摆在重要位置，它因党而生，伴党而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①，其从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抵御侵略、振兴中华，到解放战争时期创建和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布“五一口号”，加强新政协的筹备力量，组织起草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领导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发展，都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2020年底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统一战线”被确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③。中国近现代180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中华儿女觉醒的历史，是无数中华儿女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牺牲的历史。在抵御外来侵略和实现人民解放中，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振兴中华出钱出力；在建设人民国家和推进改革开放中，广大中华儿女“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④，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心和动力。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共同的政治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历史，在倡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⑤。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也是经历模糊到澄清的过程，其从与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性和关键性，认识到“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中，“深刻体会到统一战线领导权是原则问题、方向问题”^⑦，因此其在对待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上绝不含糊，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主持研究统一战线各个领域问题，多次强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事实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的鲜明特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⑧。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战线工作原则”部分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主要目的是凝聚起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将广大海外中华儿女的心拢到一起、情聚到一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而凝聚力量需要凝聚“主心骨”，而这个“主心骨”正是中国共产党。“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37万亿元，增长8.1%，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贡

① 新华社：《过去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优异答卷 现在党带领人民又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解放日报》2021年7月2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③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2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2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⑦ 张博：《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学习时报》2021年3月26日，第2版。

⑧ 本报评论员：《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21年1月6日，第1版。

献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升”^①，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中华儿女的贡献和智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广大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创造的成就。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促使中华儿女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都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

（三）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是共有的理论根源

统一战线既是一个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也是基于理论而开展的实践。恩格斯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②，这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的起源，因此统一战线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团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没有团结，无产阶级事业便不能成功，他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只能通过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取得成功”^③。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内涵很丰富，涵盖了无产阶级团结、党内团结、工农联盟团结、民族团结和国际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是调整富农的政策，在《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宣布调整对待地主的土地政策，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调整对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关系，实行“三三制”，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口号，团结宗教人士共同抗日。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团结思想来指导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的具体举措。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逻辑起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和民族独立是民族间实现真正团结的基础，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不断得到深化。“从‘三个离不开’到‘两个共同’到‘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从逐步成熟到转向深化，党的十八大后，又提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都是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的中国化。

（四）争取人心汇聚力量是共同的本质要求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⑤。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座谈并回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时候，就指出民心向背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民心即为人心。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进程上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四万万同胞”的人心抵御外来侵略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号召打倒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发挥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客观条件上看，团结凝聚最广泛的人心，联合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是实现无产阶级战略目标、最高理想、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统一战线长期存在和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现实条件上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习近

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经济日报》2022年3月14日，第3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③ 赵期玉：《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的观念及现实意义》，沈阳：辽宁大学，2019年，第4页。

④ 陶晶、熊坤新、卓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年第1期，第30页。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①，而把统一战线发展好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争取人心，“统一战线的价值在于凝聚人心”^②。“中华儿女是海内外华人华裔共同的象征，是一种共同的血缘、内在的情感和祖先认同”^③，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用“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来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2021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我国的“春苗行动”“新春暖心包”和加大对因局势动荡而遭遇困难侨胞的帮扶力度，都是温暖海内外中华儿女“人心”的具体行动。同时，2022年6月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又让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表示感到“与荣有焉”。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始终联结在一起。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本质是争取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人心，是团结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华人华侨参与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人心”。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都是为了争取人心、汇聚力量。

三、辩证向度：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相互促进性

在新征程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离不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也离不开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两者息息相关、相互促进。

（一）爱国统一战线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功能载体

爱国统一战线历来被中国共产党所重视，被中国共产党视为“重要法宝”并将其摆在极其重要位置。2020年底，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统一战线”确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不同时期都强调爱国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从功能结构视角出发去思考，爱国统一战线既是一种战略和策略，也是多种功能的整合体。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团结载体，“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它历来要求最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党、团体、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⑤，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协商载体，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爱国统一战线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民主人士协商的“平台”，其将中华儿女的精气神聚合在一起形成“1+1>2”的功能效应。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联谊载体，而联谊交友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功能，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联谊交友有助于扩大统一战线团结阵容，广大中华儿女以爱国统一战线为纽带，通过这个纽带联系起更多的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们”。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统一战线的作用总结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华儿女大团结提供社会参与平台，通过统一战线综合协调功能，能够协调关系，化解隐性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有助于促进社会各个方面发展，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参与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为中华儿女参加国家社会性事务提供了社会参与平台。

（二）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首先，海内外中华儿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梦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

①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② 莫岳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第45—53页。

③ 孙聚成：《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专题“邓小平与中华儿女”卷首语》，《中华儿女》2014年第16期，第12页。

④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3页。

⑤ 尹红：《试论统一战线的结构和功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1页。

共同努力。中国有6000多万海外侨胞广泛分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广大海外侨胞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本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其次,海内外中华儿女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桥梁。进入新时代,在社会结构调整变化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受到外部思潮的影响,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战略选择”^①,海内外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华人华侨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他们是住在国与中国各个领域交流的桥梁。从历史上看,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形象、增进往来、加强合作、深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的征程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最后,海内外中华儿女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力。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经贸合作更加深入,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同时国际局势变化莫测,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这场疫情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世界提交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已深深融入世界各国之中”^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关系密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价值引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效助力。

总而言之,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有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四、结 语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之间关系密切,两者在历史发展、理论逻辑、现实要求等方面实现了历史的统一与融合。爱国统一战线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条件,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实践证明,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征程上,我们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吴桂韩:《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8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日,第3版。

③ 人民日报评论员:《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8日,第1版。

④ 张春旺、李斌斌:《推动华侨华人更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0月23日,第6版。

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99)

摘要: 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问题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必须处理好的迫切问题。调研发现,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面临接班人问题, 其中其子女的接班意愿、经营理念等主观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他们迫切期望党委、政府提供帮助。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多理性务实, 更倾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重视传承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普遍看重实践锻炼这一接班人培养方式, 并重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结合。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我国的教育水平、市场活力、发展空间等较有信心, 多认为子女应该在国内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后, 再去国外求学、考察和培训, 同时他们也充分尊重子女的求学意愿。解决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突出问题, 推动实现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 党委政府要做好教育引导, 推动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发展; 统战部门要各负其责、主动作为; 民营企业家要树立现代企业管理意识, 提前做好规划, 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培养企业“接班人”。

关键词: 民营企业家; 代际传承; “两个健康”发展; 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3-0011-06

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成为我国众多行业的领军人物,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中信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家家族传承白皮书》, 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平均年龄在55~60岁, 他们面临着管理者身份卸任和企业接班人培养的难题。^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企业接班人培养问题更加迫切, 所以笔者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了相关调研, 以了解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助力我国民营企业家顺利完成代际传承。

一、顺利完成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重要性

(一) 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

作者简介: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刊图书资料部编辑,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

^① 黄苏华、李生校: 《转型背景下家族化民营企业破解代际传承难题路径的田野研究——基于越商的访谈案例》,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第88页。

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①这是对民营经济重要性最凝练的概括。他还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②当前，由于经济全球化逆流、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发展方式发生转变、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遭遇阵痛，加上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又面临代际传承问题，导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二代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二代民营企业家成功接班，带领企业平稳过渡，并进一步发展壮大，能够推动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整体经济行稳致远。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助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精力、视野、求知欲、开拓性等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这些正是二代民营企业家的强项。二代民营企业家虽然人生阅历和经营经验不足，但是年富力强，敢闯敢干，学历较高，尤其多具有国际视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二代民营企业家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具有较高的学历学识，对新发展理念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践行意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更高的自觉，对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培育新型消费等有更主动的追求。同时，他们多具有国外留学或考察经历，更加了解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更容易把握国际规则，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更强，更能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顺利实现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促进二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能够有效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迫切要求

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不应只是资本和管理权的传承，更应是企业的优秀制度、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只有这些优秀基因被传承下来，民营企业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核心竞争力，拥有长远发展目标和定力，不断取长补短，开拓创新，做大做强，成为“百年老店”，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民营企业还要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③

（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必然要求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统一战线12个工作范围之一，民营企业家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了解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诉求，帮助其依照法定程序维护合法权益”^④。这些要求涵盖了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方面的工作，如了解民营企业家在代际传承方面的诉求，服务、引导、教育民营企业家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等。因此，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是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重要课题，其牵涉众多统战工作内容，是检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二、山东省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

针对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课题，笔者对山东省79位民营企业家和统战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一些上市民企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在问卷调查对象中，山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有

①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版。

③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版。

④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17页。

62位，他们是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民营企业家人理想信念培训班”和“全省民营企业管理技术代表人士研修班”的学员，是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其企业在各自行业领域内具有较强竞争力和较大市场占有率。企业家身份方面，职业经理人有7位，创业人有47位，二代企业家有8位，创业人和二代企业家合计占比达88.7%，说明受访民营企业家大多面临或已完成代际传承。调研对象还包括17位来自山东全部地级市市委统战部经济科的统战干部，他们对民营经济领域状况比较了解。以上两方面证明本调研样本具有一定典型性，为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研究提供一定参考。通过梳理调研数据，笔者总结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代际传承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

调研数据证明了民营企业接班人问题的普遍性。当问及“是否遇到接班人问题”时，有17位民营企业家回答“遇到”，占比27.4%，比重不是很大。但是在问及“所面临的最大的接班人问题”时，有16位民营企业家回答“子女不愿接班”，有9位回答“两代人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等有冲突”，有6位回答“子女愿意接班但没有能力”，有3位回答“选择哪个子女接班”，有2位回答“子女接班后，创业人没有放权”，有2位回答“企业内部其他管理人员不同意接班人选”，有1位回答“其他问题”。虽然仅有17位民营企业家回答面临接班人问题，但是有39位对面临的具体接班人问题进行了选择，占比高达62.9%，这说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是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只是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所不同。

对统战干部的调研结果更能说明这个问题。17位统战干部中，在回答“所接触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是否面临接班人问题”时，有4位回答“普遍面临”，13位回答“较多面临”，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接班人问题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接班人问题中，“子女不愿接班的问题”比较突出，占比41%。另外，“两代人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存在冲突的问题”占比23.1%。二者合计占比64.1%，说明子女的接班意愿、经营理念等主观方面问题在接班人问题中占据多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年轻人有独立的人生追求。比如在深入访谈中，有的民营企业家表示子女对管理企业不感兴趣，有的民营企业家表示子女有独立的创业意愿和选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两代人沟通交流不足，存在隔膜和抵触心理。

（二）更倾向于发展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当问及企业是否采取家族制时，有48位民营企业家回答“否”，占比高达77.4%。这说明无论是否已经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已不再固守传统的子承父业观念，他们对企业未来的规划更多的是考虑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种考虑一方面反映了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大多具有现代的商业理念和管理思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接班人问题的普遍和复杂。因为无论是选择由子女接班经营企业，还是选择由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都影响深远。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十分慎重，如果子女不愿或不能接班，他们宁愿摒弃传统的家族制，转而采取现代管理制度。

（三）重视传承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在受访民营企业家中，有53位表示企业一直践行新发展理念，占比高达85.5%；剩余9位民营企业家则表示正在努力或计划践行新发展理念。这说明新发展理念在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中深入人心，践行新发展理念是他们的一致选择。

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企业倡导、信奉同时必须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也是企业永续经营、充满活力的内在源泉。调研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受访民营企业家在回答“对民营企业来说，哪方面的传承最重要”这一问题时，有38位选择“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占比高达59.4%；有16位选择“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占比25%；有6位选择“管理权”；仅有4位选择“资产”。在受访统战干部中，分别有9位选择“企业文化和价值

观”和“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有3位选择“资产”，有2位选择“管理权”（见图1）。这说明，在民营企业企业家代表人士和统战干部中，大多数人认为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最重要，他们对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真正价值有较为科学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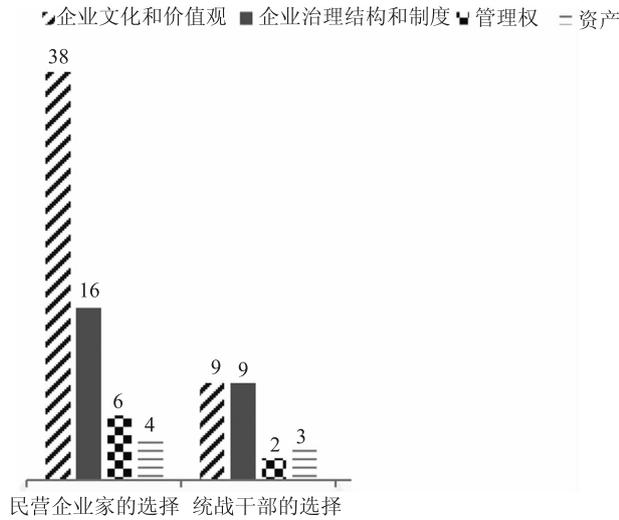


图1 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传承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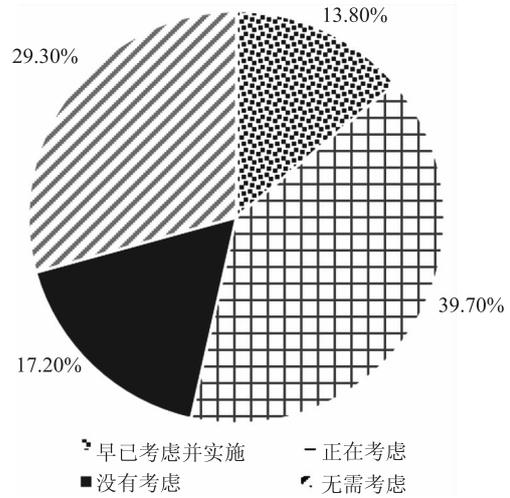


图2 是否有培养接班人的计划

（四）注重理性务实培养企业接班人

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和企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接班人的综合能力。因此，培养接班人至关重要。当问及是否有培养接班人的计划时，有8位民营企业企业家表示早已考虑并实施，占比13.8%；有23位表示正在考虑，占比39.7%；只有10位表示没有考虑，占比17.2%；17位表示还年轻，无需考虑，占比29.3%（见图2）。这表明第一代民营企业企业家非常重视培养接班人。

民营企业企业家最看重的接班人培养方式是什么？受访者中，有23位选择“实践锻炼”，占比高达42.6%；有11位选择“言传身教”，占比20.4%；只有2位选择“学校教育”；有18位选择“以上同等重要”，占比33.3%（见图3）。这说明经历了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的民营企业企业家非常务实，他们普遍看重实践锻炼对接班人成长的促进作用，并重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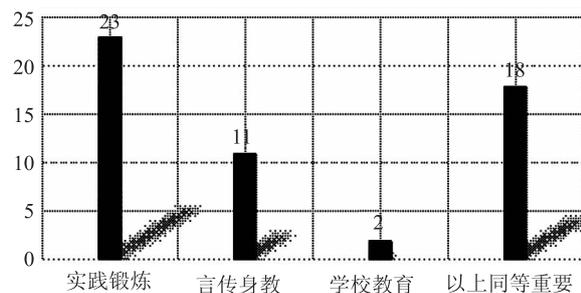


图3 民营企业企业家最看重的培养方式

送子女赴国外留学曾是我国精英家庭教育子女的热门选择，那么民营企业企业家对子女留学的态度如何？受访者中，有44位回答“看子女意愿”，占比高达80%；有4位回答“非常有必要”；有6位回答“没有必要”；有1位回答“随大流”。大多数人尊重子女的留学意愿，一方面说明民营企业家的教育思想开明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民营企业企业家对我国的教育水平、市场活力、发展空间等有了更坚定的自信和更高的预期，他们相信子女在国内学习和历练，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有助于他们更顺利地接班。比如，民营企业企业家说：“要对中国文化有自信，而且国外也不会对我们开放真正高端的技术。”这反映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民营企业家的清醒认知。

另一组数据也可证明这一点。在子女的教育安排方面，有17位民营企业企业家选择“安排工作后，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占比32.1%；有23位选择“在国内读完本科，然后出国留学”，占比43.4%；有7位选择“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分别有2位选择“初中毕业后出国留学”“一直

在国外上学”和“不需要出国”。这说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认为，子女应该先在国内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再去国外求学、考察和培训，以进一步提升学识，开拓视野，锻炼能力。

（五）迫切期望党委、政府提供帮助

前文的调研数据说明：一方面，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多面临代际传承的现实需要，他们非常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另一方面，选择和培养接班人又存在诸多困惑和问题，民营企业家们普遍焦虑。选择子女还是职业经理人经管企业？如何选择接班人？选择后如何培养接班人？如何顺利实现交接班？这些都是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调研中，问及是否希望党委、政府在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方面提供培训、指导等帮助时，有30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十分希望”，占比高达54.5%；21位表示“希望”，占比38.2%；分别只有2位表示“无所谓”和“不希望”。这说明，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在代际传承方面十分焦虑，寻求指导帮助的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十分认可党委、政府的权威性、专业性，十分期待党委、政府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党委政府理应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回应他们的信任和期待。

三、顺利实现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对策建议

（一）党委、政府做好教育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建设

一是做好教育引导。回应民营企业家的期待和诉求，帮助其顺利完成代际传承，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题中应有之义。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抓住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契机，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着重引导民营企业家传承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的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家树立新型财富观念和现代企业治理理念，指导民营企业家提前制订好交接班计划，为企业的平稳过渡和长远发展保驾护航；选择并推出一批成功实现代际传承的民营企业家典型，总结优秀经验，通过纸媒、电视、网络、宣介会等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供其他民营企业家参考借鉴。

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借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契机，大力倡导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和企业制度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队伍，为民营企业家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接班人选，为民营经济发展增添助力，一些地方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值得借鉴。例如，上海市在2005年组建了全国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评价委员会和职业经理人事务所，开展专业化服务，促进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济南市工商联在深入调研后建议，在充分发挥济南市现代职业经理人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的前提下，打造职业经理人市场，成立企业家人才评价专家咨询组，建立科学的企业家人才素质评价体系，以更好地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职业化和制度化。

（二）统战部门各负其责、主动作为

一是党委统战部方面。首先，统战部在必要时应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其次，统战部可与组织部门、经信委、工商联等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制定、推动落实引导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方针政策，如将二代民营企业家教育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总体规划，举办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专题培训班等，并拨付相关专项经费。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青岛市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效探索。再次，统战部可与工商联一起，通过参与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尤其是引领二代民营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二是工商联方面。首先，可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结合的专家讲座等方式，对面临代际传承问题的会员开展教育培训。其次，对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行业协会、商会加强代际传承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再次，支持成立青年企业家商会、协会组织，为二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提供学习、沟

通、交流平台。最后,充分发挥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民营企业和商会制度作用,选择面临代际传承问题的典型民营企业,通过走访、座谈、个别谈心等形式,及时了解企业代际传承方面的具体问题、困难和需求,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三是社会主义学院方面。社会主义学院可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专兼教师结合的方式,开设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相关专题课程,针对“如何选择和培养接班人”“如何顺利实现交接班”“采取哪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题辅导,并结合组织学员交流心得体会、赴样板企业开展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为学员顺利实现代际传承奠定基础。

四是统战智库方面。充分发挥统战智库作用,设置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方面的招标课题,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研究,深入民营企业家群体进行调研,了解代际传承方面的具体问题和诉求,形成一批高质量的资政成果,供党委和政府决策参考。

(三) 创业人树立现代企业管理意识,提前规划,综合培养

一是树立正确认识。企业家的事业成就和人生价值不只取决于给子女和家人留下多少物质财富,更取决于通过打造优秀的企业制度、品牌、文化和价值观,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同理,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更重要的是企业制度、品牌、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如果子女坚决拒绝接班,或完全没有能力接班,就应果断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借代际传承契机,推动企业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明确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权责,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治理规范、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如果固守子承父业观念,一旦接班人不合格,企业很可能发生动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创业人多年奋斗成果将付诸流水。另外,创业人如果确定了合适的接班人,就应在交接班后果断放权,让接班人真正接管企业。即使企业承受短暂的转型阵痛,也是长远发展所必须,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应贪恋权位,对企业运营多做掣肘,这样很可能给企业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当前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两代企业家争斗内耗的问题,尤其需要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重视和警醒。

二是提前做好规划。不管是选择子女、其他亲友接班,还是选择共同创业人、职业经理人接班,都需要提前做好规划,给接班人以充足的时间锻炼成长。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可以主动寻求党委、政府的指导帮助,并与社会专业机构合作,制定科学的接班人选择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避免选择接班人时的“一言九鼎”、过于主观;制定科学的接班人锻炼培养机制,促进接班人顺利成长。

三是运用多种培养方式。这是针对希望子女接班的情形而言。首先,重视学校教育。让子女接受系统完整的学校教育,保证其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然后通过出国留学、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子女的知识素养和眼界。其次,加强实践锻炼。笔者在深入走访中发现,较好实现代际传承的民营企业,其创业人大都较早安排子女进入企业基层各部门锻炼,使其了解企业运营模式、品牌文化、市场行情、人员配备等基本情况,学习业务,锻炼能力,并获得企业高层和员工的好感与支持,之后再逐步提拔,为其提供更大的锻炼平台。实践中也有民营企业家让子女到其他企业工作锻炼,了解其他企业行业状况,学习先进经验,通过比较加深对企业管理的思考,同时也能避免“特殊待遇”。再次,做好言传身教。通过与子女沟通交流等多种方式,以情感的力量、榜样的作用和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摒弃家长制作风,以平等观念了解子女的思想,鼓励子女干事创业、大胆创新,容忍犯错,并及时提供意见建议。对于期望子女接班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综合运用以上培养方式,可以提高子女的接班能力,激发子女的接班热情,助力代际传承的顺利完成。

责任编辑:念兴昌

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 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李晶燕，邓青州，杨 丽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政商关系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志，其既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着党风、政风和社风。笔者从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入手，在分析构建过程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交流沟通机制和相关平台、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规范引导、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协和工商联的作用、加强各类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云南；营商环境；新型政商关系；“两个健康”；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3-0017-06

政商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它不仅关乎营商环境的好坏，而且也是党风、政风和社风的具体体现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云南省是一个边疆民族省份，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占47.3%，具有重要的地位。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

(一) 营商环境正在改善，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基础已基本奠定

2019年以来，云南省开展了全省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建设、全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公布、上线“一部手机办事通”等多项工作，营商环境得到了优化。一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十大行动已经实施。云南把2019年作为“营商环境提升年”，打出“1+10”政策“组合拳”，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和《云南省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通过推出政府服务“六张清单”行动、“放管服”改革“六个一”等十大行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放管服”改革6个行动计划，共实施20条具体措施、调整482项涉及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内容覆盖了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用水用电用气、不动产登记、企业简易注销、通关便利、出口退税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全省社会主义学院（校）重点课题“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2021SYXT21）。

作者简介：李晶燕，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邓青州、杨丽均为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教师。课题组成员还包括吴节、胡艳，均为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等内容,正在逐步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一部手机办事通”的目标,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二是建立了营商环境评价制度。出台了《云南省州(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获得电力、获得用水、获得用气、纳税、跨境贸易(评价有口岸的州、市)、获得信贷、政务服务等10项,建立营商环境“红黑榜”制度,按季度对各州市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并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通报、与全省综合考评挂钩机制、限期整改和帮助解决问题等方式,推进全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三是用心帮群众解决问题。各地均推出了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交通“流动服务”、车驾管“六办”、部分证件核发审验“一次办”、服务“免费办”、出入境证件容缺受理服务、“12367”出入境咨询服务、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群众预约“上门办”、便民利民“马上办”、车驾管“下乡办”、窗口周六周日不休息、对特殊人群开通“绿色通道”等,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服务。

(二) 相关政策已经制定,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已经明确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云南省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已经明确,政商关系的处理有据可依。一是云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已经出台。例如,《云南省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列出了政府主体责任单位的“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强化服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措施》,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了规范。二是部分州市和县市也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昆明市出台《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从优化服务环境、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强化监督执纪三方面提出11条措施;德宏州出台的《德宏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试行)》开列13条“正面清单”和11条“负面清单”,倡导“主动服务”和“红色界线”;保山市出台了《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从培育良好营商环境、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强化执纪监督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楚雄市出台的《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10条措施》《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暂行办法》;富民县出台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施意见》通过督查问效、明纪立规、清风进企系列举措,严厉查处涉企违纪违法案件,助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祥云县从注重思想引导、提升服务水平、严守交往底线等方面,多措并举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三) 构建共识正在达成,逐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制定后,云南省通过各种形式,促进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共识的达成,并努力推进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一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共识正在达成。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融入企业发展。同时,实施“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教育培训百千万工程”,组织民营企业企业家进党校培训。二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云南省工商联与企业家签订了履职承诺书,承诺依法经营、加强自律,严格遵守从商规矩;搭建党委、政府与企业、商会沟通协商的制度化平台;建立云南省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管理信息系统,促进各级各部门改进工作作风等。

(四) 拓展监督渠道,促使政府服务企业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云南省还通过多种形式拓展监督渠道,促进政商关系的改善。一是建立和完善党委、政府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的常态化机制。省、州(市)、县(市、区)党委、政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建立企业评价职能部门制度。省工商联开展云南省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三是建立企业维权机制。制定了《云南省民营企业投诉处理办法》,成立了云南

省民营企业维权委员会，推动建立“政府、工商联、银行、企业”常态化对接机制。省、州（市）和县（市、区）设立民营企业维权投诉中心，构成了三级投诉网络，按照“分级受理，属地管辖”的原则，在解决民营企业投诉事项上形成合力，不断规范投诉事项处理程序。同时，通过投诉统计分析，形成服务“百县百企”的工作机制。四是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政商交往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发现的涉及政商关系的违纪问题线索，交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规严肃查处。五是以民营企业的监督推动政府部门转变工作作风。省工商联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7720 户民营经济代表，对全省 37 个政府职能部门在服务企业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线上与线下评议。对参评企业反映的不作为、乱作为部门，报省级监察部门按照规定予以问责。六是用纪律加强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分内之事，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能职责，监督与鼓励并重，依法依规依纪优化发展环境，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五）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

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优化了营商环境，消除了政商之间的顾虑，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一是消除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的顾虑。各地均要求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及企业时间不少于 2 个月，联系、调研商协会和企业不少于 1000 家（次），建立非公企业政策服务信息清单和企业服务政策包，搭建起集政策解读、项目发布、融资对接等为一体的工商联综合服务大数据平台。领导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和商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消除企业的顾虑，使得政商关系不断改善。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建立掌上办事平台，实现全省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上线 2 年来，实现了政务服务“掌上办”“指尖办”，打造出了政务服务新环境。同时，借助建设银行金融科技优势，深化“办事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现了多个重点领域新突破，将审批事项送到“指尖端”。目前，“办事通”不但能刷脸注册登录，还能运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功能开口办事、刷脸办事，形成了移动端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建行所有网点等多个渠道共通的服务体系，政务服务实现了“就近办、随时办、主题办、跨省办”。以“掌上政务”为代表的“网络政商直通车”为政、商之间的交流沟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政府对企业的服务通过平台完成，消除了企业的顾虑，改善了政商关系。

二、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现实困境

（一）“放管服”改革尚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化

云南省的“放管服”改革虽然已开展多年，但仍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顶层设计尚不完善。云南省“放管服”改革中，职能转变过程还需要做好上下协调。在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数据壁垒，如部门数据库尚待盘活，平台需要整合，政务信息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互认共享尚未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二是实体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地方政务服务大厅面积小，服务人员配置不到位，政务服务事项不集中，政务服务办事指南不清晰，为民服务水平不高。三是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尚待进一步改进。有的地方在线办理事项比例低，网上公布的事项要素不规范，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运行效果不明显。四是综合监管难到位。对“中介超市”的综合监管主要有审查中介机构法人资格、企业信用管理、价格检查等，在价格监管上办法不多，事后跟踪督查不到位，较难有力约束中介机构。由于信用监管难以及时、准确反映中介机构的履约情况，导致收费、服务质量和时限等方面的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五是“放管服”改革监管中难度仍然较大。监管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区域宽、任务重的现实情况，监管人员的设施配备、人员状况等条件仍未达到要求，市场监管难度仍然较大。

（二）清而不亲，基层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

由于对新型政商关系理解不到位，基层普遍存在“矫枉过正”“清而不亲”的现象。一是由“勾肩搭背”变成“背靠着背”。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执行的偏差，出现了“清而不亲”和“背靠着背”的新倾向。虽然企业对公接待费用明显减少，但部分干部在主动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办事周期等方面也没有积极性了；虽然门难进、脸难看现象有所好转，但事难办现象并没有根绝，主要是办事程序多、政策落实难、服务手段新但贴合度低；减少审批备案事项还落实不到位，存在形式上的备案、实质上的审批问题。同时，由于不少政府官员选择“明哲保身”，与企业刻意划清界限，导致企业家缺乏谏言陈情途径，还有新官不理或难理旧账等问题，让企业无所适从。二是部分干部为保清白而为官不为。部分基层干部搞不清与企业交往的分寸，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接触企业的想法，干脆舍“亲”而保“清”，求个稳妥。由于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有的干部做起事来很容易畏首畏尾、过度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三）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经常性性和有效性沟通交流机制尚需完善

虽然，云南省已经建立起政商之间的正常沟通机制，但是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私下沟通优先、体制内沟通次之仍是企业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家虽然按照制度进行接触，但仍流于形式，没有解决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民营企业能够通过人代会、政协等沟通渠道反映问题的也只是少数，很多民营企业家仍然采取私下沟通优先、体制内解决放后的办法，通过微信群、QQ群、电子邮箱等形式反映问题的较少。二是司法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的经常性、有效性沟通交流机制尚未完善。省、州（市）和县（市、区）尚未完全建立起司法官员与民营家的沟通机制，已经建立起来的也尚不完善。三是尚未建立起政府官员改革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目前，各地改革攻坚任务繁重，而高压反腐态势不减，一些干部“求稳怕错”，如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将影响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

（四）相关平台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云南省各州市虽然建立了一些政商沟通的平台，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各地的政企沟通平台各自为政，需要进一步规范并加以整合。各地政企沟通平台功能不一，各有特色，有的平台尚不能实现招商引资项目平台代办。二是现有的维权平台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虽然省里有民营企业法律维权委员会和云南省民营企业投诉中心，它们为民营企业维权发挥了作用，但是很多民营企业的维权发生在州（市）和县（市、区），而州（市）和县（市、区）一级的民营企业维权平台还没有完全建立，难以达到为民营企业维权的效果。由于人力有限，这些平台难以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更难以围绕参与地方性立法和政策制定、畅通投诉渠道、开展“法律三进”活动、组织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调解、个案维权等重点开展工作。

（五）各类监督仍然不能放松

云南构建良好的新型政商关系，有关部门也有一定监督的措施。但由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面又相当广，各类监督难以一步完善到位。一是纪检监察部门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专项监督还需进一步加强。二是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监督只是人民政协的监督内容之一，难以做到开展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的目的。而且部分政协委员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难以完成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监督。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力度不够。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虽然已经进行多年，但除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相关人员外，大多数人对此了解不多，也就没有监督的意识，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奖励措施。四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没有完全到位。对于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虽然有一些规定，但在实际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的监督中，“亲”“清”的度不太好把握，也难以监督到位。

三、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优化策略

（一）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放管服”改革不仅可以优化环境，也可以促进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必须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是要落实责任。要正确认识“放管服”改革的难度，突出问题导向，层层落实责任。二是要努力实现“一站式办结”。要努力使分散的审批权向公共行政服务中心集中，使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向网上审批平台集中。要建立审批服务窗口巡查通报制度，实施窗口工作人员年度、季度考核制度。三是要逐步提高网上政务服务比例。启动网上数字证书认证工作，开展网上咨询、网上办理、结果查询、网上诉求等业务在线办理，提高在线办理事项比例。要积极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搭建和应用，逐步实现上级监管平台的对接。要积极开展全流程免费代办，制定代办服务手册、代办窗口服务工作制度、代办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等，形成以制度管人、管事的工作格局。要优化代办流程，为企业提供自企业设立登记至项目落地“一门式”全流程跟踪审批服务，依托并联审批项目目录和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实行代办服务“介入预审”，保障项目审批顺利进行，实现部门审批“互不前置”。四是要提升“中介超市”服务。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监管方法，规范中介超市运行管理。要加强项目挖掘，对照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编制预选取中介服务清单，推进中介服务。五是要健全考核机制。要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明确工作完成时限。将“年度考核”与“日常督查”相结合、“组织考核”与“群众公议”相结合，提高考核的“含金量”，并将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评价纳入评价体系。

（二）适应新常态，打造新政商关系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破除旧的“官商”理念，树立新的政商关系。必须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是要促进领导干部廉政意识的养成。要促进领导干部保持政治定力，筑牢思想防线，守住行为底线。二是企业要注重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要增强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法治意识，立志做大做强。要主动对接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明确发展目标，立足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担负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主体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民营企业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合法守规搞经营。

（三）建立健全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经常性有效性的交流沟通机制

建立政商联系沟通机制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制度保障，必须建立制度化常态化政商沟通机制，促进政商双方“亲”“清”交往。一是要建立政府行政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经常交流机制。要建立企业家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纽带“清单”，拓宽制度化的、正式的沟通机制。要让工商联、政协、人代会等多元化的正式沟通渠道成为畅通企业家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纽带，并将企业家通过正式渠道反映的问题纳入督察范围，限期督办。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了解和收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以解决。要定期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开展座谈活动，倾听企业的诉求，加以政策引导。政府有关领导要深入企业现场办公，为企业提供服务、解决问题。要利用新媒体和现代通信技术，通过微信群、QQ群、电子邮箱等形式，建立政商间立体化的沟通机制。二是建立各级司法部门同民营企业的有效性交流沟通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工商联的沟通与交流，并与工商业联共同合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司法人员与企业家的沟通交流会，与企业家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人民法院要针对企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改进完善，并采取多种形式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依法经营水平，支持帮扶企业健康发展。要通过座谈会、网络等多种形式，搭建好法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建立涉企行政司法综合服务平台。三是不断优化政府官员改革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要根据政府官员所犯错误的性质，把先行先试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规定时的探索与明令禁止后有规不依的行为区分开来、把推动改革的无意

过失与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按照“尽职尽责,失职必究”的原则,建立履职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担当者撑腰,让改革者卸下包袱前进。同时,对有规不依、借改革名义谋利、阻碍改革发展和损害群众利益等三种情形“零容忍”,一律不准免责或从轻发落。

(四) 建立健全相关平台,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保障

政商服务平台是政商沟通的有效途径,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建立健全相关平台。一是要实现招商引资项目平台代办。整合各地、各部门现有的政务服务平台,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方便企业通过网络办事,实现招商引资项目平台的网络代办。二是不断完善现有的维权平台。要进一步发挥云南省民营企业法律维权委员会和云南省民营企业投诉中心的作用,通过强化平台、组织评议、聚合力量、普法教育、个案维权、商会调解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要围绕参与地方性立法和政策制定、畅通投诉渠道、开展“法律三进”活动、组织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调解、个案维权等重点开展工作。

(五) 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协和工商联会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作用

人民政协和工商联会与民营企业有着直接的联系,必须充分发挥其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作用。一是要发挥省、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协的作用。云南省有很多企业家是政协委员,他们可以通过参政议政,与党委、政府交流协商、资政建言;政协要组织企业家委员积极参加全会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常委会议协商、民主监督协商、专题议政性协商等多种协商议政活动。同时,要引导民营企业主动从“拉关系、搞圈子”的旧模式、旧习惯中摆脱出来,从过去“潜规则”交往走向“明规则”交往,实现从“靠关系”到“靠本领”的思维转变,由“找政府”向“找市场”转变。二是要充分发挥工商联优势,积极搭建政商沟通桥梁。工商联作为民营企业的“娘家”,在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上要态度更坚决、践行更严格、落实更到位。要更加积极协助党委、政府搭建政商沟通互动平台,不断完善工商联自身联系服务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既做到“亲上加亲”,更做到“一清二白”。要及时了解企业家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要引导民营经济在“万企帮万村”的基础上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通过项目引领、就业培训、智力援助等多种途径开展帮扶,助推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六) 加强各类监督,促进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

监督是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的重要着力点,政商关系不仅关涉营商环境,而且集中体现了党风、政风和社风,云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加强各类监督。一是要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专项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找准监督重点,通过制定“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进一步明晰政商交往的界限和禁区、红线和底线,推动加快建立优化营商环境的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深化专项治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各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案件,压缩“围猎”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省、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协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依托工商联组织企业家委员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活动,紧紧围绕我省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内容,特别是在政府简政放权后行政审批权力运行、金融服务企业发展、政务环境、执法环境、招商引资和市场准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加强民主监督,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三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政府部门应通过聘请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廉政建设特邀监察员、联络员,参加党风政风检查及经济案件和其他有关案件的查处工作。四是要加大人民群众监督力度。要加大群众监督宣传的力度,为公众监督创造条件。五是要增强新闻舆论监督权利。新闻舆论要承担起反腐败的社会责任,创造公正的舆论环境,弘扬正气,打击腐败。

责任编辑:念兴昌

新的社会阶层双重性特征与政治引领分析

段 华

(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把无组织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组织起来, 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引领起来。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生的重要社会力量, 其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引领, 就是用共同的政治理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凝聚起来”, 用有效的形式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组织起来”, 用创新的方法使新的社会阶层的正向作用“发挥出来”。

关键词: 新的社会阶层; 双重性特征; 政治引领

中图分类号: D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023-06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历史决议中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①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 这个阶层是中国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社会力量, 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其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新时代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

一、历史上社会阶层作为政治力量对政权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会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分裂出适应时代的新的社会阶层, 这个阶层客观上就会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其主要社会阶层都比较清晰, 那就是士、农、工、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为每个阶层进行了制度化的政治安排, 从而让封建制度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保持着稳定和发展。直到明朝末年, 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地区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其中以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最为明显。如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了其祖上在明成化年间于杭州购织布机增至二十余张并雇工生产^②, 这说明在杭州的丝织业中已经有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和云南铜矿产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些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虽然只是个别现象, 但是可以说明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可能影响未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力量。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尽管很小, 但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当时发达的明代城市始终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 发育成长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产生市民阶级, 但高度发展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诱导城市居

作者简介: 段华, 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年, 第78页。

^② 张瀚:《松窗梦语》,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19页。

民社会生活的奢变。^①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中的部分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近代工商企业,于是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由买办、商人、地主、官员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清政府希望通过“新政”奖励实业,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经济上加紧对中国的掠夺,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内外双重因素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终于走上了政治的舞台。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准备了物质和阶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则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强大动力和群众基础。^②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华民国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统一管理经济。在社会管理上,国家建立多领域多层级的单位,每个单位都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的组织,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被纳入了不同的单位之中。^③国家采取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随之消亡。农村从1956年开始实行城乡户口制度,逐步取消农村的小农经济,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发展为人民公社与人民大队。在社会阶层上,整个中国形成了城乡分割、城市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新模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传统意义上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被消灭,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差异变得比较小,经济不平等程度很低。国家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进行一体化制度安排,国家权力直接影响着每一个阶层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与社会流动机会。^④在社会中,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个人阶层地位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基于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变化。这个时期社会流动中政治资本占主导地位,成为政治精英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社会流动呈现单一化状态。中国共产党充分地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非常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改革开放是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催化剂”。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再次打破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衡。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浮出水面,农民群体的分化明显。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超速发展,带来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的蓬勃兴起,各种外商投资企业中出现了大量管理技术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已经具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以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为主

① 孟彭星:《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第166页。

② 沙健孙:《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红旗文稿》2021年第4期,第14页。

③ 张顺:《7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流动机制变迁》,《人民论坛》2019年第29期,第38页。

④ 张顺:《7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第38页。

要职能的各种中介组织应运而生^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需求，大部分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满足，于是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社会组织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目前，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超过 90 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 2292 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近 1000 万人。随着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日益广泛，基于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出现的新媒体致使媒体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产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新媒体从业人员。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的特点，职业类型越来越细分，人们从业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这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四大群体就逐步成长起来。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群构成，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壮大了新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提高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② 新的社会阶层在利益上追求最大化、在个性上追求张扬、在自我实现上追求强烈，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得越来越充分。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并展示出强劲发展的态势，原有的政治体制要创新机制容纳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政治力量的进入，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安排让这支政治力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新发展阶段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具体群体类别在演变和积蓄过程之中还会有其他群体不断产生和加入。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具有以下双重性特征。

（一）正式组织的低组织性和自组织的“去中心化”性并存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新生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该社会阶层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数量上有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在 1992 年中国的第三产业总产出为 17.9 亿元，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 1.14 亿人，到了 2016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744127 亿元时，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1.6%，约 38.3 万亿元，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3.28 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42%。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着整个职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就诞生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之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③。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规模不低于 7200 万，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 95.5%，约 6900 万人。^④ 这些人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优势，绝大部分没有在单位、街道等传统意义的组织中，也没有处于相对稳定正式的社会组织之中，而是以高活跃的个体“原子化”存在于社会之中，处于分散状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自组织状态存在。这些组织具有小众性的特点，没有进行正式的注册登记，在组织中强调“去中心化”管理，其中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在社会政治参与上尤其是体现在网络上，他们的意见表达在表面上呈现多元化倾向，但是总体上有较强一致性，

① 周述杰：《关于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20 页。

② 范茹平：《改革开放与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理论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9—11 页。

③ 李强：《社会学视角中的新社会阶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第 55 页。

④ 新华网：《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 7200 万人》，2017 年 1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6/c_129434180.htm，2022 年 6 月 15 日。

能够更及时地通过内部变革来有效应对各种复杂外部环境的挑战。

(二) 缺乏政治归属感和对政治高度关注并存

我们经常说的“体制内”，是指党政机关、国有单位、国有企业以及传统事业单位等各种机构。改革开放前，“体制内”人员基本上涵盖了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如知识分子、干部等都是在一定的单位内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发生变化，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组织机制均发生变化，“体制外”的机构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多。新的社会阶层的四大群体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经常游离于传统的政治管理之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体制外的组织中工作，职业流动性高，工作场景多元化，缺乏政治归属感。但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很多人从事的职业就是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上的各种信息比较敏感，有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新闻的习惯，是社会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核心应用群体，加上他们分布在市场经济前沿领域，各类新闻消息对其事业发展和突破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导致他们对政治较为关注。

(三) 群体的力量聚合性和个人的行动离散性并存

无论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还是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都占据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也不是在农田中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他们常常是以管理者、引领者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与他人交往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与行为的能力。其中，很多人是从“体制内”走出，既带有曾经“体制内”人士的光环，又作为专业人士是对周围人群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的“能人”，他们为社会多个阶层关注。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又追求个性，他们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和其他阶层和社团之间的人际交往、互动沟通频度较低。

(四) 阶层的开放性和职业的壁垒性并存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高学历人才毕业后进入该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毕竟“体制内”的容量已经远远不能容纳每年9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新的社会阶层从事的职业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风向标”。新的社会阶层是开放的，是很多有较多知识较强职业能力者理想中的工作状态。由于“互联网+”带来的经济化学仍在发酵，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①这“四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一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从中产生。我们同时也看到新的社会阶层因为自身学历层次高、职业资格要求高，社会中的一般就业人群仍然难以加入该阶层，他们从事的职业具有较强的壁垒。

(五) 社会和谐助推和扰动双向调节性并存

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主要群体之一。实证研究发现，“体制内”的中间阶层对政府的信任度显著高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和社会中的一般工人、农民相比，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政治态度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而在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内部，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较，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②这就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一方面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收益，同时作为知识和技术拥有者思想更加开放，更加希望有更宽松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并且在特定空间和时间里其可能成为激进社会话题的引领者和拥护者。但是新的社会阶层有七成分布在民营企业中，其就业的身份在职业晋升、政策性购房、教育、看病等方面受到现有体制的阻碍，缺乏社会安全感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对现行体制不满意。作为具有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作为

① 张林江：《新的社会阶层兴起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76页。

② 张顺：《7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第40页。

群众的意见领袖，在社会舆论中有极大的话语权。^①尤其是其中的新媒体人士富有批判精神，又是影响社会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②，在特定话语领域和条件下可能成为干扰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状态下的受益者，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常常又通过各种形式维护社会和谐，从而保持该阶层人士在社会中的各项良好收益。

四、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发挥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③。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把无组织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引领起来，实现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阶段性和长期性目标。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在组织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引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通过以上对新的社会阶层双重性特征的分析，要求我们必须组织、引领好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支新的政治力量。

（一）用共同的政治理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凝聚起来”

“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团结引导、联谊交友等方式，使他们更加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寓思想引导于服务帮助之中，充分调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中国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作为实现基础，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实方向，是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群众诉求之间的桥梁。“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述，表述上的浅显易懂更容易引起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共鸣，激发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各阶层和群体塑造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的激情斗志，是凝聚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群体多元力量去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梦”能够作为中国社会的灯塔，统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协调多元分化的利益冲突，激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拥有自己的“中国梦”，从而增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目标的真正理解和高度认同，把新的社会基层人士团结在“中国梦”周围，让“中国梦”真正成为引领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面光辉旗帜。共同政治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这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入到新的社会阶层中去，围绕新的社会阶层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开展好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教育，真正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引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增进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共识。充分体现共同政治思想的“中国梦”这面旗帜色彩一定要鲜明，这样，我们才会在政治引领上更加有定力、更加有持久性，才会让新的社会阶层安心聚力。

（二）用有效的形式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实现抗战胜利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⑤，并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同群众相结合”的大前提是深入群众的生活、虚心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

① 李强、丁辉文、赵罗英：《怎样理解和认识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0期，第33页。

② 谭建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相关论述》，《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0—26页。

③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第3版。

④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第3版。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9页。

经验,为群众谋幸福。党在建国之初,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让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70多年过去了,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组织起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形成的最大财富之一,是我们党工作的比较优势。^①我们把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组织起来,把不同的民族组织起来,把社会和政府组织起来,使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化国家之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要总结推广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经验,以‘组织起来’为依托大胆探索,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扩大工作覆盖面,团结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②。面对新的社会阶层蓬勃发展的形势,利用现有各种群团、统战性社团等平台的制度化组织能力,不断拓宽组织的载体、提高群体的覆盖面、提升组织的功能,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类联谊组织的作用,让新的社会阶层在现有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中建立起组织化的途径与渠道。

(三) 用创新的方法使新的社会阶层的正向作用“发挥出来”

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服务社会中成长壮大的,是通过服务社会实现服务大局的。有意识地把新的社会阶层中代表人士选拔出来、组织起来,由被动服务社会到主动让他们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服务社会、正面发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公益活动、国家发展大局的正向力量。一要树立让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作用的思维导向,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团体积极参与”的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建立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中律师、网络意见人士、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不同特征精准施策,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培养上形成心往一处想的思想合力。二要打造让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作用的组织平台,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发声发力提供支持。与各大主流新闻媒体、文化传媒企业一起组建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引导其在互联网舆论领域正面发声,弘扬正能量、传播主旋律。与民政部门合作,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阶层联谊组织的规章制度,提高新的社会阶层联谊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和底气。三要创新让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作用的项目活动。对于新的社会阶层这支社会建设生力军,要通过活动尤其是集体活动推动新的社会阶层建立内部语言和团队精神,增进阶层内部凝聚力和整合力;深化新的社会阶层和公众之间的交往,增进他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的贡献和美誉度,凸显他们在社会上的价值和知名度。通过项目活动,不断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热情,畅通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增加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机会,帮助他们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他们是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推动力量,是我们党可以信赖的重要社会政治生力军,做好政治引领就是把他们把实现个人梦、群体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群体发展与国家事业结合并统一起来;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智力密集、资源丰富、成员众多、联系广泛等优势,把他们的长处和新时代的社会需要统合起来,把他们的愿景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统一起来,引导他们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同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贡献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张维为:《组织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红旗文稿》2014年第19期,第6页。

^② 海群:《引领政治方向 凝聚新的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用发挥及政治引领》,《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第20页。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贵州地下党统战 工作实践与当代启示

沈 港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 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 构筑了广泛且有效的统战格局。这一格局的构成主要包括报刊宣传组织、学生青年、工人阶级、军事武装力量以及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等的统战工作, 为塑造党的正面形象、保存和抢救贵州工业资源、加速贵州解放取得重要成效。贵州地下党利用“多样化”的统战宣传方式、“实效化”的统战策略、“组织化”的统战领导原则, 形成了宝贵的统战经验。以史为鉴,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 我们要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统战工作根本前提, 坚持因时而变、应势而动的策略方法, 坚持胸怀天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多元媒介构造统战宣传大格局, 为民族复兴注入磅礴泉源。

关键词: 解放战争; 贵州地下党; 统战工作; 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3-0029-09

抗战时期, 国民党将南京政府迁至重庆, 贵州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基地, 并依照大后方的独特地缘环境, 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 在抗战后期撤销贵州省临工委, 之后各地党组织隐蔽下来, 利用其他方式开展革命活动, 为党组织的发展积蓄革命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 革命重心发生偏移, 面对国统区有增无减的波谲云诡形势, 贵州地下党开展统战工作, 利用多种形式的爱国民主活动广交社会各阶层朋友, 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 为顺利解放贵州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总结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统战工作经验继而提供当代借鉴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学术界针对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的统战工作研究成果并不多。聚焦抗战时期贵州的统战工作有过一定的总结但未形成专题研究,^①另一些研究则以抗战时期贵州某一市为背景, 展开统战工作的探讨^②, 有的以贵州知名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为研究内容^③, 有的则是研究红军长征转战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军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资料辑录与研究”(20XKS026)。

作者简介: 沈港,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抗战史。

① 余福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硕果: 贵州抗日救国军》,《当代贵州》2004年第20期,第51页。

② 雷奎怀:《贵阳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9—15页。

③ 熊宗仁:《爱国同奋斗 肝胆两相照——纪念周素国先生诞辰120周年》,《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5期,第3—8页。

州开展的统战工作^①。本文将时间范围限定为解放战争时期，聚焦贵州地下党开展的统战工作进行研究。

一、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实践

中共贵州地下党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过程中，着力通过有效的统战宣传策略，将党的政治主张传导到民众，并针对不同阶层进行统战工作，扩大统战工作覆盖面，增强党的武装力量，为解放贵州做出突出贡献。

（一）发挥报刊统战宣传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相应的统战宣传方面与抗战时期有所区别，又要突出重点。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报刊以全民族统一战线为前提，揭露日本法西斯行径，号召全民共御外敌。而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形势发生改变，宣传的目的一方面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要将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给民众，使民众充分认识党的路线方针，坚定对共产党的拥护。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挥报刊独特的宣传作用。在宣传过程中，贵州地下党将统战工作落到实处，利用国民党的报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声。如地下党员张鸣正、黄先利用《中央日报》《贵州商报》记者、编辑的身份，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政策。^②用国民党官报进行宣传，扩大了宣传的覆盖面，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不言而喻。而发刊词作为其振聋发聩的口号，往往对民众有着重要的引导价值。据萧奇富回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地下党员将贵阳《力报》进行改组，响亮的提出：《力报》作为追求真理的园地，望读者来共同发掘真理……为了追求真理，就要揭露丑恶的现实，让黑暗与丑恶在我们面前发抖吧！”^③发刊词以独特的语言魅力，营造出一种肃穆气氛，也体现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在革命斗争中，党组织还通过秘密出版一些机关刊物将党的最新文件传达下来，供党内同志阅读。例如，遵义油印的《曙光周刊》，省工委出版的《真实》刊物，帮助地下党员明晰解放方针，从而将党的主张更好地传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团结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

将宣传教化功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尽可能地团结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民主的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④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需要极强的工作艺术和工作技巧，要游刃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效。这一时期，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与各地的国民党官员接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贵州地下党员王家鼐、黄体贤与兴仁专署专员谭本良秘密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并起义成功。^⑤在织金县，县工委派中共党员毛少益打入织金县三民主义青年团总部任秘书，为共产党搜集情报，又派黄典伍利用亲戚关系打入国

① 颜永强：《红军在遵义期间的统战工作》，《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第107—110页。

② 中共贵州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6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贵阳：贵州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印刷厂印刷，1986年，第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2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六盘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六盘水文史资料（第2辑）》，贵州省民族印刷厂，1986年，第46页。

民党织金县民众教育馆，开展地下活动。^①同时，贵州地下党组织主动适应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与少数民族联系密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贵州地下党组织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接触，宣传党的政策，做好上层统战工作。这些，充分彰显了党的统战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性，既团结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又减少了在解放过程中的阻力。在开展统战工作中，贵州地下党组织不仅针对上层人士的统战，也涉及中下层的，如各地的国民党乡保保长，把这样一批社会基础力量团结起来，辐射的统战范围更大。另外，贵州地下党组织还掌握统战策略，利用已团结的进步力量进行扩大化，让他们进行二次动员，这样的宣传更具效果。如彝族龙腾霄同志，组织创建革命武装力量并积极主动开展对中、上层人士的说服工作，在1948年将云南烤烟技师王贵寿接到糯寨，以传授技术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活动，为党筹集了活动经费。^②

（三）掌握军事反蒋武装力量

1947年3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③加强国统区党能领导和掌握的武装力量，不仅是应对反动派对人民的控制，更是壮大储备力量以应对蒋介石的武装，是统战工作团结武装力量的又一实践。据盘北游击队第八支队副队长龙野平回忆：“在南方局和罗盘区的指示，盘北游击支队逐步发展壮大，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款）口号发动群众全力开展策反工作。”^④盘县第6、第7、第8支队建立后，通过组织整顿逐步壮大起来，其中第6支队全支队共有骨干64名，队员600余人，各种枪支300余支；第7支队共有骨干86名，队员700余人，各种枪械400余支；第8支队能召集300人（枪）。^⑤受此前红军活动的影响，长征时期贵州的扩红成绩显著，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贵州地下党抓住这一优势，开展全省区域范围的游击战争，以武装的力量对抗国民党反动势力，在统战工作和强力宣传下，许多国军部队起义投诚，而针对少数民族较大势力武装力量，党组织积极做工作，促使他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极大减少了解放阻力。这一时期，群众的热情高涨，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黔北游击队、猫场农民武装组织、大洞口游击队、普定县游击队、川黔边区游击纵队、思南游击支队等游击武装队伍。

（四）凝聚学生青年的进步力量

学生是运动中的先锋，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号召力，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中坚力量。针对国民党对贵州的盘剥，中共中央指出：“尽管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像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⑥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贵阳大中学校发起以“抢救师长员工生活”为主题的反饥饿运动，掀起了贵州反蒋民主运动的高潮。贵阳师范学院学生组成“贵阳师院反饥饿运动委员会”，举行游行示威时高唱：“薪水是个大活宝，要和物价来

①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1—199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② 盘县特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盘县特区人民武装部合编：《回顾盘县解放》，盘县特区域关东风印刷厂承印，1987年，第106—130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都匀市委员会编：《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都匀：黔南自治州人民印刷厂印刷，1983年，第204—205页。

⑤ 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委员会等编：《罗盘区党史资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80页。

⑥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赛跑,物价一天涨一尺,公教人员不活了!”^①鲜明表达了师生的诉求,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众生活现状,从而激起民众爱国热忱,为争取生活改善而发声。同时,在歌曲宣传过程中,贵州地下党注重结合重要节日,扩大宣传效果。1949年5月1日由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清华中学十一周年纪念会上,革命的、进步的歌曲和诗朗诵,对全校师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贵大师生在1949年“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文艺晚会”上,邀请乐恭彦(后被国民党暗杀的地下党员)讲师上台独唱了《让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好几首革命歌曲。^②特殊的节日烘托出的爱国气氛,将文艺活动具象化,赋予了歌曲、戏剧、朗诵会新的表征内蕴。在遵义,地下党员幸必泽和王孝源联系遵义省高中学生,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掌握学生自治会等学生组织的领导权,取得合法地位以利于开展斗争。^③学生运动不局限于学校,而是通过学校与民众密切联系,利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做民众中的宣传动员工作,为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青春活力。

(五) 发挥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他们破坏已有的工业、道路、桥梁等,以便撤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除了领导人民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进军外,还发动和组织民众保护城市、交通、邮电、工厂、学校、仓库、银行等,遏制统治当局溃败前的破坏活动。发动各大工厂、电信局等的工人,通过自卫斗争反对压迫和争取独立。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的工人反蒋民主运动主要体现在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罢工斗争、贵阳电信局职工的怠工斗争、公路运输系统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城市随之响应的护厂行动。贵州地下党员早期通过各种方式打入工厂内部,团结大批先进工人,拥有一定的民众基础。面对国民党当局破坏电信设备阴谋,地下党员组织工人消极怠工,粉碎其销毁电台的阴谋。“由于电台工人少,不能采用武装护台,只能采取拖延的方式,一方面把机器上的电子管拆卸下来隐蔽,还找一些破旧东西装箱来以假乱真。”^④贵州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一些爱国人士深受感召,主动帮助民众进行护厂运动。这些护厂行动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利,调动了工人阶级的爱国积极性,基本上阻碍了国民党破坏的“应变计划”,并取得积极成果。仅遵义地区,国民党茅草铺有三十多万斤的粮食,伪军政部第七军械总库遵义仓库有大批子弹约一百万发,各种炮弹一万多发,手榴弹四十五万发,以及大量黄色炸药和军事装备,还作为当时黔北转运中心的遵义存盐约四百吨,都在地下党的组织运作下得到了有效的保护。^⑤

二、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效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通过多种艺术策略,覆盖范围既包括广大的农民、青年学生、工人阶级,也包括针对敌伪派、顽固派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贵州的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刻阐释了党领导下统一战线工作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是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

①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贵州革命史话(贵州篇)》,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2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第12辑)》,遵义:遵义市人民印刷厂,1987年,第11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贵阳:贵州省邮电印刷厂,1983年,第89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第12辑)》,第26页。

法宝的生动彰显。

（一）认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独裁统治，不顾民众的和平意愿发动内战。贵州当局继续反动统治和高压政策，限制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生存权利。1947年，国民党宣布实行“戡乱总动员令”，之后又颁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令》等反动法令，利用各种反动政策加紧对统治区的镇压，以满足其发动内战的需求。这种反动统治随着解放形势的发展，愈发严重。为了诋毁共产党的形象，国民党当局管辖的中央社和几家官报编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消息，并对党的民主政策进行虚假歪曲。贵州地下党通过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反动统治展开斗争，帮助群众认清反动统治的本质，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当局炮制了一套“应变计划”，通过了《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纲领》，其宗旨就是：“以行政系统为纲，纠集地方武装反共力量，以便解放军到来前进行阻挠破坏，解放后进行暴乱，骚扰。”^①这些反动政策强化了对群众的政治控制，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真实面目，而其针对颓势做最后的挣扎，通过各种手段破坏已有的工业基础则是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积极分子、群众，控制报刊宣传阵地，压制爱国进步思想。贵州地下党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策略，使国民党政权日益动摇，共产党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尤其在少数民族居多的贵州地区，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传播范围更加宽泛，塑造了正面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二）保存和抢救一批工业资源，奠定贵州工业发展基础

国民党迁都重庆以前，贵州在抗战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且由于交通闭塞，导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基础发展薄弱。抗战以来，东部大批工厂内迁，随之带来大量迁移人口，贵州的工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短暂的发展。抗战结束后，大批内迁的工厂、高等院校迁回原地，贵州的经济发展遭到打击，工业方面甚至出现萎缩。解放战争后期，贵州当局奉行所谓的“搬家行动”和“坚壁清野”，将贵州的工业资源重整带到中国台湾，带不走的就实行破坏策略，加紧对工人的剥削，防范贵州地下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并且对电厂、铁路、公路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严密控制。1949年，二野发出指示：“大军即将进军贵州，解放后遵义设市，要保护遵义地方不受破坏，资财不受损失，特别是粮食不受焚毁，不要运走，电厂要继续发电。”^②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接管城市的政策，要求尽可能保护现有的工商业资源，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解放战争初期，部分地下党员就已经渗透到各类工厂中，与厂内积极分子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大批工人阶级，为后期的护厂运动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护厂行动的感召下，大批工商业者不仅没有在解放前离开，并且自发组织起来保护经营的各类工商业。学校的地下党员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动动员工人、学生巡逻，保护附近的工厂和学校。同时，针对国民党破坏贵州重要交通要道如桥梁、铁路等行为，地下党员也积极应对，避免承载工业发展的交通行业遭到损失。共产党领导的多种行动，从国民党手中顺利抢救了一批重要的资源，保护了本就萎缩的贵州工业，为解放后贵州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加速解放贵州步伐，呼应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贵州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要战略基地，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意

^① 中共贵州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2页。

^②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贵州党史资料（第4辑）》，贵阳：贵阳大南印刷厂，1986年，第165页。

将其建成反共剿共的基地，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尤其在初期的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取得显著成效。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调动了全省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他们对蒋政府日益不满，对贪污腐败的统治现状强烈反对，当时在贵大、师院、贵阳中学、省立高中、贵师、女师、女中和中山中学都有他们开展的学运活动。在都匀，龚鳌（地下党员）回忆道：“都匀扶轮小学中大多数都是工人的子女，而且年岁较大，他们要求进步并向往革命，有些毕业出去的学生奔向南京、江西等地迎接解放军。”^①正是地下党的积极宣传下，贵州的学生青年渴望早日解放，不仅在思想上接纳解放军，更是从行动上密切配合。除此之外，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倾向进步的工商业界、国民党贵州当局的开明人士都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顺利解放贵州做出了积极贡献。1948年针对蒋政府的最后挣扎，中共中央指示：“党在蒋管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晰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②在此基础上，贵州地下党密切联系群众，利用群众的广泛力量扫除解放的障碍。一方面深入群众中宣传，加强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另一方面动员群众积极配合解放行动。大批武装游击队的建立、组织起来的“护厂、护校、护工”的保护行动，有效地在国统区与反动派展开斗争，牵制了国民党部署正面战场的军事力量，并且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利用贵州作为后方相持的阴谋，加速了贵州的解放步伐以及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显现了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又具有地域政治环境的特点，以“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实效化”的斗争策略、“组织化”的运动领导，将统战工作优势充分彰显出来，是贵州顺利解放必不可少的实践要素。

（一）以“多样化”的统战宣传方式，构筑全方位的政治宣传攻势

首先，解放战争时期，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宣传工作主要是帮助全省各族人民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根据解放形势的变化，适应性地调整宣传策略，并密切配合党开展的兵运、民运、学运等统战工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不断努力。贵州地下党的宣传方式多样，他们以报纸、刊物、组织文艺社团活动等载体，极大地解放民众的思想，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报刊宣传，是当时覆盖面最广，也是一直沿用的宣传方式。当时，贵州报刊受国民党的控制，大批量公开发行宣传党的主张政策较为困难，贵州地下党利用分散在各地的党组织的特点，组建报刊编印室出版地下报刊，以秘密的方式在民众中进行宣传，并且与学校的读书会相联通，通过宣传部分主体带动全部主体，使得宣传的受众面积以被动变主动的方式不断扩大。

其次，地下党也通过国统官报发声，其背后逻辑离不开一批地下党员的统战工作，离不开宣传策略的灵活选择。创办自有刊物也是重要的宣传方式，这一时期的刊物内容主要为介绍全国解放形势，增进民众的胜利信心，如中共贵阳特支创办的《理论与实践》，还有地方党组织创办的报刊，多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主。同时配合报刊，印发传单等进行宣传，如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在《告贵州人民认清敌我，争取人民解放的早日胜利》表述道：“一切过去受瞎气、受压榨的贫苦劳动人民，这是千万年来第一次，我们翻身的时候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洗净无限的痛苦，过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都匀市委委员会编：《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都匀：黔南自治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3页。

上丰衣足食快快活活的好日子了。”^①此外，读书会、教唱革命歌曲、文艺演讲会、学校社团组织的朗诵会、舞台戏剧、木刻画、壁画等各种形式，都对推动爱国民主活动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以“实效化”的统战策略，逐步瓦解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国统区环境复杂，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容纳着学校、工矿企业、社团的迁入，承担着后勤保障要地角色，自贵州军阀被蒋介石以各种途径瓦解后，贵州的地理位置也愈发变得重要。

首先，应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贵州地下党利用早期建立的良好群众基础，通过卓有成效的斗争策略，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国民党统治基础，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导致经济危机凸显，民生凋敝。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贵州当局通过放开鸦片禁令、捐税等手段加深剥削，令民众苦不堪言。针对这一现状，贵州地下党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切实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在斗争过程中贵州地下党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统战工作中，他们善于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逐个击破，瓦解其统治基础，充分彰显斗争策略艺术。他们发动工人阻止敌人迁厂，开展护厂斗争，利用蒋嫡系厂长顾光复和非嫡系副厂长汪福清在迁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以拖延时间无法搬迁^②。通过间隙矛盾既达到了护厂要求，也避免了党的秘密工作被公开的危险。

其次，贵州地下党组织在斗争过程中还利用知己知彼战术，未雨绸缪，提前开展针对国民党贵州统治区域的调查。如在凤冈，地下党员按照“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精神，认真教书和广交朋友，并利用节假日、以游山钓鱼为掩护，进行地形、交通和各种社会调查并搜集有关情报，绘制了凤冈地图。^③中共贵州省工委1949年5月发出指示：“要求所有党团员必须从事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帮会、反动党团详细情况的调查。”^④调查研究成果得来的有价值的信息，为顺利解放贵州奠定了基础，也为贵州解放后党开展诸如土地改革、剿匪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以“组织化”的统战领导，发挥第二条战线的强大牵制作用

在推进解放贵州的进程中，中共中央以实现和平与民主为目标，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在国统区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社会各阶层联动起来呼应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彼时的贵州解放进程，实现了“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双线作战。

首先，“内部组织”是指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大肆搜捕地下党员的影响，当时贵州省工委被迫解散，各地的党组织转移到地下以及党员疏散隐蔽。解放战争爆发后，这些党组织就相继发动起来开展活动。“外部组织”则是贵州归属中共华南局领导，派驻共产党员到贵州工作。当时恢复的贵州省工委、建立起来的中共贵阳特支，同时云南、四川、广西、湖北等地也先后派遣党员到贵州开展革命活动。双线作战的特点，构筑了区域方位化的活动格局，以纵向的组织领导避免与贵州地下党发生横向关系。其次，在贵州地下党“组织化”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成为斗争的前沿阵地，学生教师群起响应，凝聚起了贵州各大高校的进步力量，他们斗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牵制作用，迫使反动派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贵州省工委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共贵阳特支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都辐射到贵大。如果说贵州的学生运动是给予高度腐败的贵

^①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贵州党史资料（第1辑）》，内江：内江新华印刷厂，1985年，第153—154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8—199页。

^③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贵州党史资料（第4辑）》，贵阳：贵阳大南印刷厂，1986年，第23页。

^④ 何长风等编：《贵州革命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9页。

州当局的当头棒喝,那么由学生运动演变为工人运动的结果,则是加速国民党倾覆的一剂良药。虽然贵州的工人运动不像学生那般轰轰烈烈,但其斗争形式转化的良好结果,则是在有限的斗争范围中获得最大化的权益保障。

最后,工人运动演变的护厂、护校、护台运动,消解了自有财产不被当局破坏的危险,彰显了全体民众万众一心的抗争决心。正是由于地下党员的积极斡旋,用充满斗争艺术的策略手段,达到了牵制贵州当局的显性价值,这也是间接在经济方面对国民党展开斗争的一次实践。贵州地下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以有效的组织传播力、组织践行力实现了“组织化”的蜕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组织化领导特点的充分表达。

四、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当代启示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通过多种艺术策略,覆盖范围包括广大的农民、青年学生、工人阶级,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力实践,充分彰显了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历史价值,为新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一) 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前提

首先,统一战线作为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导向。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都是不能胜利的。”^①作为早期军阀直接统治和后期国民党的重点封控区域,贵州开展统战工作绝非易事。解放战争初期,贵州地下党还处于恢复发展阶段,为加快解放贵州步伐,贵州接壤的省份在这一时期也派遣地下党员进驻贵州,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构筑统一战线大格局。他们在横向领导上不发生关系,但背后需窥见的是,这些工作都是置于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方能产生合力效应。

其次,统战工作的领导权问题,毋庸置疑党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所在,命脉所在。因而,站在新时代的方位上,统战工作的前提就是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夯实党同各阶层人士的合作基础。不断强化党的统战工作领导力、统战工作凝聚力、统战工作向心力,矢志不渝将统战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二) 坚持因时而变、应势而动的策略方法

时代催生出新的理论品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需随时间、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依托当时贵州的历史境遇开展的统战实践,能够从方针和行动上阐述统战方法的因时而变、应势而动这一当代启示。

首先,蒋介石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并非抗战胜利后生成激化,而是全面抗战时期被更为主要的矛盾所遮蔽。主要矛盾解决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置于放大镜之下,彼时共产党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整为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铺开,所涉及的阶段特征、内部矛盾、斗争策略发生显著变化。贵州地下党及时变更统战方针,由先前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逐步过渡到早期针对贵州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如当时的“反饥饿”运动,正是对腐败经济的强力回应。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节节攀高,地下党把握良机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防止国民党仓皇出逃而对贵州工商业和基础设施的破坏。

其次,有效总结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并随环境变迁进行再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党强化统战工作需解决的时代课题。面对着新的复杂社会环境、社会利益相交互织的动态关系,着力优化市场经济下的弊障,向有利于民生利益福祉的方向迈进,是统一战线因时而变的当代标志。应势而动,则是主动求变,于变局中开新局,要求我们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用开拓创新的精神适应性转化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最大公约数”这一内在要求,将统战工作的策略方法创新化、精细化、指向化,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凝聚众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形成磅礴的力量源泉。

（三）坚持胸怀天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突破了原有统战对象、统战阶层的局限，并且兼容了贵州独特的地缘环境以及政治状况，尤其是在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方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顺利解放贵州减少阻力，构筑起全方位的统一战线格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下党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在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游击武装队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威宁游击团建立后，就将统战工作放在首位，走进田间地头，成立了宣传队，“他们深入威宁西北苗村彝寨三百多里，演唱自编小型歌舞、话报剧，如《保长拉兵》《回头是岸》《穷娃参军》等，而且还以摆‘龙门阵’的方式，访贫问苦，用彝语、苗语进行宣传。”^①统战工作不仅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有效方式，也是党的统战部门开展的思想教育途径，更是凝聚众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护舵手”。

首先，统战工作的“一体多元”的表征显现出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辨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的统战工作，并不仅在于为了顺利解放这一目的，其背后逻辑离不开党始终如一践行的谋得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不仅仅是党矢志不渝开展统战工作的使命担当，更是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所积累出的“胸怀天下”的宝贵经验。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辩证统一。胸怀天下构筑的大统战格局，必定是要加强国内统战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社会各阶层、党外人士搞好关系，团结各族同胞汇聚成最大“同心圆”；也要开展好对国际的统战工作，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广泛、科学、有效的统战格局，以中华民族历来传承的爱国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抵御未来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四）坚持多元媒介构造统战宣传大格局

首先，统战部门不同于其他党政部门，它是我们党保持同党外人士紧密联系的桥梁，它起着铸牢中华民族大团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新时代的统战工作要取得理想效果，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统战经验，持续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自上而下建立起精细化的统战机制，拓宽统战工作范围，深入挖掘统战工作领域中的短板，及时补牢工作漏洞，以实效化、科学化的统战策略，良好的工作作风构筑起大统战格局，而且这一格局的构建必须是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根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导向。

其次，在宣传过程中，也要积极利用多种媒介进行宣传，如报纸、期刊、互联网等各类平台。将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做到实处，多利用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团结报》等主流报刊，将最新的统一战线思想、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理论传递给民众，让他们知晓统一战线工作开展的成果。在进行宣传的过程中，要适应新阶段的发展变化，当前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中介组织、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他们的日常活动多与网络密切相关，要通过网络化的方式，开办网络联谊组织、组建实践培训基地，建构起相互信任尊重、共同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总之，多元化的宣传主体，同向协力构筑起宣传大格局，这样才能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广大统战成员携手同行、同心同德，呈现政治责任与政治品格的互益补充，从而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达到奠基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大国之路。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贵州党史资料（第5辑）》，贵阳：贵阳大南印刷厂，1987年，第232页。

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研究

杨喻童，罗发洋，周俊华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党史，是党带领中国人民的建国史、富国史、强国史，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互动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有别于西方国家，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便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建构现代国家的时代重任。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现代国家，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使中国重新回归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由此形成中国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的新型范式。这一范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要素，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创新性，能够促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障，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经验。

关键词：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2) 03-0038-09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理论兴起后，促使学界关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无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政权稳固、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随着全球化带给人们视野的扩展，人们对政体和政党制度类型不同的国家治理效能进行关注和思考。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提出其著名的命题：“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①。基于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研究立场的学者把亨廷顿所言的刚刚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容易产生的不稳定归因于民主政体，具体说是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治理的有效性归结于民主政体和政党制度，即是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三权分立为政权组织原则、以自由选举为政权产生形式的所谓“自由民主政体”，是否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在政党制度上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照搬照套西方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研究”（18BZZ018）。

作者简介：杨喻童，美国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广告公关（ADPR）专业硕士，主要从事公共关系学研究；罗发洋，昭通市职教中心教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周俊华，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制度研究。

^① [美]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现了无效治理甚至已经沦为“失败国家”。长期以来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民主模范”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解不开的治理死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范式，即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范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治理水平高的国家往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乐。国家治理系于强有力的政府，而政府是否强而有力依赖于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其领导中国人民的建国史、富国史和图强史，中国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国家治理的特征是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中国之治得以立足的中国之制开创了一种国家治理的新范式。

二、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关系的中国特色

（一）何谓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理论源于治理理论。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西方学界对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治理的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人们意识到治理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国家同样面临公共治理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治理理念被广泛应用到国家公共管理和基层治理领域，国家治理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热词。早期的西方治理理论带有浓厚的社会中心主义色彩，甚至强调排斥政府和国家，主张“去国家化”。治理理论创始人詹姆斯·罗西瑙（J. N. Rosenau）指出，治理是一种实现共同目标的活动，它不同于统治，实施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不需要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来执行。^①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思想注重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限制，认为反之就会对公民个体和社会产生压迫，导致不自由。所以，早期的国家治理理论认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参与者是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私人部门，他们和政府协同来制定与执行政策。治理的网络是平等、开放的，官方与民间行为主体间不存在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显然，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与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产生的，其根本目标是要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治理社会化。

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历史文化、政治演进、经济发展水平等发展路径各自不同，西式治理模型不可能适应所有国家的现实治理诉求。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赋予社会更多权利，很可能造成政治失序并引发公共危机。因此，丹尼尔·考夫曼（Daniel·Kaufmann）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学者对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形成了“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框架。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在承认治理行为体的多样性的同时，重申政府具有独占性、强制性权力，政府应在治理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通过政府将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吸纳、组织到治理机制中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公共福祉，促进公共利益。

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并非完全对立，二者也具有共识：一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与对象是多元的，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总和。政府干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需要与其他社会力量紧密合作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主体和对象可能会相互转换。二是国家治理需要以完善的规则或制度作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上下联动，运用国家法律、公共政策、民主协商、对话合作、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多措并举来实现国家治理。三是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善治”，即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相互融合、化解冲突与矛盾，维持社会秩序，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社会

^①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1页。

发展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现了我国国家治理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根本优势，吸纳了各种治理范式之优长，其与西方治理的区别也愈加清晰。本文所指的国家治理即承认国家治理是多元行为体协同实现的，但政府是多元中的主元，亦即政府通过整合机制和制度设计，借助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力量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使得它们能够相互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何谓政党治理

政党治理的理论源于21世纪初治理理论与善治理论的兴起^①。有的学者从政党的组成要素来对政党治理进行解读，有的学者从政党的组织结构来对政党治理进行阐释。但不论是“要素说”还是“结构说”，都只描述了政党治理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其含义并不完整。比较全面的是政党治理理论的三维说^②，政党、社会、国家的三维结构分别对应政党治理的三个维度——党内治理、党际治理以及党外治理。所谓党内治理就是政党对本身的成员、组织结构、制度规章进行规范的一种形式，包括制定了的基本纲领、共同目标、宗旨、组织结构等。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党的建设，包括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准确地判断和掌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际治理着重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国家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的指导下，其他民主党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活动机构，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的职能。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十分契合我国的社会历史现状，而且充分整合和有效利用了社会各方资源。党外治理就是党领导国家，人民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对国家进行治理的维度。对国家进行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构建政府的主体是执政党。政党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政府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将党的方针与政策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方针与政策。这些共同构成了政党治理应有的三个维度。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安排^③。政党作为行政主体的建构者，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将从以下两个维度来阐释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政党治理的第一个维度：党内治理。一个现代性的政党，有自己的性质，包括一定的纲领、宗旨，执政方式以及组织架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这样表述其性质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度。人民和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党内管理，坚持“初心”，保证党始终如一，顺应时代发展的背景下以更为“民主”的方式服务人民。这与我国国体——人民民主专政高

① 陈驰、陈亮：《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路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5页。

② 罗峰：《转型期中国的政党治理：生成、资源与框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第66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48页。

度契合，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政党治理体系建设，是促进国家发展、加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政党治理的第二个维度：党际治理。政党是现代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当今世界有2000多个政党、政党制度又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而我们国家独创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的政党制度。一个国家治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而构建政府的核心则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既不是一党独大，也不是两党轮流执政，更不是多党竞争，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合作参政。这既在国家治理中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契合了我国坚持的民主与协商的理念。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不仅顺应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更能有效避免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弊端。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新型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是中国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核心要素。

三、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构的百年互动孕育了新型的国家治理范式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流形式，其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是传统型国家和集权型国家相继崩溃后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换言之，现代民族国家是指由一个或多个民族共同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具有统一的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国民文化、由本国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一般认为，现代国家具有以下特征：主权独立，领土统一，疆界明确；中央集权，国家垄断暴力；人民主权取代王权成为国家的中心与基石；具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语言；具有统一的民族市场。

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的建构史，各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路径和主导力量并不相同。不管各自的路径差异如何，西方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沿着两条路径建构的：一条是社会力量主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通过暴力形式进行革命斗争，最后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完成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等诸方面的现代建构，以激烈的质变方式形成现代国家。这条路径以英、法、美为代表。另一条是国家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路径，即在社会政治、经济严重危机的迫使下，在保留王权、保存大量封建残余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基础上，由封建王朝上层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的改革，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构现代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属于这条道路的典型。

各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和主导力量是由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政治传统、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在君主专制确立以前，西欧是一个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基督教世界，其主导观念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这两种观念阻碍着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产生。之后，国王与市民阶层结盟，不断与教权斗争，王权得到加强，其间，又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到16世纪，一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相继出现，开始成为西欧社会的基本政治单元。这是朝着民族国家即现代国家发展的必要环节。所以，恩格斯指出：“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①恩格斯认为，在中世纪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并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它们一样^①。在王权与市民阶级结盟并不断强大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的主权国家。可见,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如下特征:王权成为民族聚合的中心;民族的孕育与成长与等级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成长与巩固相一致;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存在于君主制的形式中,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欧现代国家的建构。

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本来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但它出现以后成为一种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国家形态。周平认为,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内涵相当丰富,其具有一些本质特征: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②。以民族国家的内涵来考量,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是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期陷于列强入侵、战火频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被欺凌境地。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勇敢探求,救亡图存。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皆以失败而告终,没有找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中华民族在建立民族国家历程中的重要一步。但随着1922年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之日起,就将政党宗旨和使命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发生了质的蜕变,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进入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自此以后,一直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民族国家的建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反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诸多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政党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捍卫国家主权最坚定,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最坚决,反击外敌侵略最勇敢,抗日斗争最坚决,成为凝聚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精神依托和中流砥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空前升华,“中华民族”民族属性的成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我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二是经过近30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获得了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实现了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认同相统一。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民主共和政体,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百年互动历程,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历程,我们由此而说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型政党,也是人民的政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一条有别于多数西方国家的路径,这就是政党主导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多数西方国家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是民族国家建立后议会斗争的产物。中国是政党建立了国家,政党主导着现代国家建构的整个过程。政党先建立了军队,夺取了政权,而后又主导建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并由此而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220页。

② 周平:《对多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91页。

创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的新范式。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以下特征：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聚合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相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概言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富国和改革强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最终完成，中国成功地以现代国家之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49年到1956年，在这七年的过渡时期，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目标，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建立起来。

伴随着政治上的“一边倒”，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也采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中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并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由于对于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认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中，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历史积累问题的日益显露，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痛定思痛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于此不约而同地开启了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几乎同时进行的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结果是苏联解体，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强国之路。毫无疑问，导致两个国家截然不同命运的关键原因是两国执政党对改革方向的不同选择。从中可以看到，执政党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其所领导的国家的命运。正所谓“党败则国家倾危”，苏联的解体就是源于苏共的自身失误。具体而言，就是其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态度。

苏联在改革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其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放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先产生了党内的分裂，进而形成了多个党派，最终演变为多党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共产党内派系林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和以利加乔夫为主导的传统派各执一词、彼此攻讦，最终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分裂。分裂后的苏联共产党沦为代表不同派别利益而非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党内各派强烈要求拥有表达利益的正常制度渠道，于是多党制应运而生，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最终被自身所摧毁。在多党制的背景下，自身都不再坚持领导权的苏联共产党自然不敌叶利钦的激进派，于是改革覆水难收，彻底失败，国家坠入分裂的深渊。

苏联共产党改革失败清楚地表明，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必然削弱甚至消解党的领导，因而保持党的团结的前提是党内高层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注重以党的团结保障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放弃党的领导，优化党的领导而不削弱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一以贯之的主题，中国改革富国的所有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三）治理强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的国家治理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优势和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强国的重要推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并非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凭空捏造，它来自于一定的历史沿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时期（1937年1月—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实行的三三制政权。^①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意味着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彼时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呼吁民主。迫于形势，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激烈的斗争国共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以坚持长期合作，避免发生内战为出发点，迫使国民党同意广邀各民主党派及社会精英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不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之间合作的基础，也凝聚了双方的共识，即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阴谋。在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以后，各民主党派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初，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精英等赶赴北京召开“新的”^②（没有国民党反动派操纵和参与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建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清楚地表明，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是这一政党制度带来的显著优势。此后，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发挥着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它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机构，使各民主党派就国家发展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民主讨论与协商，凝聚共识，整合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涵之一。

新型的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带来稳定性。一是促进国家政策的稳定。新型政党制度不是“一言堂”，而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为国家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各抒己见的“会议室”，是政治决策科学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保证了国家治理的稳定性，使国家治理始终向“更优化”迈进。二是保障国家政局的稳定。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保证国内各阶层、社会组织、利益群体，以及公民代表能够依法有序地参与国家的治理。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单一治理主体便与民主的含义相违背，会造成政局的动荡与政治系统的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地位，确立了参与国家治理过程的程序，避免了秩序的紊乱和政治局势的混乱。新型政党制度也有效地吸纳了新生社会力量，扩大了政党的阶级基础，使改革开放进程中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获得了进入政治体制、在体制内表达权利和诉求的合法渠道。新生社会力量的代表通过政协，在政协会议中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表达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这就有效减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新生社会力量对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外部压力，提升了国家制度的体制吸纳力，促进了政局稳定。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民主监督的职能，即监督国家宪法与法律的实施，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等，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型的政党制度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高效的执行力。中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

^① 徐世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开端——简论延安时期三三制政权》，《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51—55页。

^② 邹吉川：《从旧政协到新政协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8页。

国家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它避免了这些政党制度所带来的弊端。相比于实行一党制的国家，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带来的优势在于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且更具有合法性。而相较于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带来了更高的执行力。无论是两党轮流执政或是多党竞争，都避免不了党派之间互相推诿扯皮、拖后腿的情况。

四、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内涵、特征与创新性

（一）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是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百年互动历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是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历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因素在国家治理模式上的体现，其主要含义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具体包含如下内涵：（1）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等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2）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其主导着国家治理的方向和成效；（3）中国共产党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通过协商民主整合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社会力量，实现党际治理；（4）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内治理，推动党建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建设良好政治文化的方向迈进；（5）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层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保障人民民主的广泛实现，整合社会多元治理力量协同实现党外治理即社会治理；（6）在基层社会，以身处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之中的党员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撬动组织和社区的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通过党组织链接聚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协作共治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统一凝聚的结果，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具有以下特征：（1）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多元力量中的主元，“政党主导”是国家治理的中枢和中轴，整个国家治理过程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展开的；（2）中国共产党以“政党—政府—社会”的治理逻辑展开国家治理，形塑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新样态，即凭借“党领导一切”的核心地位，通过党组织链接聚合政治力量、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以自身的政治使命、组织体系和政党意志等主导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党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政治认同的巩固和价值观的整合，凝聚和奠定国家治理的最大共识，为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提供动力机制，促进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4）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是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这一范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较高的国家治理效能；（5）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范式有别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国家，避免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和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能够保证治理活动具有持续性、治理政策具有连贯性、治理效能高效并稳定。

（三）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创新性

1.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核心要素是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权，党主导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一方面，这意味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党领导建构国家治理体系蕴含着对现代国家治理秩序的价值和追求，党的领导制度强调以先进思想武装全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科学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组织形态嵌入政府体系，将尊崇

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推广到全社会,实现政党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统一。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党领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党的精英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党政统筹结构^①,将党的组织机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行动准则植入政府体系,使政府更准确更直接地领会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提升治理能力。如此,党主导国家治理,通过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总揽全局,建立对国家治理的高度责任。

2.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有选择地吸纳了西方协商治理、新公共治理等治理范式中积极的新要素,使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手段方式与世界发展和时代进步俱进。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其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来保证公民个体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将公民的意见合理地吸纳到政府决策过程中,是协商民主理念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协商治理范式包含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原则。新公共治理范式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其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推动了以刻板、官僚科层制为特征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治理范式向灵活的、市场化的新公共治理范式的转变。协商治理在我国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得到普遍运用,通过政治吸纳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增加了政府治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能有效凝聚国家治理的最大力量。新公共治理范式的某些要素在公共治理中的吸纳重新建构了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等诸多关系的深刻变化,政府体制改革使政府内部组织结构重组和再造,向扁平化、柔性化发展,增强了政府组织的弹性,减少了官僚科层制特征。

3.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创造性地建构了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在政党结构上的反映。这种结构的长期保持表明其具有合理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新型的政党制度使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广大群众能够通过协商、参与、监督等运行机制,凝聚共识,整合、汇聚同向同行的力量,实现对国家治理的有序参与,形成国家治理的最大合力,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和价值。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具有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三是对世界其它国家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处理党际关系具有启发作用。四是丰富了国家治理的范式,创新了政党、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当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优化的主要方向是政党治理的现代化,主要包括政党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的现代化。政党治理现代化建构,要紧扣制度理念、制度体系、制度执行和制度效能几大框架思考,从而以政党治理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罗雷

^① 方雷、孟燕:《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21页。

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以浙江省X县“请你来协商”中的“加梯”议题为例

徐伟安，郑功帅

(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浙江 诸暨 311800)

摘要：新时代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变革带来丰厚红利，同时也导致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基层治理难度和问题大量增加，仅靠传统基层协商手段已难以有效应对解决。县级政协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提升基层群众协商积极性等方面，具有嵌入基层治理的天然优势和逻辑必然性。协同治理理论为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在“协同的起始条件、规范的制度化流程、较强的领导力支撑”等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X县“请你来协商”的成功实践进行解析，建议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可通过以制度权威营造信任氛围、借助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以全程监督评价促进结果落实等路径，促进县级政协与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协同治理；基层治理；请你来协商；县级政协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3-0047-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要实现这一目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重要基础和重点难点之一。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①可见，基层民主协商对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根据2015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我国目前共有七大协商渠道，分别是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其中，政协协商因其协商机构的专门性、协商参与的广泛性而备受瞩目。县级政协作为距离群众最近的基层政协机关，具备嵌入基层治理的先天优势。在协同治理视域下，对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逻辑必然

（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发展变革，我国社会利益格局不断分化，新

作者简介：徐伟安，中共诸暨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民主协商与治理研究；郑功帅，中共诸暨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枫桥经验”创新。

^①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第41页。

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社会进入矛盾集中凸显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面对多元利益主体和复杂矛盾纠纷,单靠行政力量的干预已经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建立健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制度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基层社会治理对协商的迫切需求与人民政协一贯倡导的“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基本理念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① 这为新时代的政协协商指明了方向。对县级政协而言,顺应基层治理需求,充分发挥自身协商资源优势,主动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贡献力量,既是应然也是必然。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中,县级政协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协商机构的专门优势,为基层协商提供民主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支撑,进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 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咨询性基层协商民主^②,在1999年诞生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制度中得到了较好呈现,而其繁荣兴盛则是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后。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活力和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仍处于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和实践总结不足的阶段,尤其是在制度化层面还比较欠缺。鉴于协商主体的“草根性再加利益的纠缠性”,^③基层协商民主容易出现无果而终的情况。比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以下简称“加梯”)的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需求面前,单靠社区主导下的基层民主协商根本无法达成既定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较强制度保障的政协协商如能及时嵌入,便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这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提升基层群众协商积极性的必然要求

面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矛盾冲突、价值分歧、人际信用式微”^④等基层治理难题,群众需要养成理性面对、友好协商的良好行为习惯。这一习惯的养成需要在一件件基层矛盾和事项的协商解决中得到不断强化,然而由于基层协商民主固有的结果不确定性、程序的不规范性等因素的影响,群众得到的结果往往不理想,导致对群众良好协商习惯养成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利于提升群众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积极性。而县级政协通过深度嵌入基层民主协商,可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组织优势、结构优势、功能优势、智力优势,引导群众依法依规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以较高的成功率实现对群众良好协商习惯养成的正向强化。

二、理论运用与分析框架

(一) 笔者主要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

协同治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认为协同治理是“一种以参与共识为决策导向的新型治理模式”。在协同治理中,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与企业、非政府组织、群体或个人为了解决一个共同面临的难题,通过正式的协商,以民主决策的形式,最终达成协商参与者普遍认可的共识。它是基于“时间、信任和相互依存”而引发的利益相关方持续的互动与互构。这种信任和相互依存随着协同的推进不断得以强化。如果其中一方对其余参与主体缺少信任,就有可能打破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015年7月22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7/22/content_2900883.htm, 2022年7月3日。

^② 林尚立:《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韩福国主编:《基层协商民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③ 董明:《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71—81页。

^④ 周燕妮:《浅谈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赣、浙两省个案的对比研究》,《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第45—48页。

这种动态的平衡，进而使协同失败。要使协同治理的整个流程得以开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协同得以发生的初始条件，即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权力和资源以及信息不对等的情况，需要通过协同才能解决问题。二是协同得以进行的制度保障，即能够有一套正式的流程设计，确保利益相关各方的诉求都能在有序协商中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进而促成问题的最终解决。三是协同得以成功的领导力保障，即当协同各方因利益的纠葛而陷入困顿时，或者权力资源严重失衡需要干预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能够适时出现并发挥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协同治理理论与“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契合

浙江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使命担当的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开拓创新精神，不断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充分发挥县级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用，助力基层化解治理难题，助推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浙江省政协于2018年7月在部分县（市、区）政协开展了“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这一平台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一个综合性、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商议政平台。2019年3月，在总结试点地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印发《县（市、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请你来协商”开始在省域层面全面推广。

“请你来协商”与协同治理理论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很好的契合性。一是具备引发协同的起始条件。基层治理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原因是权力和资源以及信息的不对等。一方面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公共事务的权力和资源，也有着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政治动力，却由于信息或平台有限而不能及时介入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中来；另一方面，基层群众深受矛盾和问题困扰，却因信息的不对称，不知道找谁来解决。在双方都有着强烈协商动机的情况下，利益相关各方借助“请你来协商”平台实现协同治理也就成为必然。二是具备规范的制度化流程。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一旦离开可操作化的程序，就没有真正的治理效率”^①。只有在规范有序的制度流程引导下，协商各方才能彼此信任、平等协商。在“6+X”年度协商基本任务^②基础上，“请你来协商”围绕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通过议题征集、组织调研、充分协商、常态监督、协商成果运用等，建章立制，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闭环。此外，浙江省还在提升“请你来协商”辨识度上下功夫，通过统一标识、“去中心化”的场景布置等，让群众喜闻乐见，从而变“请你来协商”为“主动来协商”。三是具备较强的领导力支撑。强大领导力是推动协商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请你来协商”从一开始进行制度设计就着重考虑了领导力因素。如浙江以省委的名义印发《县（市、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其深意就在于赋予这一平台强大的领导权威。此外，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党政主要领导都制度化参与其中，这无形中给了相关部门以政治压力，也给参与协商的群众以信心。

三、X县“请你来协商”中的“加梯”案例描述与分析

（一）问题缘起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X县要求加装电梯（以下简称“加梯”）的居民越来越多。但“加梯”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其涉及居民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一是无人愿牵头。有关政策规定，居民是加装电梯的主体，在相关部门指导配合下，共同推动落实。但居民普遍不想出面做申办“加梯”相关一系列事务的牵头人，原因在于这件事情“费力不讨好”，要热心不怕烦、有一定电梯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协调能力。二是意见难统

^① 董明：《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71—81页。

^② “6+X”年度协商基本任务，其中“6”是指每年开展6次列为规定动作的专门协商活动，“X”是指在6次列为规定动作的协商活动基础上，开展灵活、多样、小微的专门协商活动。

一。居住在同一幢楼上的居民,因所住楼层不同,加装电梯的意愿也不同,越是住在高层的居民加装电梯的意愿越强烈,住在三层以下尤其是住在第一层的居民,对加装电梯存在较强抵触情绪,认为装电梯后不但有噪音,还影响采光,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种情况下,仅靠居民之间的自我协调来解决“加梯”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十分困难。三是费用难分摊。由于不同楼层居民加装电梯的意愿强弱不同,导致在加装电梯费用分摊上难以达成一致。住在一楼的住户不愿分摊任何费用,住在较低楼层的住户不想比住高层的多分摊费用。到底如何分摊才公平,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协调。此外,“加梯”过程中的“规划设计、审批、资金预算、监管、施工、审批、技术、政策、运营等各环节及所涉及各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依然无法回避”。^①针对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X县将其列入“请你来协商”的重要议题,力图通过这一协商平台,实现问题的圆满解决。

(二) 协同治理过程

1. 确定协商议题。为确保“请你来协商”的议题能够准确反映群众的“急难愁盼”,X县政协通过深入社区群调研、发放调查问卷表、召开政协委员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同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协主席会议,确定“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议题作为“请你来协商”的议题,报请县委主要领导批准后启动实施。

2. 开展深入调研。确定“请你来协商”“加梯”议题后,X县政协成立了以相关委办牵头的专门调研组,围绕加装电梯中的一系列问题深入社区和相关部门进行走访调研,征求意见建议。

3. 召开协商会议。在深入走访调研、听取意见建议基础上,X县政协邀请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委办、县政府办主要负责人,县建设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部分政协委员,社区群众代表等人员,在某社区服务中心召开“请你来协商”圆桌会议。会上,大家围绕“加梯”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对一些需要有关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县政府主要领导当场要求各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予以解决。最后,县委主要领导表态发言,并作出具体部署。

4. 督促结果落实。有了“请你来协商”后,X县政协通过组织政协委员督察、下发督促落实通知书等,对协商结果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并在电梯加装后进行持续的跟踪督察,防止出现电梯加装后无人管无人问的情况。

四、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

(一) 嵌入制度权威营造信任氛围

实现有效协同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多元主体间的互信。县级政协在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必须通过规范的制度、闭环的流程和领导的权威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一是制度化选题确保协商议题“实”。群众对“形式主义”恨之入骨,对没有实质性的议题漠不关心,也就不可能对县级政协的嵌入产生信任感。浙江省“请你来协商”通过“党政交题、委员荐题、各方征题、政协选题”等多元途径,确保所选基层治理议题切中要害、群众满意。诸如停车难、上学难、“加梯”难等,皆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难事、急事,也是仅仅依靠社区和群众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从这些关键事情切入,能够更好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进而充分调动起他们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流程闭环确保协商过程“实”。在试点基础上,2019年3月,浙江省委专门制定下发《县(市、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省政协顺势建章立制,制定操作手册、统一平台标识、创作主题歌曲,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把“请你来协商”打造成一个规范严密的协商闭环流程,这一流程囊括了从议题选择到平等协商再到结果落实、监督评价等的全过程,有效防止了“只议不动”和“动而无效”,给群众以踏实感和信任感。三是领导重视确保协商结果“实”。在“请你来协商”过程中,从一开始的县(市)主

^① 周燕妮:《浅谈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赣、浙两省个案的对比研究》,《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第45—48页。

要领导点题，到主要领导全程参与和过问，为协商结果的有效落实提供了强大的权威保障。

（二）借助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

协商民主是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基本途径。要实现有效协商，必须使参与者有充分的发言机会，并能够通过细心的倾听与对话来弥合彼此之间的认知偏差。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可以借助自己“专业化、专题化、区别化、全程化、制度化”^①的先天优势，打造和担当协商平台，并通过制度化，对协商的“主体、内容、机制、场所、形式、评价体系”等作出相关规定，进而在确认相关公共利益的内容、范围和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协商和整合，把作为不同主体意志之和的众意聚合转化为不同主体意志共同的公意，使决策得到多元主体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解决治理难题夯实基础。^②通过“请你来协商”平台的打造，与协商议题相关的各类主体在此通过平等协商，最终实现了问题的圆满解决。

（三）全程监督评价促进结果落实

监督是促成协商成果落地的关键举措。一是县级政协在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充分运用好“科层”压力，建立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促进协商成果及时有效落实。如在“请你来协商”的“加梯”议题中，X县从一开始便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传统和新兴媒体对“加梯”事项进行广泛宣传，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舆论监督压力，推动他们主动服务“加梯”协商。二是通过引入领导权威，形成强大科层压力，让公共权力直线职能式运行的机关部门，在主要领导监督下打破“部门壁垒”，积极沟通，主动协同，促进问题解决。三是通过定期召开“加梯”进度协调会，组织政协委员进行监督评价问责，进一步倒逼相关部门落实协商成果。监督评价的同时，对“加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再次协商。

五、结语与讨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基层治理矛盾集中凸显的当下，仅靠基层协商已经难以实现问题的高效、圆满解决。面对诸如“加梯”这样的“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具备嵌入基层治理、解决基层矛盾的政治优势、民主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体系和权威机构的嵌入，建构信任氛围，借助政协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全程监督、跟踪评价促进结果落实，从而较好实现了县级政协对基层治理的有效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避免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委政府政绩偏好影响信任机制的构建。由于对政绩的偏好，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可能会主导选择比较容易处理的基层治理问题进行协商，若出现这种避重就轻、貌似积极实则敷衍塞责的情况，将掩盖亟待协商解决的突出矛盾或重要问题，造成对群众根本利益的忽视，影响群众对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工作模式的信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积极参与的热情。二是协商主体的选择趋于精英化，这将影响协商效果。长期以来，政协参政议政主体的选择存在精英化倾向，如果把这种倾向带到基层治理中来，将不利于充分争取和维护普通群众的利益，这种嵌入模式的意义、优势和效能将大打折扣。三是若评价过程和结果的运用流于形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嵌入效果。能够有效实施监督评价本是政协的制度优势，但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优势，让评价结果只停留在“纸面”上而不积极督促落实，必将极大地影响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实效。

责任编辑：罗雷

^① 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新时代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19年度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0页。

^② 浙江省民政厅主编：《面向未来：浙江社区治理的创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1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三种形态

王新红, 张 翠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下, 构建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构建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表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日常生活话语三种形态。政治话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 学术话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关键承载, 日常生活话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创新模式。三种话语形态的有机融合与贯通, 有利于增强民族工作话语的公信力、感召力、说服力, 有利于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

关键词: 民族工作; 话语体系; 政治话语; 学术话语; 日常生活话语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052-05

话语体系表现为“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 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 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①。所以, 建构话语体系就在于获取话语权。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最早就提出了“话语即权力”^②的观点, 他认为任何话语的生产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利关系, 人能通过话语赋予自身权利。因此拥有话语权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利,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谋求自身话语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进而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民族工作也进入了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时代背景下, 构建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也是解决民族工作话语“失范”“失声”问题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剖析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三种形态, 消解西方国家长期所形成的话语霸权, 进而获得民族工作话语权, 推动蕴含政治话语、理论话语、日常生活话语三种形态的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

基金项目: 2021年云南大学人文社科基金“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研究”(2021YNUGSP015); 云南大学2022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运用系统思维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2Z01)。

作者简介: 王新红,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博士后合作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张翠,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① 张国祚:《中国话语体系应如何打造》,《人民日报》2012年7月11日,第7版。

② 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一、政治话语：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

美国学者福克斯·米勒认为“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①，因而话语本身所囊括的一个特性就是政治性。政治话语是统治阶级在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语言表达，它既刻画和彰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与主张，同时也成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政治话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凭借一系列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政治活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去传达其核心价值观，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政治话语主要来源于领导人的讲话与著作、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或文件、官方新闻报道等。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先后召开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对民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就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也成为民族工作政治话语的核心要素，其丰富内容涵盖了民族工作的根本立场原则、核心理论观点、主要方式方法和基本工作实践四个维度，科学解答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鲜明特性，表现在：其一，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权威性。政治话语实质上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主张的彰显，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核心价值观，这就决定了它的权威性。具体而言，我国民族工作政治话语是从国家层面对其基本范畴和领域指明方向、划定界限，它是国家最具影响力和最具有权威性的官方话语。无论什么时候，我国推进民族工作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因为这是它具有权威性的关键所在。其二，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人民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保了政治话语的人民性。民族工作政治话语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维护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确保各民族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用法治思维保障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战略任务，等等。其三，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时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始终把民族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不断探索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工作政治话语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更新的，它会根据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现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人民需求，对话语方式作出相应调整，使之更契合各民族当前的利益，更好地推动各民族地区发展，更快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从而进一步增强政治话语的说服力。

二、学术话语：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关键承载

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仅需要政治话语的政治性提升其权威效力，还需要学术话语的学理性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即专门且系统的

^① [美] 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知识。因而学术话语就是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与交流实践中产生的专门的、系统的、科学的学理表达方式，它往往以传递知识内容、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受众理解这个领域的内容。

为有效应对西方民族话语模式所带来的冲击，充分化解本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存在的“失语症”、话语传播载体单一、话语争辩与困境等问题，同时更加坚定本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底气，进而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内在动力，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艰难的探索中不断提升，在优秀学术成果的继承中不断完善，积极构建起独具一格的新时代民族工作学术话语体系，为世界民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一是在关于“民族”与“族群”的争论中，尽管“族群”外延更广、学术性更为浓厚一些，但我国坚持使用“民族”的概念进行诠释，这正是源于“民族”概念在我国具有的深厚历史基础与民族情感基础，同时更关乎民族团结稳定与国家安全；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治理”理念丰富了我国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内容，拓宽了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执行方式；三是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019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以“9个坚持”“4个共同”“5个方面要求”丰富了“多元一体”的内涵，构成了一整套全面系统、有机统一的民族观。其中还蕴涵着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通过强有力的中国民族学术话语全面深刻地解读了中华民族，进而直面、回应西方质疑的话语，将中国故事用中国方式向世界传递。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①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学术话语具有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系统的、科学的话语逻辑，其原创性、主体性、规范性、理论性的特征为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百花园增添了鲜亮的色彩。新时代的中国想要保持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特色，其首要原则必须坚定理论自信。正是民族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为其理论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学术话语权，同时民族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理论自信。新时代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构建，需要我们对于本民族的学术理论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认同、坚定信奉和执着追求的态度。一方面，要坚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术话语去解读中国民族问题、中国故事，充分展示出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自信，凭借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向世界表达“中国梦”；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丰富和完善学术话语体系，让世界聆听中国民族工作的学术声音，看到中国力量与民族团结，从而提升本民族的理论自信心和吸引力。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因而其根本动力在于创新学术话语。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创新要以对民族工作实际问题的独立思考为出发点，着力突破范式藩篱和方法禁锢，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哲理，在吸取西方话语精粹的同时，赋予其中国内涵，促使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具有中国特色。与此同时，对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创新需要以概念创新、体系创新、传播创新为着力点，把学术话语创新与学术话语应用结合起来，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自主创新，发挥其最大效用。孙中山说过“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当今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术性人才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因此，要更有效地运用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其基本路径在于构筑学术人才高地。一方面，在保证人才质量的前提下，适时地扩大民族工作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者的数量，比如可以培养选拔一部分有想法、有学术成果的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听取他们的观点，使学术话语内涵更为丰富和实用；另一方面，在尊重人才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学术人才的素质，这既要求他们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需要他们加强实践锻炼和关注全球发展形势，从而夯实我国学术人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才根基,保障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有序推进。

三、日常生活话语: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创新模式

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要想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支持与配合,必须深入群众,脚踏实地。换言之,也就是从民族日常生活话语的视阈下对其进行建构。正如舒茨所言: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生活事实”。^①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内容,因而日常生活话语是理解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寓所,它主要来源于个体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是通过结合不同历史时代特点和人民日常生活的语言风格所形成的符合人民日常言语特点、风格和习惯的通俗性话语。

民族工作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在新时代背景下,赋予民族工作话语日常生活化的表达,就是为了让民族工作话语更深入人心,更为人民所理解。在实现全面小康与民族地区的关系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②。这充分凸显了民族地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赢得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也激发了他们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强调各民族平等团结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③。“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各民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④。习近平总书记以“石榴籽”“生命线”“船”和“帆”等比喻民族团结,这既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话语的创新和亮点,同时形象、贴切地表明了民族团结的在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抽象晦涩的话语转化为形象具体的表达,既能确保党的政策落地生根,还能让人民体会到话语的熟悉感和亲近感,也更能让人民明白话语所表达的深刻道理。

处在全球化、开放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中,我国的民族工作在日常生活话语领域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民族工作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话语并为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因而需将以下两个方面作为着力点:

其一,回归日常生活,切实关注民生问题,增强民族工作话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来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把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实际行动解民忧、释民惑、暖民心,获得了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政策和措施的认可。同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上,要深入民族地区调研,结合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特点、不同少数民族人民的发展需求,既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日常生活问题,使其物质生活获得基本保障,又要统筹协调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其公平和正义,还要注重民族地区的精神文化建设,引导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树立正确、全

^① [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霍桂桓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② 李斌、李自良:《全面实现小康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侧记》,《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2015年10月1日,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jp/zyjh/201510/t20151001_2891099.shtml,2022年8月24日。

面的幸福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倾听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声音,回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推进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民族工作话语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其二,注重民族地区日常生活领域的大众文化建设,高效凝练民族工作日常生活话语。在新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加强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已是时代呼唤、民心所向。由于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注重大众文化建设对于日常生活话语的形成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可以创新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拓宽大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达到丰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效果,进而促使民族工作日常生活话语呈现多样化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大众文化的品质,以积极向上的文化引领人民的日常生活生活,提升日常生活话语的价值,高效地凝练出民族工作日常生活话语的精华。

四、三种形态: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融合与贯通

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三种形态相互支撑,共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着力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有机融合与贯通,这不仅仅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

第一,坚持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机融合。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构建要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既不能脱离政治话语只注重纯学术话语,也不能只讲学理性不讲政治性,这容易导致方向性错误。同样,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政治性不讲学理性,这会使政治话语缺乏科学性。所以,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治话语对学术话语的规范作用,为其提供良好传播环境的同时,也要发挥出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的作用,旨在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良性互动,即学术话语促进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引导学术话语,最终共同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展开。

第二,坚持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统一。学理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看似与大众化、通俗化、多样化的日常生活话语大相径庭,实质上,将两者有机融合是完全符合内在逻辑的。要彰显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生命力,就必须把民族地区人民的发展状况等现实问题作为出发点,在反映实际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借鉴日常生活话语中的合理成分,将抽象难懂的学理性表达转述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话语,凸显出日常生活话语沟通学术话语与人民群众的纽带作用,最终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人民群众呈现出来并为他们所真正理解、掌握。另外,日常生活话语如果过于零碎、随性会缺乏指导性、科学性。因而,需要学术话语为其提供学理支撑,进而提高话语的深度和价值。

第三,坚持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整合。政治话语是反映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官方话语,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话语表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人民群众,而日常生活话语的风格也是与人民群众日常表达的习惯、特点相符合,这就表明了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即都是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因此,将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有机整合,既能让政治话语为日常生活话语指明方向,划定基本范围,也能反映出日常生活话语对政治话语的认同与理解。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在阐述民族关系、民族经济发展等问题上,在契合时代特点与话语原意的基础上,将权威的政治话语通过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话语表达出来,将更为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杨松禄

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问题和进路研究

王 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 要: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责任,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必须旗帜鲜明地推进。云南民族地区通过提供有效政策保障、不断完善方法措施、提高目标人群针对性、保障经费投入力度等一系列举措,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面临着条件保障不足、工作进展不平衡、队伍建设需加强等多方面的问题。只有不断加强条件保障和宣传力度,突出工作重点,与劳动技能提升和示范创建相结合,才能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切实提升工作的效果和水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更加坚实的语言基础。

关键词: 云南民族地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3-0057-0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①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②各民族群众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各族群众打开更广阔知识之门,在更为广阔的就业舞台上成就事业与搭建合作平台,更有利于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云南坚持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关键工作、基础工程,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云南“边疆、民族、山区、美丽”的省情特点,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取得新进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21BH143);“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经费支持。

作者简介: 王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人类学。

^① 《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光明网,2021年3月5日, https://politics.gmw.cn/2021-03/05/content_34664468.htm, 2022年8月24日。

^② 祁进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凝聚文化认同》,《人民周刊》2021年第7期,第16页。

个五年,是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关键五年。因此,认真分析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及其成效,梳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进路,集聚各方资源,聚焦重点领域,进一步夯实语言文字认同这一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作出云南贡献。

一、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实践探索

云南各地结合工作职能,聚焦难点和重点采取一系列举措,完善政策保障和经费投入,针对不同的目标对象,不断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有效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 提供有效政策保障

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①云南不仅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还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内容纳入到涉及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相关规划中。2013年颁布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②云南在制定《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16—2020年)》等多个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的条例和规划中,明确提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力度”“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等要求,在《云南省“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推广普通话及素质提升实施方案》《云南省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和方案修改、完善中,提出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意见建议。

(二) 不断完善方法措施

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要是在五个方面聚焦。一是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云南在民族地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自觉意识。^③如云南广播电视台先后播发《语言文字扶贫APP上线助力云南“直过民族”脱贫攻坚》等新闻,昆明、大理、普洱、曲靖、临沧、德宏等地的广播电视台积极宣传报道系列活动、播放推普周宣传片,在全省上下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二是实施双语教学模式。云南坚持以普通话教学为主,辅之以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普通话教学的有效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学校低年级的孩子更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是开展双语志愿服务。2018年以来,云南省民宗委牵头,联合省文明办、团省委等单位指导云南民族大学成立32支大学生民汉双语志愿服务团,1400余人次深入“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39个县334个村寨开展志愿服务。^④双语志愿服务者通过禁毒防艾宣传、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5年08月31日,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31/content_27920.htm, 2022年8月24日。

^②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2013年4月1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401/c87228-20979769.html>, 2022年8月1日。

^③ 王晨:《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周年之际》,《中国民族》2020年第11期,第10—13页。

^④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数据,2021年5月。

健康生活培训、政策方针普及、专业技能讲座等形式,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四是开展双语科普工作。云南重点在国家通用语言普及薄弱地区,通过建立双语科普服务站、建设双语科普专家志愿者队伍、开发双语科普资源、培育双语科普示范基地和示范户等方式,^①达到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与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双推进”的目的。“十三五”期间,云南在14个州的32个县(市、区),对“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较大的自然村,以开展双语科普为抓手,累计投入和整合资金近2000万元,建立双语科普服务站32个,针对10余个产业开展科普服务,直接受益群众3万余人。^②澜沧县竹塘乡、沧源县勐角乡被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协确定为“边境民族地区双语科普试点单位”。^③五是支持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从2016年起,云南省民宗委牵头,与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云南省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说课比赛。随后五年,云南省16个州市近800所学校20余个民族的800名教师参加了比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师生中铸牢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交流平台。2021年第六届说课比赛名称变更为“云南省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在云南省民宗委、省教育厅共同印发《在中小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试点工作方案》的基础上,2020年12月,云南省民宗委联合云南省教育厅遴选云南省20所中小学作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试点,^④各试点学校获得了适当的补助经费,通过红歌比赛、举行升旗仪式、经典诵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绘画比赛、征文比赛、主题班会、家长会等多样化的形式,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师生及家长的“五个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师生间沟通交流学习的校园语言和规范用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 提高目标人群针对性

在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中,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群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基层干部、学龄前儿童、学生家长、教师为目标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提升活动。一是采取短期集中培训、座谈交流、入户指导等不同形式,做好安置点群众普通话培训。二是以开展普通话专项培训,普及和巩固提升普通话水平,在全国率先实施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工程,帮助不通汉语的目标人群实现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会认读500个高频常用汉字的目标,提高群众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三是以基层干部为对象,发挥基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公务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四是重点聚焦边疆民族地区,以幼儿感兴趣的讲故事、唱儿歌、玩游戏、看绘本等方式进行交流,以肢体语言等多种形式为幼儿创设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语言环境,让少数民族适龄幼儿在学前教育阶段掌握普通话。五是以学生家长为对象,通过向家长宣传学会普通话的意义和作用,开展“大手拉小手,推普一起走”等活动,让家长参与到幼儿学习普通话的行动中来,实现3至6岁学龄前儿童听懂、会说、敢说普通话。六是以教师为对象,开展教师普通话达标创建,做好教师等有关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及普通话测试经费返还等工作,切实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四) 保障经费投入力度

云南省财政每年统筹资金约6亿元,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免费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科书。自2018年起,省财政每年统筹资金约1.5亿元,支持全省中小学信息化建设。2021

^① 黄薇:《云南省2015年少数民族地区双语科普培训举行》,《今日民族》2015年第9期,第51—52页。

^② 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教科处:《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多措并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21年10月26日, https://mzzj.yn.gov.cn/gzdt/gzdt/202110/t20211026_74631.html, 2022年8月24日。

^③ 方学锋:《边境民族地区双语科普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今日民族》2015年第5期,第47—49页。

^④ 王金虎:《云南省开展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试点工作成效显著》,《民族时报》2021年11月12日,第A01版。

年,省财政继续安排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普及专项500万元,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①确保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支持开展少数民族教师普通话培训,省财政按照每人每年300元的标准予以资金补助,确保民族地区教师普通话等级达到国家规定标准。2016—2020年,云南省财政累计投入资金5216万元,实施“直过民族”语言文字普及专项,累计11.3万名“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不通汉语劳动力进行了普通话培训。^②

二、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显著成效

云南通过坚持久久为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知度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群众汉语表达能力不断提高。2021年3月,云南省语委、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少数民族不通国家通用语言(汉语)调查工作。调查涉及16个州市1420个乡镇、14314个行政村。在所调查的1593.76万少数民族户籍人口中,仅20.22万人不会说汉语,不会说汉语的比例已下降到1.27%。^③云南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汉语表达能力不断提高

作为云南省委、省政府督办的重要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在云南民族地区持续稳步推进。“直过民族”脱贫攻坚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推广工程实施以来,701个行政村创建为普及普通话示范村,^④2万台推普手机发放到民族地区群众手中,使用“语言扶贫APP”学习普通话人数达42.98万人。^⑤民族地区群众汉语表达能力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沟通无障碍。

(二)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实现全覆盖

云南坚持在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奠定了良好基础。教育部启动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建设后,云南持续推进并累计完成7752所学校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建设目标。^⑥9642名少数民族教师通过参加免费培训,普通话达到国家规定等级要求水平持续提升。民族地区师生之间语同音、书同文,为云南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学前学会普通话工作目标基本实现

2018年,云南启动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以推进“一村一幼”建设为基础,以民族地区乡村幼儿为主要目标,把提高少数民族幼儿普通话普及率作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⑦2019年、2020年云南省两次组织3—6岁不通国家通用语幼儿情况统计,并根据摸底情况,针对性通过筛查、补偿机制,确保全省3—6岁在园学前儿童普通话普及率达99%以上。^⑧

(四)重点人群普通话教学稳步推进

推普脱贫攻坚实施后,云南组织民族地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建立对不通国家通用语言少数

① 高月英、王德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政协报》2021年7月19日,第1b版。

② 高月英、王德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政协报》2021年7月19日,第1b版。

③ 云南省教育厅提供数据,2021年5月。

④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21—2025年)》2021年10月25日。

⑤ 云南省教育厅提供数据,2021年5月。

⑥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21—2025年)》2021年10月25日。

⑦ 林碧锋:《云南“语言扶贫”APP助力乡村振兴》,新浪网,2021年3月16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1-03-16/doc-ikkntiam2403888.shtml>, 2022年8月16日。

⑧ 云南省教育厅提供数据,2021年5月。

民族学生筛查机制和挂包帮扶机制，截至2019年，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辅助教学的学生数量为7.92万人，^①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流。

（五）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平稳有序

云南坚决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和普通高中一年级全面完成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工作。三科教师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要求，做到培训全覆盖。全省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试卷。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阶段性任务如期完成。

三、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临的主要问题

云南通过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聚焦“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率先实施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工程，提升少数民族群众普通话交流水平，少数民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愈加牢固，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相通、心灵相通，增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相互帮助、相互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不断强化。^②目前，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面临以下亟待研究解决的困难。

（一）保障条件不足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由于机构、人员、培训经费等问题，组织困难。推普宣传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重点项目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语保工程、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建设等国家要求必须组织开展的工作，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推普攻坚工程中不通国家通用语青壮年人均培训经费较低（每人300元），培训时间较短（3天左右），培训成效不明显。群众参加培训无误工补助，积极性不高。

（二）工作进展不平衡

工作进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两个层面。一是地区之间不平衡。截至2021年，云南省大部分州（市）18岁以上不会普通话人数占少数民族户籍人数的比例都已降至1%以下，^③但西双版纳、丽江、临沧、红河、怒江、迪庆6个州（市）超过1%，这6个州（市）中有4个是民族自治地方。从各州（市）不会普通话的绝对人数来看，怒江、迪庆、红河三个州的总人数占云南省不会普通话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推普工作在部分地区任务仍然较为艰巨。从县市之间来看，25个边境县市不会普通话人数占云南省不会普通话总人数半数以上。二是城乡之间不平衡。推普在市、县（区）、城市社区、中小学（含学前班）工作进度和力度较大，但在乡村、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偏远地区集中攻坚不足，普及进度相对缓慢。

（三）干部教师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干部和教师是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一是普通话水平要求尚未纳入高考。2004年颁布的《云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第九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但尚未纳入公务员招录和任职条件。部分基层机关工作人员普通话达标水平偏低，不能较好满足工作需要。二是基层学校办学水平、师资力量、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乡村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率偏低，语文教师和幼儿语言学科教师未达二级甲等的仍然不少。云南省仍然有2.1万名教师普通话没有达到国家最低等级要求，给云南省普通话教学带来了障碍。

（四）群众会听不会说、会说不愿说的情况依然存在

云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群众学习

^① 云南省教育厅提供数据，2021年5月。

^② 王鉴：《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0年第1期，第18—27页。

^③ 张潇予、罗淋：《从提高“普及度”到提升“普及质量”》，《云南日报》2021年9月2日，第5版。

使用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民族地区受居住分散及语言环境影响,部分群众难以在集中培训时间参训,加之部分村民没有智能手机或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语言扶贫APP培训效果及使用率一般,部分群众会听不会说、会说不愿说的情况较为突出。二是“不会听说”占“不会说”的比例仍较高。云南民族地区不会说普通话(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有20.22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为1.27%。其中,不会听说的有12.66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62.63%,会听不会说的有7.56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37.37%。三是高年龄段“不会说”的比例仍较高。从年龄段来看,所调查的1593.76万人中,18~45周岁不会的有2.48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12.24%;46~60周岁的有6.22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30.76%,其中属异地搬迁的有0.78万人;61周岁以上的有11.52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56.99%。^①

四、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进路思考

针对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应该进一步提高认识,从加强保障条件、提升宣传力度、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技能提升等方面入手,提升工作水平和成效。

(一) 与加强条件保障相结合

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首先要从改善条件、加强保障措施入手。一是加强组织保障。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进一步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高度上,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级语委机构,加强各级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二是加强人员编制、工作、活动和培训方面的经费保障。三是加强机制保障。进一步细化措施,明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形成各部门广泛参与、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建议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集中督查,及时评估工作进展,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二) 与提升宣传力度相结合

不断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让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充分了解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增进国家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丰富宣传内容。继续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适时开展各类标识标牌使用规范汉字检查。充分发挥新媒体、新平台的作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在获取政策信息的同时,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及时总结“推普周”、说课比赛等平台系列活动的经验,以新闻媒体为示范,以服务行业为窗口,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常态化活动,把推普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推动民族地区群众实现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二是高度重视发挥乡村广播的重要作用。建议设立专项资金,与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和边境小康村建设相结合,实现25个边境县应急广播终端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全覆盖,充分利用乡村广播所具有的天然亲和力及贴近性的优势,为促进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发挥作用。

(三) 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要聚焦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才能有效提升云南民族地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一是突出重点地区。从州(市)层面看,要以迪庆、怒江、红河、临沧、丽江、西双版纳等6个18岁以上不会普通话人数占少数民族户籍人数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一的州(市)为重点。从县级层面看,要以25个边境县市为重点,特别是对18岁以上不会普通话人数超过1万的富宁、福贡、绿春三个县开展集中攻坚。从城乡层面看,要以山区、乡村地区为重点,着力解决工作进展不平衡的问题。从边内层面看,以沿边地区374个抵边行政村为

^① 云南省教育厅提供数据,2021年5月。

重点,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相结合,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相关要求纳入边境小康村建设指导性指标体系,设立抵边特岗人才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抵边村就业创业并兼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乡村(社区)辅导员。二是突出重点人群。聚焦不通国家通用语言劳动力普通话培训,帮助目标人群实现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会认读500个高频常用汉字的目标,提高群众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对跨境民族、易地搬迁户和46岁以上仍然不会普通话等重点群体实施培训。巩固强化对18—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民族宗教界人士等的培训和提高,着力实现推广普及“全覆盖”,到达听懂、会说、愿说、会用普通话的目标。重点帮助学龄前儿童学会普通话,确保少数民族幼儿在进入小学前基本具备普通话交流能力,巩固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成果。继续实施民族地区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计划,确保各级各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等级要求。明确把普通话达标作为公务员招录和任职条件,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引领示范作用,建议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日常工作、各项会议等公务活动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规范。

(四) 与劳动技能提升相结合

语言文字能力是劳动技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云南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民族地区群众劳动技能增长。一是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生产力和个人成长红利来推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及外出务工技能培训时,应增加普通话培训课时,利用乡村夜校灵活安排授课时间,通过家庭、社会、培训机构多渠道促进个体劳动者技能提升,使其获得更多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是继续加强双语科普工作。进一步协同相关部门,与民汉双语科普为抓手,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普及,帮助各民族自觉提升获取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存量最大、资源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能力,完善涵盖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双语科普基地和科普工作资源共享平台,完善科普教育培训网络,支持民族地区双语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更为全面、直接、高效地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这将对其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形成正向助推。^①

(五) 与示范创建工作相结合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与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军(警)营、进口岸(边检)、进医院、进家庭的“十进”工作相结合。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宣传媒介,多渠道、全方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唱好民族团结之歌、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纳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和工作任务,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与中小学校示范创建考核相结合。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完善民生汉授、民族预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班等培养模式,配合教育部门在民族地区继续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五、结 语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有效沟通与广泛交流,推动各民族之间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情感融合与观念统一。^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更是做好新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时代要求。只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多措并举,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强大合力,让民族地区的广大群众语言相通,文字相通,心灵相通,才能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刘华夏、袁青欢:《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第8—15页。

^② 张鑫、段雪柳:《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逻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47—55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 实施路径研究

——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个案

罗成雁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 云南 昆明 650111)

摘要: 树立和突出中华民族形象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作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地区, 拥有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 积累了多样化的视觉形象生产方式, 拓展了多元化的视觉形象接受渠道。在视觉文化语境下, 迪庆藏族自治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 系统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品牌培育工程、典型示范工程和统筹融入工程。

关键词: 迪庆藏族自治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视觉形象工程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064-0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① 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以及中华民族形象是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 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其中, 视觉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也是民族形象的重要表征方式。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 就有图腾、图案、建筑、人文景观、服饰、器具造型与装饰等传统的民族形象。作为一套民族的文化识别系统, 承载着民族精神、塑造着民族心理并建构民族认同。在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时代, 在图像化、视觉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社会, 视觉形象更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必不可少的手段,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学界就树立和突出中华民族形象, 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笔者注意到以下研究动态。一是学界对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本身以及相应的视觉形象工

作者简介: 罗成雁,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文艺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视觉文化、文化产业研究。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7日, 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1909/1136990.shtml>, 2019年9月27日。

程还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一定民族文化圈的人们，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往往创造了一系列的视觉艺术符号形式”^①纳入其中，广泛地包括了建筑、绘画、器物、服饰、雕塑、人文景观、戏剧、影视等为代表的多种视觉艺术符号。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视觉形象对共同祖先的拟制、祖先像的圣化和对部分共享性视觉象征的塑造和文化认同构建的机制方面，对当代视觉文化、视觉形象的生成、传播和认同机制研究较少。三是结合地方实际，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路径的个案研究较为缺乏。

从地方实践来看，准确把握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内涵，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创造性地结合当代视觉文化，系统性地实施视觉形象工程，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或推进国旗、党旗、领袖画像、宪法等进民族村寨，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主题街区、主题广场和主题展馆等，或在市政建设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招标，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创意设计征集，积极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建设路径。但是，一方面，“基层政府所理解的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主要局限在国旗、党旗、领袖画像等类型”^②，结合地方历史文化的视觉形象设计较少。另一方面，在实施路径上也较为单一，且与本地文化和社会生活结合不够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群众社会性的“集体意识”，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它也是由每一位中华儿女基于个体人生经历及其生命体验的“个体性民族意识”汇聚而成的，其最终的实现也是通过每一位中华儿女自觉认同于这一意识，并为这一共同体而自觉奋斗。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既要注重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呈现以形成凝聚力，也要着力于各民族文化的展示以切合地方性、差异性的感受方式，更要以贴近中华儿女个体当下生活方式和时代生命体验的形象，唤起情感共鸣，并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总之，不管是概念内涵的再明确，还是深化视觉形象和文化认同机制的再认识，或者是结合地方实际的实施路径探索，都亟待加强地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路径的研究。

在这方面，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路径的研究就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迪庆州是滇、川、藏三省区交汇处，境内有26个民族，千人民族就有9个，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地区。从率先制定出台《迪庆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到《迪庆州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的实施意见》的实施，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到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从持续开展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到“滇西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圈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迪庆州为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亟待探索创新性的路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运作机制

迪庆州通过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工程的方式系统性、持续性地推进。

^① 方李莉：《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再建构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笔谈》，《民族艺术》2021年第1期，第12页。

^② 孟凡行：《在多重关系中理解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笔谈》，《民族艺术》2021年第1期，第16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是一套符号表征系统。视觉是人类接受信息的重要方式。视觉形象是人们认知和识别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符号象征系统。作为符号象征系统,视觉形象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结系统,即由形象表征符号与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构成的表征系统。形象符号的能指与形象内涵的所指都是人类文化活动实践所创造的。虽然这二者之间具有任意性,但也遵循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表征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视觉形象符号直观、具体、可感地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以及相应抽象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停留在意识和概念的层面,要通过各类视觉形象符号具体地表征呈现。这些视觉形象符号可以而且需要在共同体的文化实践中不断进行创造、阐释,进而增强视觉形象符号能指与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联结,并由此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共同体的体认。因此,一方面,需要一系列各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构成符号系统,共同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以及这一实在共同体共同性的不同面向,即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化”。另一方面,这些各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需要不断加以阐释和更新,不断随着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实践而赋予新的意义、体验,实现视觉形象符号及其共同体意识内涵的再生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本身应是一套建构“自我”和“我们”的观看机制。与相对抽象的语言符号不同,视觉形象最大的特征在于其视觉性,即一套“现代世界的主体构建、文化表征的运作以及视觉实践”的机制。视觉形象及其本身的观看机制,“揭示了人类文化行为尤其是视觉文化中看与被看的辩证法,揭示了这一辩证法与现代主体的种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纠葛”。^①即在视觉形象的呈现和观看行为中,建构看与被看辩证关系,形塑“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不仅仅是几个形象的简单呈现,而是通过视觉形象的精心设计及其蕴含的观看机制的运作,建构中华民族“我们”以及身处共同体中的个体的“自我”,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身份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既要有形塑中华民族“我们”的共同的、理想的形象设计,也要切合各民族中华儿女真切的个体人生经历及其生命体验,进而通过每一位中华儿女“自我”的“个体性民族意识”汇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既包含了“我们”共同的各个方面,也包含了各族群众个体的体验和经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应围绕“五个认同”设计和展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是兼具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形象体系。民族视觉形象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符号表征,是“自我”和“我们”的视觉文化实践。中华民族“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②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既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次上共享的精神和共同体意识,也要关注各民族层次上由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兼具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至少有三大层次,第一是各民族自享的视觉形象,第

①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第84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二是多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第三是涵盖前两个层次的视觉形象”。^① 这些形象体系既是在民族的交流和交融中形成的，也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进而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做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象工程，既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视觉形象符号表征实践，也是视觉形象建构主体的文化认同实践，更是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增进共同性的体系性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具体工作要注重共同体意识内涵与视觉形象外化形式的联结的阐释和强化、内在意义和形象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要重视视觉形象观看行动中“我们”和“自我”的文化认同建构；要重视视觉形象共同性与差异性不同层次的呈现体系，最终有机地、系统性地通过视觉形象增进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实施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就是以视觉形象的方式，系统性地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它既是一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思想工作，也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交融、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的综合性文化实践；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实体化”项目，也是融入各族群众生活方式、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系统性工程。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题、主线，视觉形象是手段，并以工程系统性、综合性的方式加以推进。

（一）迪庆州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基础

虽然，迪庆州并未专门实施相关专项行动，但是，迪庆州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独特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资源。与此同时，迪庆州在民族宗教工作、文艺创作、文旅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文化生产方式多样、接受渠道多元，为进一步系统性、综合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丰富，但整理和运用不充分

迪庆州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文化阐释空间广阔，形象素材丰富。迪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既是军事要隘，也是交流要冲，悠久历史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这里既是吐蕃征战南诏时的前哨，也是汉朝的牦牛羌地，也是吐蕃的“神川都督”所在地。忽必烈南征、麽些人北进、固始汗南下、木氏经营康区、滇军入藏、红军长征等等，都带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一是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传说故事、遗迹以及所形成的图腾、图案、建筑、器具造型、服饰装饰等等视觉文化符号，为迪庆州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设计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素材。二是迪庆州宗教文化多元性，造就了具有包容性和交融性的共同体视觉形象符号资源。三是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民俗、民间文化之间的交融是普遍现象。民俗、民间文化兼容并蓄，在呈现形式、服饰符号、形象文化内涵方面，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符号资源。

然而，这些形象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整理和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已有的形象资源的挖掘主要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其次，形象资源运用得不够充分。已整理的文艺形象、影视形象以及历史文化符号仍然没有充分转化并运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① 孟凡行：《在多重关系中理解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笔谈》，《民族艺术》2021年第1期，第17页。

工作之中,有的缺少视觉转化,有的缺少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有的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文旅产品和服务之中。最后,缺少可视化、数字化的形象资源整理手段。迪庆州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资源大多以原生的、零散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一定的数据库加以整理和收藏。一些经典的文艺作品并没有进行可视化的再创作。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中的独特文化符号、形象和实物等并没有得到数字化整理和可视化的呈现。博物馆、主题展览馆的展示较为传统,缺少可视化和数字化的呈现和整理手段。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生产方式多样,但较为突出差异性

迪庆州历来注重发掘民族宗教文化特色助益地方发展,通过文学艺术、影视制作、文旅产业发展等多种方式,进行了迪庆州地方形象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文学艺术方面,迪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和睦共存,备受文学艺术家和旅行者的青睐,历来都是书写、想象、纪录和寄托情怀的理想之地。当代迪庆影视剧作品则更加直观地塑造了迪庆民族团结的视觉形象。与此同时,迪庆州也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中充分发掘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宗教共处的优势,打造了香格里拉的文旅品牌。围绕香格里拉品牌进行的文旅产品和服务也生产了大量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形象元素,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但是,迪庆地处西部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本土文旅消费市场发育不足,资本、技术、人才等文旅产业发展要素较为缺乏。因此,迪庆州文化生产走发掘民族文化资源特色优势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历年来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化的思维惯性。民族文化视觉形象生产较为突出差异性、特色化乃至“猎奇”,而文化共通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共通性的阐释不足。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接受渠道多元,但创新性不足

一是迪庆州通过选树典型和主题活动加强民族团结示范引领。二是通过“九进”工作将民族团结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强调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四是市政工程中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素。迪庆州面向广大市民开放的公园、广场和街区,已设计有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籽意象等方面文字符号和图案等标识,吸引着各族群众在这些公共区域开展广场舞展演、健身等活动。这些融入共同体元素的市政工程为民族团结进步、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但是,视觉形象、形象工程本身容易引起表面化、政绩工程等的联想,加之人们对视觉文化语境的转变认识不够充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思想工作方式创新仍存在不足。一是在宣传教育方式上较为依赖于传统的理论宣讲和民俗展演,往往忽视了可视化的呈现方式。二是宣传的内容方面主要以标语等文字符号为主,视觉形象运用较少,缺少兼具地方性和共同性的视觉形象。三是在宣传教育接受方式较为单一,大众化的、互动的参与性接受方式较少。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化场所视觉符号表面化,没有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难以唤起视觉时代人们的深度认同,视觉符号和形象没有充分发挥观看认同的作用。

综合来看,随着文化语境的不断演变,尤其是视觉文化时代,各类媒体多元化发展、视觉图像不断增殖、拟真图像泛滥等等,带来了表面化、碎片化、猎奇化等视觉文化危机。迪庆也存在着忽视视觉时代文化语境而对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和运用不充分,宣传教育工作视觉化创新不足,各民族文化视觉形象生产过分追求特色而共同性阐释不足,社会治理各个方面融入度不高等问题。

(二) 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的具体路径

针对存在的问题,迪庆州要注重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系统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品牌培育工程、典型示范工程和统筹融入工程。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

第一，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元素数字化整理工作。建立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数据库，一是依托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教育实践中心、州博物馆等机构，将迪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中的图腾、历史遗迹、出土实物、当代遗存等视觉符号和视觉元素进行图像化、数字化转化，并以数据分类等方式分门别类进行存储。二是依托宣传和文旅部门，对迪庆民族题材的宣传片、影视剧、纪录片、视频短片、演艺节目、绘画等视觉艺术作品及其中具有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视觉元素和视觉形象进行数字化修复、分类、留存，对其中猎奇式的、落后的和带有陈规陋习的文化内涵和视觉元素进行重新检视。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元素可视化运用。一是精选政治性强、歧义少、共同性广泛、意蕴深厚的历史、宗教和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视觉元素，在博物馆、展览厅、节庆会展和有条件的公共场所进行图像化、可视化的展示，以可视化的方式加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的体认。二是对于迪庆相关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中讲述的迪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故事、塑造的艺术形象，以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和专业团队运作的方式，进行可视化的再创作，通过搭载影视剧、电竞游戏、文创产品和文旅服务等，扩大这些民族团结艺术形象和故事的影响力，进而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的文化内涵和阐释空间。

第三，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大众化收集反馈平台。一是依托各级融媒体中心开通与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相关的素材收集和反馈通道，让各地、各部门群众收集和反馈在日常生活、专项活动、各类工作以及各地文化习俗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生动场面、故事和形象等，并对所收集的素材进行分类整理、提炼和宣传运用。二是依托文旅部门的舆论监测平台或文旅产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向文旅消费者、游客、兴趣爱好者等州内外广大民众收集和反馈与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视觉形象元素、创意设计、衍生符号、内涵阐释和意见表达等，增强各地各族群众的参与感。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品牌培育工程

第一，丰富“香格里拉”品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涵和视觉形象呈现形式。一是赋予“世界的香格里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加强其中华文化“大同”理想以及迪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和现实的文化阐释，突出表现迪庆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的社会生活。在宣传片、自然景观展示、文旅活动、标识设计、文字符号运用中，加入中华民族共同性文化理想的视觉元素，丰富“世界的香格里拉”形象品牌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理想家园的内涵。二是在往常使用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标语、意象和国旗国歌等视觉元素进景区之外，在突出自然奇观和“世外桃源”等观光之外，还要注重开发兼具差异性和共同性的迪庆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和视觉形象符号，注重研发其中迪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研学和体验的产品和服务，开展“香格里拉”品牌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设计、视频创作等文化互动活动，借助“香格里拉”作为目的地品牌和地方形象品牌，扩大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影响范围。

第二，讲好“五个认同”的视觉故事，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松赞林寺品牌。松赞林寺素有“小布达拉宫”“藏族艺术博物馆”之称，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文化圣地和旅游胜地，也堪称迪庆州的重要文化品牌。一是要注重发掘松赞林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及其各族僧众团结进步的事迹，塑造松赞林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视觉形象。以红军长征过中甸、中甸和平解放、迪庆藏族自治州首任州长松谋活佛、中央访问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等历史故事以及尼旺宗派出所“九个一”的亲情服务模式、“千名干部进村入户（寺）”活动、僧众践行“四条标准”等活动中的各类事迹为题材，以唐卡、影视、历史纪录片、宣传片等视觉形式呈现其中的爱国爱教情怀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内心的真切认同。二是充分发挥松赞林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在主题陈列、路标指示、路

线导览、景区标识、外围设计等方面,以视觉故事的形式,突出展示迪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迹等,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真实可感的体验环境。

第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奔子栏锅庄文化展演,打造各族群众参与性强的民族文化品牌。奔子栏历史上就是茶马古道的咽喉要道,其锅庄文化从服饰、表演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带着明显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印记,是迪庆一张享誉国内外的民俗文化名片。一是结合奔子栏历史文化、民族交往文物遗迹和独特的锅庄舞形式,加强对其中表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挖掘和阐释,并充分利用锅庄文化陈列室、广场等,从“同心圆”等多种视觉形式对其共同体内涵加以形象化的呈现和展演。二是充分运用锅庄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结合本地各民族信仰、生活生产等风俗习惯和场景,加快创作富有时代气息和感染力的感恩锅庄、民族团结锅庄等展演作品,利用文化艺术节、文旅活动、民族节庆等进行广泛展演,调动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其展演之中,唤起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三是将奔子栏锅庄舞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丰富各民族参与的锅庄舞展演形式和渠道,通过自媒体平台、乡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台、省州融媒体和影视平台、省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国际交流渠道等,突出展现迪庆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形象和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一面,进而增强迪庆各族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示范工程

第一,将建塘社区打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工程示范城镇。发掘建塘作为古茶马互市重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故事、遗迹和文化符号,将其故事和遗迹以浮雕、雕塑、影视剧和纪录片等视觉化形式在独克宗古城、街区标识牌、广场、社区文化墙以场景化形式展示和展演,并以文化创意产品、公共服务、环境美化等方式嵌入独克宗古城之中。同时,讲好北门、金龙社区多民族家庭日常生活的视觉故事,以日常的、真实的形象生动呈现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场景。此外,以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活动场所为主要载体,开展社区各族居民广泛参与的文艺展演活动,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交流和文化的交融。

第二,将燕门乡茨中村打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工程示范村。一是以茨中村藏族、汉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怒族、彝族等多民族共居以及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宗教并存的生产和生活现状为题材,围绕民族团结奋进、宗教和顺、文化相融相生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等主题,广泛吸引公共媒体、自媒体、艺术家、影视剧导演以及游客等,开展多民族家庭和睦相处日常生活故事、多宗教和谐与共的精神世界、多文化相融与中华文化精神呈现等方面的视觉艺术创作,并将优秀的视觉形象、视觉符号创作用于茨中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和展示,扩大茨中村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知名度。二是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茨中天主教堂、移民搬迁点形成的多民族村落、多民族家庭等为标志性场所,将茨中村在党的领导下多民族和谐共生、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生活场景以具体的纪实图片、场景浮雕、模拟场景、艺术符号等视觉形象实体化展现。三是围绕茨中村“小香格里拉”的美誉,在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村落美化等过程中,融入多民族共生、多宗教并存和多文化交融的视觉元素,结合自然景观展示,融入“世界的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等旅游品牌打造和路线规划,将茨中村打造为生动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内涵和具体表现的参观目的地。

第三,依托迪庆州博物馆、红军长征博物馆已有的文物展示,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深度体验示范工程。引进和运用现代5G、AR、VR、MR、XR等信息和视觉技术进行体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红军长征、中甸和平解放等历史文化和迪庆多民族家庭、民族团结奋斗等现实生产生活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设计,提升陈展的现场性和体验感。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传播渠道,设计这些沉浸式体验场景的线上体验项目,吸引更广泛的参观者切身体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实体。此外,加强迪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文明标识、历史文化展陈精品、多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和创意产品的设计和陈列,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化、实体化。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统筹融入工程

第一，统筹职能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力量，系统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工程。一是统筹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对内和对外宣传工作、文旅部门和社会治安等职能部门的力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象运用于地区形象宣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之中，整合经费和人力物力，在宣传教育、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中，共同推进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覆盖公共场所、标志性建筑、群众公共服务窗口、乡村环境整治等领域。二是统筹民族宗教事务相关社会组织、文艺协会、文旅产业等各类主体的力量，将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会组织日常运营、文学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创作和文旅产业发展之中。一方面，在民族宗教常规活动、艺术创作和提供文旅产品、服务的过程中，开展广泛的、具有本土特点的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设计、创作和运用，丰富视觉形象的内涵和形式；另一方面，借助文化交流、文艺作品、文旅活动等载体和渠道，扩大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传播渠道和影响范围。

第二，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一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视觉符号融入迪庆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在城乡道路规划、绿化设计，广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环境美化等与各族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融入视觉形象和符号，打造具有迪庆特点的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文化长廊、文艺展演广场、形象主题公园和街区、美丽公路等，展现迪庆各民族文化交流、经济生活相互依存、情感相互亲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场景。二是在方式和手段上融入。以大众化的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呈现和意义生产、再生产融入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发挥自媒体展示功能，发掘迪庆文旅产业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强民族宗教事务和宣传部门引领，以文化集市、创意活动、自媒体创作等大众日常的方式，广泛动员各族群众参与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收集、创作和传播，通过文旅活动中的文化生产—消费，丰富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生产 and 再生产，形成聚集效应和流量倍增。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的工程，既是党委和政府以视觉形象方式开展的宣传思想“实体化”的工作，也是当代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意义生产和文化认同的文化实践。结合迪庆州情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情况，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包括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品牌培育工程、示范工程和统筹融入工程。其中，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是基础，目的在于理清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和视觉符号资源，并由此进行具有迪庆州地方特点的视觉形象设计和运用。视觉形象品牌培育和示范工程是重点和亮点工程，致力于通过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引领作用，既为各地因地制宜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提供参考，也通过精品和亮点扩大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带动作用。视觉形象统筹融入工程是实施主体的力量统筹和各项目、各行业的融入工程，致力于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族群众社会生活并深入人心。最终，通过视觉形象铸牢迪庆州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自觉的文化认同和高度的文化自信，进而转化为各族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自觉。

责任编辑：杨松禄

文化建设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笔谈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于2022年5月30日举办了主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学术沙龙。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省委党校、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民族宗教、国际政治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讨论，深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命题，现将专家学者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中华“大一统”传统与政治共识和文化认同的塑造

李勇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
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历经数千年的执政实践、制度建构和伦理教化，“大一统”最终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大一统”有助于凝聚人们的政治共识，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当前，我们要立足“两个相结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等重要论断，对中华“大一统”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爱国是第一位的”，“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弘扬爱国主义，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这就要求客观认识和全面把握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蚀。中国历史和文化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追求团结统一的“大一统”传统。

一、“大一统”的基本内涵

“大一统”一词，出自《春秋公羊传》，“大”原本是动词，意思是“尊崇”，后来，“大”字逐渐具备形容词的性质，强调传统中国的疆域版图范围须纳入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具体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考诸历史，周朝确立了“大一统”的道义标准；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文官制度成熟定型；宋朝实

现了平民化儒学教育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精英开放；明清时期最终实现了“大一统”民族整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和多民族治理的重要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格局，使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大大增强。历经数千年的政治实践、制度建构和伦理教化，“大一统”最终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大一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是一个政体概念，也是一个政道概念。

正是基于“大一统”传统，我们形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且能够对于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实现充分的包容与融合；正是遵循“大一统”传统，我们锻造出中央政府在各个地区间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在广袤疆域内对于各种人财物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正是得益于“大一统”传统的熏陶，中国人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成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心理基础。

二、“大一统”有助于凝聚人们的政治共识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重塑了新的现代“大一统”——不仅实现地理疆域的基本统一，更是在政治上巩固了中央政权，实现政令法度的统一、经济财力的集中、精英人才的聚合，中华民族也由此统一为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传统的“大一统”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人民性。“人民”不是虚幻的，而是经由血与火的考验塑造出来，是通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阶级联盟形成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协商建国，通过土地革命和改革、“三大改造”、劳资协调、男女平等、城乡互助等社会革命而塑造出来的。

社会主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作为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我们政治共识的底线就是中国不可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离散、中华文化不可消解。当今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因此，这种政治共识底线，必然要求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三、“大一统”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

是否形成大一统格局，是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中华“大一统”在最初建立之时，亦曾受惠于地理空间带来的优势，比如相对封闭又足够广大的土地、特定气候和资源等，使中国有能力支撑起一个大一统政权的长期存续。但是，在大一统秩序的内在发展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其产生出来的一些文化和物质要素，如统一的文字、被广泛接受和学习的文明典籍、具有相同观念的政治精英和士人群体等，这些要素使得大一统政权获得了不断恢复的可能性和生命力。文明秩序比政治秩序更为基本，文明的连续性是政权连续性的重要根据，文明是“大一统”的根基和秩序。正因为中华文明有连续性，所以中国才会在经历多次分裂后又重新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格局，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得以更新和重建。新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留下的文明国家遗产——无论是政统道统合一的基本结构和精英政治传统，还是超越于种族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央集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与传统中国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中华文明的更始重生和全面复兴，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主体。因此，这种文化认同底线同样要求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四、新时代对“大一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于历史传统，我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而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其在

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最终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势必改变旧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注定要遭到来自美西方的围追堵截。我们必须以基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来积极回应意识形态挑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要树立正确国家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精神内核，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大一统”传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进而从容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可能遭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古代天人互益观念

樊泳涓 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和升华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充分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整体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古代天人互益观在以下四个层面存在深度契合。

一、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主流观念和基本内涵，是古代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好的定位与诠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灵魂。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来自大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过程中形成的二者和谐共处、协同进化的过程和最好状态。

二、从“道法自然”到“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

中国哲学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贵就在于能够体会和服从天地生生之德，把顺应和合理利用天地生养万物的规律作为自己的职责，天人同源，天人同德，天与人是宇宙的和谐共同体。习近平在准确界定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前提下，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创造性地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

三、从“取之有道”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

习近平继承古人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强调“‘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认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四、从“仁民爱物”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政治观

习近平秉承“以民为本”思想，以其人民情怀对待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以人为本，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简单等同于经济问题，应该把其当作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问题来谨慎对待。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

系，创造性提出“生命共同体”命题，感悟“取之有度”，提炼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感悟“仁民爱物”，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归结于“民生福祉”，这一系统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古代天人互益观的有机结合。

“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卢光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仁”。儒家把“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和理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处处体现着“仁”的理念和价值。

一、“仁”的三重意涵

“仁”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仁”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也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仁”就是“人+二”，二人，反映的是一种关系性“共在”；基于上述的世界观，“仁”自然而然衍生出了其价值观，“以人为本”是“仁”的根本价值取向；“仁”并不是空洞的说教，“仁”还有其方法论，“仁”的方法论，一是实践，二是由己及人，从身边做起。

二、“仁”的世界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世界以“共在”的眼光看待，从“关系性”视角审视各国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发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是“仁”字拆字反映的世界观，体现了人类存在的“关系性”；“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无疑是“共在”的一种具体表述，“共在”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个体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高度融合，密不可分。

三、“仁”的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倡导“以人为本”的发展，将共同发展的视角落实到人，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脚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使得“爱人”成为现实。在微观上，衡量一个事物的标准就是，是不是有利于人民；在宏观上，衡量一个事物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全人类的福祉。只有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符合的事物，才是真正促进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事物。

四、“仁”的方法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更是生动的实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基于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向全世界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也反映了“从身边做起”的理念。

“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关联，也充分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进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

王燕飞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70余年的艰苦奋斗,从根本上解决了数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温饱问题,实现了14亿人从温饱迈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道路。粮食安全与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注重安全与发展、状态与能力、维护与塑造的内在联系,强调国家安全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的相互促进。

一、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的七个维度

国家粮食安全直接关乎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对于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在国际上免于对国外资源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粮食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命脉,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成为强国控制和制裁有利害关系国家的利器。国家粮食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这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小康、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物质基础。国家粮食安全是军事安全的保证。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战争同样离不开粮食。粮食是战争赖以进行并且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首要物质条件。国家粮食安全关乎科技安全,粮食安全对提高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的粮食科技创新队伍、整体提升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科技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生态安全作为生态平衡的一种状态,表现出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处于良好的状况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状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确保粮食增产、粮食品质的基础条件。国家粮食安全关乎资源安全,我国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土地资源、水资源、种子资源等都是粮食生产要素资源,只有保持资源安全才能从长计议,使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有效举措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和民富国强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保护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绷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这根弦。

围绕粮食的保障供给,先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继而沿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放开搞活粮食流通;围绕防灾减灾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不断健全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探索建立包括主要粮食品种在内的农业灾害保险体系,充实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围绕全面提高粮食产业发展的整体素质、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大力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进粮食产业的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围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方面是倡导全球贸易自由化、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另一方面是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大力推进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古人义利之辨与官员的价值观

尹子能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院长、副教授

“义利之辨”开启于孔子《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辨明于孟子，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等价值取向，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并强调好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在价值观方面，领导干部容易出现的问题：价值目标上，理想信念动摇；价值选择上，急功近利；价值追求上，拜金享乐；价值实践上，奉行实用主义。根据这些问题，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净化和培育。一是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领导干部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坚持清正廉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激活了传统文化本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凝聚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中和之美与文艺的社会功能

王卫东 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等会议上多次就中华文化发表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观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美学精神，根植于文艺实践。

在中国，艺术不是现实之外的另一世界，艺术从来不为其自身而存在，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修身养性、完善个体人格的手段，是人生的深化和扩展。在艺术活动中，人们感受生命，领悟生命，最终完善自己的人生。艺术与人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人很少为艺术而艺术，通常是为人而艺术，艺术体现了人生追求和人生的高度。

一、中和精神与艺术家的人格修养

中和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原则和最高理想。“中”即“性”，指内心，“和”指内心的感情抒发有所节制，能够和谐。“中和”的核心内涵即政治、伦理、艺术以及人格修养的最高理想，是各种多样性和对立性因素和力量相互影响、渗透和平衡后达到的统一。中是前提，和是结果，中是手段，和是目的，有中必有和，非中不能和。文艺工作者只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创作

出优秀的作品。

二、中和原则与文艺的批判功能

追求中和，并不意味着不允许“怨”。孔子认为有三种“怨”是合理的，第一种是对违反仁道者的“怨”，“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其次是对不良政治的“怨”，“择可劳者而劳之，又谁怨”。再次，是君子在仁道不行时也可以“怨”。总之，当人们合理的欲望和情感得不到实现，或遭到压制时，便可以怨，通过艺术表达这种怨自然合理。

三、中和状态与执两用中思维

表面看来，中国古代的“中和”与古希腊的“和谐”并无两般，往深一步，这种相似仅为表层，实质上并不相同。把一切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部分，经抽象还原后，世界俨然成为一个因果对应、等值对称的线性的、决定性的、平衡的世界。文艺同样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础上百花齐放，走向繁荣。

四、中和理想与现实生活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知行合一，或者说，中国文化精神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实践性。艺术不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而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人生的深化，艺术是理想的人生状态。在音乐的境界中，人格获得升华和完成，艺术能改变人的性情，感发人的心灵，使人自觉地接受和实行仁道。

在艺术的最高境界里，理想与现实自然而然地融合统一。艺术由外而内地对人的精神品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陶冶性情、改变人们精神世界的有效手段。

协商民主与“和”文化

杨松禄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扎根于中国土壤，有深厚文化基础。

一、中国的“和”文化孕育了中国协商民主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这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种以“和”为核心的宇宙观、国际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经过数千年的潜移默化，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为中国探索和发展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识等为价值内核的协商民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二、中国协商民主发展了中国的“和”文化

中国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人民政协从诞生之日起，协商建国就充满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以“和”文化为内核的中国协商民主可以为世界提供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

西方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并发展为一种民主理论或民主范式是西方对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伟大贡献。中国人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余载的悠久文明，在这样的文化沃土上生长出来的协商民主制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的，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真谛，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提倡和平、和谐、和睦的价值追求，合作、参与、协商的实践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其价值必将随着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彰显。

中华“和”文化与“四个共同”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

尹未仙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第七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用“四个共同”阐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一、“和”文化与“四个共同”的逻辑契合

（一）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开拓了我们辽阔的疆域。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协和万国”，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生产方式的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上交往交流，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共同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只是支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共谋发展，共同维护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

（二）求同存异、团结统一，共同书写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交融过程中，多元一体、求同存异，崇尚团结统一，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国家一度面临危难、民族面临危亡，各族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和增强，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1949年，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取得了国家形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中国。

(三) 互鉴融通、多元调和,共同创造了中国灿烂的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因适应空间及地理条件产生的文化多样性,随历史变迁而互鉴融通,共同创造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华文化有机整体的形成。先秦时期,逐渐形成夷夏交融格局;秦汉大一统,岭南、长城沿线、西域与中原既有差异,又呈现更高度的文化大融合。魏晋南北朝,胡人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胡汉杂居、文化混融。隋唐时期,政治开明,胡汉文化相互渗透、不断融合。宋辽金元时期,虽战乱频仍,但也在客观上成为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催化剂。明清时期,各族文化大融合推进到新的阶段。总之,各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包容差异、凝心聚力,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这些多样性、差异性与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相互融通,发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也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文成公主进藏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既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彰显;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为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些都是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证明。

二、创新转化中华“和”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导

新时代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疆域完整,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赓续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时代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中华“和”文化的创新转化。把“和”文化的思想内核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强调中华各民族的主体性,超越各民族的差异性,使中华“和”文化获得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感召力。

责任编辑:李亚强

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诠释及译介方法略论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3)

摘要: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谚语有其特殊的存在意义。不同民族历经千百年的发展, 孕育出了极具语言特色和文化特质的谚语形式, 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因此, 做好少数民族谚语译介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以此为据, 结合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现实条件和主要路径, 少数民族谚语对外传译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海外汉学家译入、中外同行合作、作者与译者合作、作者自译和中国译者逆译五种主要模式。

关键词: 少数民族谚语; 语言特征; 文化属性; 译介方法

中图分类号: G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081-08

中国文化“走出去”, 实现经典传承, 并同着文化产品价值的当代发掘与弘扬, 面临着诸多选择问题, 首先是文化类型和文化产品的选择, 其次是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路径。这两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也从宏观和微观上决定了这项文化传播事业的成果。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传统俗语、谚语既是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结晶, 存在广泛, 语言活力突出, 又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 它以时代语境叙事的方式, 用文字讲述着各族人民的精神气象和社会文化风尚, 这正是民族之林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因此, 它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推动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塑造, 树立内涵多元的中华文化印象。虽然经过我们的努力, 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价值可以被认识到, 但若无有效的传播手段对其加以译介推动, 要想使之成为国际舞台上闪亮的文化符号困难重重。为此, 充分发掘少数民族谚语的特殊价值, 用理想的方式进行文化诠释和有效传播, 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努力的一项事业。

一、少数民族谚语的语言特征与文化属性

少数民族谚语的语言特征, 严格说来是一个笼统概念, 很难对其作出准确而全面的描述。因为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传统, 甚至有自己的语言符号和用语习惯, 若从语言本体上归纳少数民族谚语的总体特征, 难免挂一漏万, 以偏概全, 也是不科学的。在此, 我们只尝试从语言特色及文化价值的含蕴结构来认识民族谚语的一些本质问题; 而且, 为便于比较分析并做出抽象化概括, 我们采用汉译本辑略的少数民族谚语为研究对象, 把更多的研究放在谚语的语义特征和表达方式上。

作者简介: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语言国际传播, 民族文献典籍外译。

(一) 少数民族谚语的语言特征

1. 国俗语义特征彰显多元民族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谚语中有关于民间风俗的丰富内容,大量语汇来自广为流传的典故、传说、俗语、歌谣,涉及人物、器物、地名、劳作方式、行为习惯及衣食住行的诸多日常用语。例如,维吾尔族谚语有云:“有孩子的家庭像巴扎,没有孩子的家像麻扎。”语中两个专有名词分别与人们的生活场所有关——“巴扎”指“集市”,喻热闹;“麻扎”指“坟地”,喻寂寞。再如,景颇族的长谚语:“山林里的景颇人,能辨清和树叶一样的竹叶青;头脑清醒的景颇族,能识别披着马列外衣的蝙蝠人”。里边提到的“蝙蝠人”是景颇族民间故事中流传的形象,代表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因其出自完整的景颇族寓言,这个形象的寓意在其他民族中也许不常有,如汉族传统中蝙蝠的意象多以其谐音喻指福运,而非类似的贬义。因此,这样的谚语体现了民族特色,具有国俗语义的特征。国俗语义,是语言学家王德春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①“国俗语义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感情色彩,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②由于各民族谚语与其文化习俗、生活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谚语能够帮助我们打开认识民族文化进而了解各族人民发展成就的窗口,从而进入不同地域人民群众的文化家园与精神世界。

2. 典型的熟语化修辞表达

谚语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化的语言形式,是经过语言加工和文意提炼的产品。少数民族谚语也不例外。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经用语者反复推敲打磨,绝大多数都脱离了松散、粗糙的形式,抛弃了流传不开的粗俗词语,在结构、意蕴、音韵上日益精进,句法凝练、朗朗上口,大大增强了通俗用语的熟语、成语化色彩,提高了民间传承度。这些都是积极修辞取得的意义。

少数民族谚语中大量使用反义词和对对比手法,构成矛盾效果,上下句对勘,前后对照喻理,描述出客观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对立统一性,辩证式地揭示真相与道理。在修辞手法上,辞格类型多样,语言生动性极强,多用对偶、反语、比喻、夸张、讽喻、拟人等辞格。例如,“石头虽干不能燃烧,木材虽湿却能生火”(藏族);“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土家族);“仰面求人,不如扑面求土”(哈萨克族);“牲畜夏天要赶着喂,冬天要拴着喂”(维吾尔族);“犁头不利犁边利”(毛南族);“如果你处处把自己夸耀,你所得到的一定是冷笑”(高山族);“大河是安静的,有学问的人是谦虚的”(蒙古族)等等。这些谚语不仅含义简明,在形式上进行了文字的考究,贴近人们的生活真实和语言习惯,而且在寓意上既有直接的事理描述,也有耐人寻味的哲思教益,充分体现了形式凝练、雅俗共赏、文意灵巧、含蓄玄妙等诸多文采修辞特征。

有些民族谚语同其他民族的说法在意思或隐喻方式上有相近之处,但依然保留了自己独到的表达方式,特别注意使用本民族的文化语词。举例来说,白族同胞与汉族有长期和谐的杂居历史,熟悉汉文化,也熟知汉语习语,但民间格言中依然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元素。如汉语里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白族同胞则用自己的谚语教导人们“脸白好认,心黑难辨”。又如汉语里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白族谚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仔细听别人吵架,能明白更多事理”。各族群众对谚语文化的重视,也反映出他们在整理、创作和使用谚语的过程中,注意保留民族个性,热爱自身的语言财富。

① 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② 王玉英:《英汉国俗语义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3. 丰富的文化语用传统

谚语在少数民族语中有不同的说法，如彝族把它叫做“尔比”，傣语里称为“甘哈开”，纳西族称之为“短歌”，都是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流传悠久、用途广泛的固定用语，是一些有特别功能且“意思凝固、句式凝固、比喻物凝固、对仗凝固、音韵凝固”^①的俗语。以往，很多地区传统中没有成文的法规、法律，群众中的道德行为约束主要依靠习惯法，而民间的谚语、格言、熟语就充当了特定地域内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人们不仅用它们来记录生活实践经验，形成世代传承的知识，还用以倡导良善、警示邪恶，使民众自我约束，自食其力，与自然环境、人际社会和谐相处。以《彝族格言精选》（2020）为例，内容涉及农业、贸易、阶级、婚姻、家庭、民俗、天文、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是地方群众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土壤。傣族民间流传着诸多谚语的颂歌，“饱满谷粒见于簸箕中，正确谚语来自实践中”，“假若语言中没有谚语，我们的生活会显得平淡无奇”，并用“劝你莫打寻食鸟，儿在巢中盼母归”，“狩猎不要进神林，撒网不要进龙潭”等具体的说法教人向善，规范社会行为。

原型范畴理论将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认知对象归纳某种范畴的事物，其中最具典型特征的成员称之为原型，享有最根本的类型化特征，拥有同类范畴内所有成员普遍具备的相似特征，对同类事物具有规范性和参照作用。由于谚语广泛的大众基础，其内容都是语言使用者经过长期体验且得到语言社团认可的事理及经验，能够提供榜样化的认知参照，因此具有知识模板的作用，符合原型特征。在实际语用中，谚语的使用者是谁并不重要，它的寓意及其认知作用同语言环境的适配性才是第一位的。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谚语因具有典型化的意义功能，可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文化场景，以及无需限定话语者身份等特点，使其语用空间格外广阔。

4. 通俗性胜于文雅性

同诸多民间谚语类似，少数民族谚语基本都是当地群众普遍使用，言简意赅的短语，反映的大多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经验和事实，即使有些与古典神话传说相关，但也是人们喜闻乐见、如数家珍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这些熟悉的说法一般都是口头流传、通俗易懂的，语文形式不作复杂的考究，多采用单句或两两对应的复句形式。因此，谚语创作者和使用者更加看重其通俗性，不追求过度高雅的艺术化加工。另外，这些谚语主要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和日常生活，并非庙堂辞令或精英说教，浅白易懂、朗朗上口的言说形式更容易流传开来。

再从谚语的交际功能上讲，少数民族谚语主要用于承载知识经验的普遍语义，用以施加影响、增强劝说、明示标准，指导各种生活抉择，构建普适性的话语权威，传递公认的价值，因而，需要借助最为通俗的话语形式，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所以，在语言表达上更加青睐通俗明了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要求我们在认识、推广它们的时候，多注意到这个特点，力求原汁原味、风格保真。

（二）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属性

作为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谚语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表面上，一条谚语的使用针对的是特定场景下的个人体验，事实上却“是该个人所属文化对这一特定场合和事物的同一看法和认识的集成”^②。英国政治家约翰·拉塞尔（Lord John Russel）总结得至为精辟：谚语是一人的才华，

^① 朱文旭：《论彝族“尔比”》，《彝族人网》，2019年1月13日，https://www.sohu.com/a/291720478_100188602，2022年3月20日。

^② 刘新义、张京生：《归化异化各得其所——从谚语翻译谈归化和异化翻译法的应用》，《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78—81页。

却是万人的智慧。语言学者雪莉·阿罗拉(Shirley L. Arora)指出,谚语意义的解读可分两步走:一是从“文化语境”出发,把握其抽象概念和原始内涵;二是进入“情景语境”,领会谚语在具体时空场景下的意义演化。^①这种思维过程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谚语的诠释方式。“只要能拧成一股绳,纱线也能捆住牯牛”(苗族)设定的是当地人纺纱织布、拴牛劳作的文化场景,比喻的是团结一致力量无穷的道理。“地中心有蚁冢,谷子会成长;寨子里有老人,人户才兴旺”(布朗族),类似的俗语将农业生产同家庭关系进行了类比,既是生产经验的传授,也是社会公德行为的教育,如“和尚犯教规,可以还俗当百姓;谎话说一次,就没有人再相信”(傣族)。当地民族的佛教信仰衍生出大量生活化的语言。可见,文化属性是少数民族谚语的基本属性。保持必要的文化视野是深刻认识民族谚语内涵的一把钥匙,因为它直通语言背后的人文成就和最具民族个性的生活映照。

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特色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丰富的生产生活来源。各族同胞的民间谚语大部分来源于生产生活的实践,具有典型的经验认知的特点,体现了人民群众悠久的历史关系和劳作经验;人们对客观世界观察仔细,善于总结,领悟深刻,而且十分注重文化的传承。“一年粮不接,十年赶不上”(布依族);“肉要一起煮,汤要分开喝”(藏族);“牲畜增多,奶油满锅”(蒙古族);“圈里卖羊,囤里卖粮”(维吾尔族);“到了夏牧场,冬窝子不要忘;从井里喝过水,这恩情不能忘”(哈萨克族);“笋子不割成竹,谷子不收成泥”(佤族)。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拥有千姿百态的生产生活经验,为谚语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 全景式的民俗风貌大观。由于民族谚语来源广泛,日用性强,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传颂着信仰和希望,与当地群众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凝结着这个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有大量非物质文化的信息。人们用叙事的方式描绘自己的生活,刻画生长的环境,讲述历史、现实和希望,形成不可多得的民俗景观。人们用特殊的词汇和曲调表达他们熟悉的日常,借助语言演绎内心的情感。比如,蒙古族谚语里记载了大量游牧生活的景象,高山、草原、河流、骑手成为谚语里的高频词,既是谚语里的背景,也常常立体起来,成为意境中的前景,让世人看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勃勃生机。所以,当闻“人要有山一样的靠山,有草原一样的胸怀”(蒙古族)时,不仅可以了解到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走进这方人民的精神家园。

3. 务实的人生经验启示。少数民族谚语同汉族传统的成语、谚语相比,在形式结构、语用功能作用上几无差别,但从谚语中的隐喻义类上,大概可以看到前者的事理依据多与旧时的原始经济形态,特别是传统社会关系下的农副业,以及采摘、游牧、狩猎等方面的劳动生产行业关系紧密,可见,传统的生活经验和场景构成了民族谚语叙事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谚语侧重现实场景的描述,重视生存行为和需求的理据;即使涉及到神话传说,也是现实观向喻理世界的转化体验。在旧社会的长期历史中,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生活主体元素相对不丰富,人们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务实的生产生活行为上,而对文学创作、制度文化探索、庙堂教化、娱乐爱好等方面关注不多,使得谚语功能偏向于务实,而非务虚。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少数民族谚语中,围绕生产和处世的谚语比较多……其他如修养、文艺以及生活意趣方面的谚语就比较少了。”^②(王冲,2018)目前可查到的多种少数民族谚语选集中,如《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

^① Arora, S. L. “The Perception of Proverbiality,” De Proverbio (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roverb Studies), no. 1, 1995, pp. 185 - 191.

^② 王冲:《中华多民族谚语语义体系构建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4期,第123—129页。

(蒋风,王慈,1982;李耀宗,马加林,1985),《中国少数民族谚语全编》(周江,1990),《云南少数民族谚语选》(毕坚,1993)等,涉及为人处世、劳作生产的类目居多,而关于娱乐情趣、艺术创作门类的较为少见。

4. 传统民俗文化观念的教化作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普遍具有勤劳智慧、热爱生命、生活积极、乐观向上、向往自由、亲近大自然的可贵品质,这些品质集中于传颂的歌谣格言中,千百年来在同一民族内部和交往的民族中间形成典型的民族个性、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题。“粒米十滴汗,莫忘种田人”(侗族),“砍树要朝树倒的方向砍,划船要顺水流的方向划”(傣族),“保土保水如保命,治土保水如治家”(壮族);又如“两手是摇钱树,土地是聚宝盆”(满族),“吃一把种子饱不了一顿肚子,播一把种子却能饱几个街子”(哈尼族),“锋利的长刀,不在于刀鞘好;漂亮的姑娘,不在于筒裙好”(景颇族),“酥油越打越香,人越学越聪明”(普米族)……这些表面看来只是生产劳作时微小而具体的提示,或者只是一些非常琐细的生活场景,如迎宾待客、婚丧嫁娶、家教传统、对敌斗争等,却是各族人民长期积累、世代相传的生存经验,既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获得生产资料、积蓄劳动力的重要经验,也传递了祖辈对后人的情感期冀与人生教益,构成群体生活的文化座右铭和社会教育百科全书。

5. 喻理通俗,浅显易懂。由于民谚普遍具有群众性、实践性、精炼性、通俗性、易传性的特点,其语言通俗简明,贴近生活、朗朗上口,不故作高雅,却又庄谐交织,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议事理趣。“巴依有五个肚子,总有一个空着。”(维吾尔族)旧社会王爷财主好吃懒做,大腹便便的形象和欲壑难填的贪婪性情,三言两语中便活脱脱刻画出来。“假如你怜惜受伤的顽敌,妻子将为你穿起孝衣。”(柯尔克孜族)对人性认识的劝导没有大道理的教条,只在具体的场景设定中,让人肃然反思。“十二岁的孩子,做了才想;六十岁的老人,想了才做。”(彝族)用亲切的话语告诫年轻人戒骄戒躁,三思而后行,将人生不同阶段的变化同心智阅历的成长联系起来,非常简单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智慧积累的重要性。

6. 典型的经典口传文化。形式偏于口语,口胜于文,是少数民族谚语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李耀宗、马加林两位学者在整理了大量少数民族谚语后,总结道:“兄弟民族谚语昔日大凡口耳相传,世代相习,多在历史长河中漂泊沉浮……”^①由于文献资料较少,人们对本民族谚语所做的专门文字整理也不多见,这导致很多格言俗语的辑录遇到诸多困难。以口立碑,口耳传承,成为很多民间谚语存在的基本常态。其口语特征首先表现为形式简短。常用大量短小的单句、对句,形成熟语、成语和警句。小到一两个词,三两个字,三言两语便道出世间百态。“话是金子”(景颇族);“泉水清,塘水浑”(壮族);“故乡虽穷,乡情最富”(白族)。其次,使用很多转录自口语的文字和语汇,如“说的话像奶子一样净白,他的心一定像箭杆那样端正。”(藏族)人们把日常饮食中指称事物(牦牛奶)的通俗名称用在格言里,达到易识、易懂、易传的效果。

二、少数民族谚语译介价值及传译方式

(一) 为何译介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认识毋庸置疑。其意义有二:第一,重视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实现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自我需求,是文化活力的内生长点。第二,中华文化要赢得世人尊重,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避免文化冲突和意识摩擦,需要向外做好内涵展示,用有效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从而增大异文化接触时的彼此兼容性。

在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今天,传承和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一切中华文化成就,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沟通中外,实现民心相通,并借此建构良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增强

^① 李耀宗、马加林等:《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页。

自身文化的魅力、吸引力和国际化实力,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谚语虽不能说在民族文化中包罗万象,但仍被袭用至今就已足以证明其强大的文化活力,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面貌和人民精神状态的重要窗口。这些正是传播谚语文化的价值所在。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文化传承与文化输入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文化史是文化交流史,也就是翻译史”。^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文化交流的核心途径;而作为翻译价值起点的,正是类似民间谚语这样饱含着语言财富的源语素材。“我们在翻译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时,就需选择这些最能反映民族精髓的文化意象和民俗事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上展示这一神秘(的)古韵风情,促进世界各族人民对中国文化之深入了解,拓宽以及深化中国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扩大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营造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杨司桂,2017)^②作为与民族性、地方性文化贴合度极高的一种文化形式,少数民族的传统谚语无疑是有诠释意义和传播价值的。

如果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来认识,少数民族谚语同任何民族的谚语一样,因流传时间久远,语言价值突出,人文意义富养丰足,故而具有文化经典的品质。根据佐哈尔的观点(2002),文学经典可分为“静态经典”和“动态经典”。^③静态经典因作品内容和影响力与特定时间或环境有关,所起的文化效力大部分停留在过去,与旧的叙事对象关联,只能在历史视域下产生文献价值,传播空间有限,很难转化为其他领域和新时代下的文化效益,因而,这样的经典是孤立的、再生力低的。动态经典则有较强的阐释空间,与不同的时代语境相融合,往往保有新鲜的文化活力,具有文学鉴赏价值或应用价值,能为新的受众所接受和喜爱。从这个意义上看,少数民族谚语具备动态经典的特点,传播潜力充分。

(二) 如何译介

关于谚语的译介,除了通行的翻译方法以外,很难说有什么专门的特殊译法。这是因为无论是汉语中的传统谚语,还是少数民族民间谚语,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短篇文本来处理。根据赖斯(1971)^④、纽马克(1981)^⑤等学者的文本类型理论,谚语属于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ype),其特点是原作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性具有突出特征,这也是译介中需要致力处理的内容对象和再现的作品价值。因此,在译介策略上多以异化翻译为主,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还原作品的原始风貌和创作特色。在此,我们以对外翻译的几种典型模式为参照,谈一谈民族谚语译介的几种范式,以此为路径培育传播力。

1. 海外汉学家译入模式

翻译界向来有一种观点:最理想的翻译形式是将外文译成母语,即“译入”,也就是“顺译”模式。译者更容易把握的是自己的母语,只有将外语作品译成自己的母语,才能确保最好的读者接受效果。这种看法在西方翻译界尤其盛行。国际译联曾举行过主题为“Translate in the Right Direction”的研讨会,倡导由外译内的做法,将其视作“顺译”或“正译”之道。从理想状态来讲,这是有道理的;但是,顺译需要由外国译者来从事中译外工作,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效果虽好,但可行性不高。其根源就在于中西方深刻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交融程度的局限。这导致了海外支援中华文化译介的人才资源有限。我们当然十分欢迎华兹生、大卫·霍克斯、沃尔夫冈·顾彬、宇文所安、闵福德、安乐哲、吴漠汀等海外汉学家,甚至更早时期的马礼逊、汤若望、傅

① 蔡新乐:《文化史就是翻译史——陈寅恪的历史发现与其翻译观初探》,《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0期,第53—56页。

② 杨司桂:《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基于翻译伦理视角》,《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8—152页。

③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1—27页。

④ 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 & Limit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4.

⑤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pp. 21—22.

兰雅等西方学者来参与译介我们的文化经典，但是，这样的友好“搭桥者”数量十分有限。现实是，能够熟练掌握汉语，深谙中华文化，并愿以一腔热情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甘做解释专家和文化宣传员的外国人毕竟不多，并且要培养一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和学者型译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甚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在时间成本和文化成本上投入巨大，难以满足对外传播的当代需求。尽管这样，海外人士由于天然地具备了与目标受众文化同源的身份，最了解读者需求和认知习惯，受到信赖，更容易利用好话语权，因而，仍然是用“另一只眼”解读中华国民性和人文成就、与国外读者保持近距离交流的重要力量。

2. 中外同行合作模式

对外译介工作若完全由外国人来完成，可能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译介者对原作的深层次内涵及误译代价把握不到位，因此，一种理想的方式是中外译者展开合作，中方译者重点负责对原作的理解和对译介意义的评判，外方译者主要负责译文的话语入流及其同目的语文化的融合效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中外联合的国际合作方式同样很值得借鉴。中方传播者包括译者、出版社、媒体人、文化宣讲师和学者等，他们精通中华文化，能够吃透或准确挖掘作品意义和特点。外方传播者可以是对等的同行工作者或协助者，他们深谙目标市场的需求和读者的好恶习惯，更懂得驾驭传播语言的话语效力，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地道阐释新鲜事物。这样，传播过程中的作品解读与表达这两大环节都得到了质量保障。中外合作的对外译介模式“无论是在译前的文本选择、文本识解、翻译决策，还是译后的编辑、出版、传播、流通等诸环节，均可以得到来自双方最大限度的智力保障”^①。成功的例子有如中国外交部翻译司与外国专家的合作、“大中华文库外译”项目中的中外合译项目；个人成功的典范也有不少，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合译中国文学经典、李约瑟与鲁桂珍夫妇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史的研究和翻译、马悦然与陈宁祖夫妇对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学经典的翻译、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夫妇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葛浩文与林丽君夫妇对中国当代文学畅销作品的英语翻译和推介等。正如许子东所言：“那些主要的翻译家，不是老公就是老婆是华人，说明文学翻译之难啊，说明独立的外国人，他翻不了这东西，他非得靠旁边有人帮助。”^②

3. 作者与译者合作模式

以具体作品为译介对象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能忽略作者的作用。无论推广介绍作品的译者和传播人如何优秀，他们毕竟是作品的初代解读人，在作品意义的复制传播链上，主要做的是解码的工作，这就难免会有偏狭或误读。而作为作品创始人的原作者，对创作初衷和本身想要表达的意思拥有最大话语权，能够对译介效果做出最直接的评判，但是，作者又往往对作品的他语译释、传播方式及其后效无能为力，无法进行专业性介入，必须允许和依赖其他译介人对其作品做出新的意义诠释，用特有的传播方式带入目标群体。因此，作者与译者合作模式便成为了另一种理想的传播模式。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余华、苏童、姜戎、毕飞宇、刘震云等与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合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少数民族谚语虽常以零散形式流传，但对外译介时，往往依托于文本汇编。辑录者多为本民族或当地的学者，他们对于源语特点的认识最为深刻和全面，因此，译介过程中若能与编写者进行沟通，能够对传译的内容、意义和形式有更准确的把握。笔者在翻译少数民族文献的过程中，便曾多次主动与少数民族作家、学者请教、交流，研讨作品中的一些难解之处，得到了大量的专业意见和启发，为后期的文化厚译提供了重要借鉴。（按：“厚译法”Thick Translation是文化翻译中进行内涵诠释和信息深挖的一种常用方法。）

^① 胡安江，胡晨飞：《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4期，第55—61，54页。

^② 李雯洁：《汉学家的中国伴侣》，《羊城晚报》2012年11月18日，第6版。

4. 作者自译模式

当我们意识到作者在作品传播中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时,实际走近了一类以源动力推动的传播方式。不难发现,前面所谈的作者与译者合作模式似乎是一种补偿式的做法,因为作者不能直接介入作品的译介传播,而需要外力,靠译者的中介操作,致使作品不得不在其中经历一次意义悬念的消解对话与价值权衡的跌宕交接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产生了较多的意识较量,拉长了传播链的操作程序,造成时间消耗和信任考验。作者和译介者双方经历了“接触—了解—信任—协商—妥协—再商榷—接受”的复杂环节,虽然最终效果可能是好的,但传播效率不高。葛浩文在翻译中国作家小说的时候,经常不敢轻易下笔,对于很多拿不准的文化概念、传统说法,不得不与中国作家反复通信询问确认。这样便影响了作品的传播速度。其实,理想的状态是作者精通双语文化,能够自行译介本人的作品。民族学界有一个共识: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最好的代言人就是本民族的一分子。如果编写少数民族谚语的作者同时具备出色的外语能力、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及用外语来熟练译释原作的文化传播能力,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承担对外译介工作。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原作内容精神不丢,风格不失。这样的榜样也不少,著名作家林语堂、张爱玲就是中英双语作家和翻译家,他们懂创作、懂读者,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又深谙外国语言文化之道,可以在中外双车道上舒展驰骋,有能力将自己作品进行外文翻译,而且还能保持高水平的形神复制。我们身边有很多民族学者都具备高等学历,受过良好教育,有些甚至有长期海外求学生活的经历,他们完全有能力将自己编写的民族文化著作、民俗述作、谚语专辑进行“二次加工”,翻译成外文作品,将这些宝贵的文化结晶介绍给国外读者。只不过这样的“重复”工作对于一些作者而言,可能是又一次艰辛的研学历程,苦于精力难堪二度跋涉,而多有放弃罢了。

5. 中国译者逆译模式

在中译外事业上,真正作为主力的还是中国译者,他们充当了大部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这是由中国的语言国情决定的。前面模式中已讨论到,从事中译外的国外人才缺乏,主要从业者只能是国内的外语人。尽管我们的译介队伍业务能力上参差不齐,但民族复兴、文化振兴的宏伟大业少不了他们提供的大力支持。虽然从翻译性质上看,中国译者将中华文化外译为他语,似乎犯了国际通行翻译惯例的“忌讳”,是缺少操作信度和效度的“逆译”,但现实需求和条件下,我们必须依靠中国译者知难而进、逆流而上,肩负起文化传播的大业。衷心希望我们的队伍中多出现一批如许渊冲、辜鸿铭、汪榕培、王宏印、潘文国、李正栓等致力于中华文化对外译介的杰出学者,哪怕外部援力缺乏,依然不改初心,矢志不渝,运用出色的语言能力和钻研之心,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事业竭尽全力。

三、结语

在搜集、了解和译介少数民族谚语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加深对一种语言经典化形式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它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不只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经济资源和物质财富,更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能量,他们既是个别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生机宝地。这些微小的语言晶体让我们看到了通透的民族大观园,激发起智慧和信念。民谚有云:“最纯净的水是泉水,最精萃的话是谚语”(哈萨克族);“有觉悟的人,一句格言也能使他长进;刚萌芽的笋,细雨小水也能助它成长”(藏族);“水滴积多盛满盆,谚语积多成学问”(蒙古族)。希望民间谚语走出静态经典的样式,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一些精神内核,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典型文化元素,促进不同背景下的中外各族群众彼此理解、民心相通、相向走近、尊重相待。

责任编辑:刘林华

塑造优良家风视域下的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研究

张昊雷, 宋青璐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梁代出现的“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相当特殊: 一是不仅要抚育“孤兄子成人”, 还要抚育他们“成才”; 二是其行为主体主要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儒家伦理的复兴激起“孝悌”情感的转移, 这是其得以出现的历史背景; 严峻的存亡危机使世家大族迫切需要宗族杰出人物入仕, 由此为他们的门户利益提供政治保护, 这是其得以产生的内在逻辑。“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传统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有内在的契合之处, 要挖掘这一传统中具有“古今通理”意义的合理内核, 为塑造新时代优良家风提供理论资源。

关键词: 抚孤; 过于己子; 优良家风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089-07

梁代出现了大量的“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梁书》卷一〇《杨公则传》中记载:“公则为人敦厚慈爱, 居家敦睦, 视兄子过于其子, 家财悉委焉。”^①同书卷十二《韦叡传》中同样有类似记载:“性慈爱,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②当前学界对这种现象已有所重视, 并开展了相关研究。许秀文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中就将“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行为看作是宗族内部的常规救助, 其主要影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 发挥了稳定社会秩序, 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这个行为主要发生在宗族内部, 张承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中将其看作是宗族经济生活中所见的一种家族关系。李卿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中也持相似看法, 并且将包括及类似“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行为称为“抚孤”, 与养老、侍寡、济贫、散财等行为并列归为宗族经济活动的范畴, 是家族成员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吴海燕在《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研究》中指出这种家族关系是一种同居共财的经济关系。“抚孤”属于宗族的赈施活动, 既是宗族组织血缘凝聚力在经济上的反映, 同时它又反过来增强宗族组织的团体和集体意识。朱大渭、梁满仓在《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试探》中将这种“抚孤”行为直接看作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冯友兰和谐观研究”(2019CZX019), 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支持课题“冯友兰《贞元六书》中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研究”(qd18128)。

作者简介: 张昊雷,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宋青璐,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① 姚思廉:《梁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年, 第197页。

② 姚思廉:《梁书》, 第225页。

是宗族内重要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是以宗族的力量维系成员的生存，使其度过艰难的困境，另一方面反过来增强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强化成员们的集体意识。这些观点代表了目前学界对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的普遍看法，即将其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制度与宗族组织内部经济活动的一份普遍性材料一略而过，对其特殊性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习近平总书记的阐发和指导，塑造优良家风的目标越来越受到重视。梁代出现的“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为塑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优良家风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因而有必要加强对这一传统的研究。

一、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独特性

《梁书》继承班、马遗风，语言朴实，选材谨慎。李延寿作《南史》亦对这些史料进行了保留。抚孤现象虽史不绝书，但达到“过于己子”程度的却不多见，正因为罕见，后世理学家甚至将“一视同仁”的行为看作是圣人的境界。《二程集》中云：“又问：‘视己子与兄子有间否？’曰：‘圣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犹子也。是欲视之犹子也。’”^①但超过“一视同仁”境界的“过于己子”只在《梁书》和《南史》中频频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现象，且非常特殊，因此才被姚察父子和李延寿所捕捉并写入传中。但其独特性除了只在梁代集中出现之外，另外还有以下两点：

（一）其目的是既“成人”又“成才”

梁代对于这些“孤兄子”不仅仅停留在抚养的层面上，其后还有一系列的刻意培养，最终使其步入仕途。可以说，对于亡兄弟的这些遗孤，不仅要使他们成人，亦要使他们成才。《梁书》卷五〇《谢几卿传》中记载：“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几卿奖训之力也。”^②同书同卷《庾仲容传》中记载：“仲容幼孤，为叔父泳所养。既长，杜绝人事，专精笃学，昼夜手不辍卷。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泳时已贵显，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宫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③在这一点上，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与其前后所出现的“过于己子”现象有极大不同，在此试举两例以说明之：西晋邓攸在逃亡路上自知己子与其弟之子不能两全，考虑到其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④，而自己逃脱之后可再有子嗣，所以最终抛弃了亲生骨肉以使弟弟的儿子得存；元代术忽难哀痛其兄长阔里吉思去世，抚养其兄子术安过于己子，并好好保存其兄的珍服秘玩，待术安成人一并归还。邓攸虽有过于己子之实，但是其目的是保证自己和弟弟的血脉不致双双断绝，而术忽难抚养“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原因除了对兄长的思念，还有就是希望兄长在世间的财产后继有人。邓攸和术忽难的例子是萧梁前后“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典型，但与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现象相比，都较为缺少对“孤兄子”成才的殷切希望与努力。

（二）其行为主体皆是当时的世家大族

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行为主体，即前文所举的韦叡、谢几卿和庾仲容之流，全是当时的“高门士族”。《梁书》卷十二《韦叡传》云：“韦叡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三辅著姓。”^⑤可见韦叡家族在梁代门第之高。至于谢几卿与庾仲容，他们一个出身“王谢”，一个出身“庾郗”，皆是东晋时的“当轴士族”，曾一度左右朝堂政局，至梁世早已流播百

① 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页。

②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

③ 姚思廉：《梁书》，第723页。

④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9页。

⑤ 姚思廉：《梁书》，第220页。

年，是毫无疑问的世家大族。^①至于前文所举“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之一的杨公则有些特殊，因此需要详论。

杨公则是梁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无疑是梁时的“势家”。关于其出身，《梁书》卷十《杨公则传》中云：“杨公则字君翼，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殷琰将。”^②说明他出身受鄙的将家^③。但是他少有孝名，功成名就后又与世家大族交好，表明其欲竭力融入世家大族阶层。其传中载：“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④州郡著姓自然就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单家即是所谓的寒人或是寒士。杨公则斥寒人而进世家，无疑是主动向世家大族示好。不仅如此，其传中又云：“性好学，虽居军旅，手不辍卷，士大夫以此称之。”^⑤《颜氏家训》中言：“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⑥由此看来“手不辍卷”有志于学，是南朝士大夫日常的风度气质之一。杨公则也如此做，说明其在生活习惯上也在向士族靠拢。那么“士大夫以此称之”是否也反映了杨公则企图从将家变为“士族”的努力获得了一定成功？如果杨公则真的为当时的世家大族所接受，那其“势家”背景之外，还有些士族色彩。

世家大族经济实力雄厚，能够为养育“孤兄子”提供经济基础。除了一般做官的俸禄与赏赐外，世家大族所掌握的大量庄园亦可为他们承担这个任务提供经济来源。广袤的田园别墅和数目众多的部曲、佣工是支撑世家大族的根本，这也为他们养育“孤兄子”奠定了前提。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十一月丁丑诏云：“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不追。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列。”^⑦这实质上是承认了世家大族对农民剥削的合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士族的经济利益，使其有充足的财力来养育“孤兄子”。除此之外，世家大族大多还会将出任地方官视为聚敛的机会。宋、齐以降，地方官迭代频繁，原是六年的旧制逐渐变为三年，更有甚者三年不到便已改官，以便他们敛财。他们将聚敛之财中饱私囊之后，多数官僚仍频繁改任其他地方。世家大族借此机会轮流搜刮地方，通过这种途径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此外，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频繁出现且如此特殊的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内在逻辑。

二、历史背景与内在逻辑：儒家伦理的复兴与“孝悌”情感的转移

儒家伦理的复兴为“抚孤兄过于己子”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历史背景。东晋以后皇权政治即有回归态势，历经刘宋、萧齐两代，君主专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崇儒是与加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的。梁武帝创业开基，取得政权之后“飭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每发丝纶，远加旌表”^⑧。他更是多次颁布“孝悌力田者赐爵一级”的诏书，将孝悌与“国本”并列，频加强

① 关于谢几卿和庾仲容的出身可详细参考《梁书》卷五〇《谢几卿传》和同书同卷《庾仲容传》；关于陈郡谢氏与颍川庾氏的历史可详见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43—51页；孟繁治：《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上）》，《许昌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106页—112页；同作：《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下）》，《许昌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85—89页。

② 姚思廉：《梁书》，第195页。

③ 关于“将家”或“兵家”在魏晋南朝受鄙这一问题学界多有研究，可参见唐长孺《兵士身分的卑微化》，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三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60页。

④ 姚思廉：《梁书》，第196页。

⑤ 姚思廉：《梁书》，第197页。

⑥ 颜之推：《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4页。

⑦ 姚思廉：《梁书》，第86页。

⑧ 姚思廉：《梁书》，第647页。

调。在这期间,梁武帝又亲注《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以“正先儒之迷”^①。除此之外还重设五经博士,大力提拔贺瑒、严植之等儒生出任高官,部分儒者甚至获得了远隆前代的礼遇。

“孝悌”情感的转移为“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内在逻辑。梁武帝用儒生,兴儒业,目的虽然是加强君主专制,但其崇儒的行动在客观上必会引导时人对儒家伦理的关注^②。《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载:“僧孺年五岁,读《孝经》,问授者此书所载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常愿读之。’”^③ 历仕南北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梁朝“兄弟之子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在他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身为彼此的手足至亲“不能不相爱也”。^④ 这是传统儒家对兄友弟恭的理解和对“悌”的要求。如果兄弟之间有一方因为意外事件早亡而遗有子女,那么对兄弟的情感就会转移到这些“孤兄子”身上。《梁书》卷四九《刘苞传》中记载刘苞四岁丧父,此后见诸叔伯常常哭泣。时其叔伯皆显贵,刘苞的母亲以为刘苞惧怕他们,于是大怒。刘苞解释说:“早孤不及有识,闻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无有他意。”^⑤ 这里刘苞见到诸位叔伯而思己父,无疑是对父亲情感即“孝”的转移。在儒家道德文化体系中,孝悌常常并举,二者都有情感转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就是“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内在逻辑。

因此,再观“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它无疑是“悌”“恭”等情感之灵活性的一个体现,即在血缘范围之内,对兄弟的情感发生了转移。正如刘苞见到叔伯而思亡父,见到“孤兄子”也自然能想到已故的手足。因此在这些子侄面前称呼他们为兄子或弟子颇不忍心,是符合传统儒家伦理“兄友弟恭”的范畴的,甚至是当时的伦理要求,这正是颜之推将其写入《风操》而非《兄弟》的原因。儒家伦理的复兴带来了“孝悌”情感的转移,这毫无疑问便是“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文化背景。在这个宽松的文化背景中,这一行为获得了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上的和谐,使这一行为在梁代不是个例,而是频繁出现。

三、历史局限:维护世家大族的垄断地位

梁代皇权复苏、寒人崛起,世家大族虽然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也难掩颓势,彼时的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存续危机,并迫切希望改变局势。对“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宣扬就成为了世家大族自救的一种手段。这种工具性的目的恰恰凸显了“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历史局限。

(一) 梁代世家大族面临的存续危机

1. 世家大族所依傍的旧有仕进格局悄然改变

梁武帝和前朝君主一样,对世家大族既利用又限制。他一方面优容世家大族,一方面大力培养寒人势力来委寄实权。其官员的任用与晋升标准不再“校其一婚一宦”^⑥,而是变为是否具有才能与清廉与否。^⑦ 在这种情况下,梁代寒人多凭学识、军功等升迁,并大量获得封爵。

即使士族对仕进格局的变化颇为不满,可在皇权复兴时期,对官位的处置已经不容他们置喙。

① 姚思廉:《梁书》,第96页。

② 东晋南朝儒学虽然式微,但并未断绝,而是渐渐复兴。因为儒学“修齐治平”与尊崇忠孝等的社会效用,玄学或佛道并不能完全替代。详可参见付心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开封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7—20页;郭应传:《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第46—49页。

③ 姚思廉:《梁书》,第469页。

④ 颜之推:《颜氏家训》,第23页。

⑤ 姚思廉:《梁书》,第688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89页。

⑦ 关于梁武帝具体的人才政策学界已经详细论及,可参见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页;杨恩玉:《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山东:齐鲁书社,2009年,第247页。

《梁书》卷二一《江蒨传》中载：“是时（徐）勉又为子求（江）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干免官，（王）泰以疾假出宅，乃迁散骑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监六年，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故勉斥泰为之。”^①徐勉家世孤贫，亦非望族，但是得武帝重用，任参机要，是寒人势力的典型代表。他对琅琊王泰和济阳江葺的随意摆布，是皇权复兴、士族衰弱的体现，也意味着在皇权和寒人势力的双重挤压下，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空间越来越小。

2. 世家大族赖以存在的宗族关系逐渐瓦解

世家大族面临的危机不止如此。南朝“个人与乡里与宗族不可分割，仕宦之途在乡里，进身之途在操行”，^②然后，“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员形成了以官僚成员为核心的宗族单元”^③。因此，士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依赖稳固的宗族关系。然而，宗族关系在社会层面上却逐渐瓦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宗族组织一开始就包含着一对矛盾，这就是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平等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宗族内部贫富区分的激化必然导致宗族组织的解体。”^④尽管宗族通财共助的传统看起来温情脉脉，但是内部贫富差距、歧视、压迫等一直存在。至梁代，“族”“从”分明，宗族关系进一步得到瓦解。^⑤宗族的瓦解不仅使一部分世家大族的成员丧失“仕宦之途”与“进身之途”，还有可能使他们丧失士族身份变为庶民，出现阶层的下滑，这当然不是世家大族所乐见的。

（二）道义外壳下的功利追求：为维护阶层特权而做出的功利性抉择

唐长孺先生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保护自己。”^⑥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对此补充道：“门阀士族骄矜自大之状看来是针对寒人，实际上是对皇权利用寒人而产生的戒备心态。”^⑦二位先生都认为世家大族态度的极度自大与圈子的极端排他性，反映出的不是他们的强大而是他们的日渐衰弱，最终不得不以如此的骄情作态守住世家大族的最后体面。世家大族只好把“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口号作为化解家族危机的工具。

由上可知，梁代的世家大族面临着严峻的存亡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危机，世家大族将原本美好的道德传统转化为了功利性的博弈手段。东晋至南朝以来，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虽然有较强的世袭意味，但是他们的这种世袭并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因此，他们非常依赖家族权势。官品的高低不仅攸关其政治权力的大小，还决定他们可以享有的经济权益。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压制寒人还是减缓宗族关系的瓦解，都是想要维持自身门户不坠，甚至是有所上升。他们还要保持或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只有令自己家族的代表人物迈入仕途，才能实现这些目标。^⑧正如颜之推所说：“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吾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靦冒人间，不敢坠失。”^⑨为此他们首先需要将官位牢牢地抓在自

① 姚思廉：《梁书》，第334页。

② 唐长孺：《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③ 常建华：《中国宗族演变的阶段性及其特色》，2022年7月5日，<http://www.nopss.gov.cn/n1/2022/0705/c441752-32466631.html>，2022年8月24日。

④ 唐长孺：《南朝士族的衰弱》，《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第4—5页。

⑤ 族从分明观念是刘宋以来南朝大家族“兄弟异计”、“父子殊产”的产物，是宗族关系进一步瓦解的体现。详可参见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1页。

⑥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8页。

⑦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⑧ 关于当世权势的大小对士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可以参考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63页。

⑨ 颜之推：《颜氏家训》，第599页。

己家族手中。齐末梁初的“检籍”和对“骑都塞市，郎将填街”^①的整顿都反映了世家大族对寒人崛起的无比排斥。其次，他们要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去培养杰出人才，以保证门户的利益。文化素养是梁代衡量人才优劣、入仕晋升的重要条件，也是世家子弟需要回应的社会压力。^②“世族政治地位的跌落，是和他们丧失了文化优势这个因素分不开的”，^③换言之，文化优势可转化为人才优势，人才优势可转化为政治优势。而世家大族丰厚的藏书与源远流长的家学传统，使人才的培养比寒门庶族更加便利、高效。

政治上的排斥与文化上的压制并没有阻止两件事情的发生：一是寒人势力的继续崛起；二是世家大族本身人才的凋零。丰厚的藏书与优良的家学并没有使世家大族一直人才辈出。颜之推直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学无术。”^④杰出人物的凋零带来的是世家大族政治优势的削弱。萧齐时琅琊王氏尚能说：“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⑤而到萧梁统治后期，王氏子孙只能“仰观堂构，思各努力”^⑥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重门第而轻才德的世家大族却要依靠才德来维护门户的利益。有时候嫡亲才能有限，不能担当大任，为保障门户利益的需要，这些士族往往“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⑦嫡亲成长于富贵之家，自幼娇生惯养，不愿意苦读深思，往往难堪大任。他们“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⑧平日皆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甚者肤脆骨柔，畏马如虎，自然难以独当一面。谢安不重其子而重其侄谢玄，后来谢玄率领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氏在东晋的声望达到极点。这说明子侄是可以肩负起门户的兴衰重任的，也因此才会出现“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⑨的情况。行至梁代，世家大族对宗族内部人才的渴求有增无减，甚至到了“一不为少”的地步。《陈书》卷三〇《陆琼传》中载：“十一，丁父忧，毁瘠有至性，从祖襄叹曰：‘此儿必荷门基，所谓一不为少。’”^⑩在皇权和寒人势力的外挤压、士族嫡亲人才凋零的大背景下，原本最重门第而轻才德的世家大族却企图再建人才优势，以维持政治优势。他们对族内人才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士族社会以门第为尊而轻才德，世家大族却极力用瓦解它的力量来维护它。在新旧交替之际，“过于己子”这种矛盾景象不同于具有明显旧士族特征的“深沟高垒”。客观言之，“过于己子”现象带有一些历史进步性。

古往今来，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囿于社会发展程度和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个人对此的应对能力较差。在一个家庭的壮年男性逝世之后，其寡妻与子女往往无法独立生存。既然士族的升降很大程度上在于本族是否出现杰出人物，那么士族就不能不爱惜羽翼，对宗族内的困窘之家进行接济，特别是在梁代这个世家大族的利益不断受到挑战的时代。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受助的族子尽快成才，以通过仕途为门户利益提供政治保障，新出“寒品后门”（如杨公则）的这一愿望则必然比世家大族更加急迫，以维护得之不易的阶层流动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抚孤兄子过于己

① 姚思廉：《梁书》，第694页。

②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梁书》卷二一《王暕传子训附传》中载：“上目送久之（王训），顾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类似的社会期待是世家子弟需要正视的，不然轻则是个人有辱门风，重则会为整个门户抹黑。关于此《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中有一例可证：“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③ 封海清：《琅琊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105—112页。

④ 颜之推：《颜氏家训》，第148页。

⑤ 姚思廉：《梁书》，第158页。

⑥ 姚思廉：《梁书》，第487页。

⑦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7页。

⑧ 颜之推：《颜氏家训》，第148页。

⑨ 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46页。

⑩ 姚思廉：《梁书》，第396页。

子”的传统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宗族内部扶危济困的慈善救助活动，其实质却是士族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它的政治作用一直为其外表所遮蔽。

四、现代价值：为塑造新时代优良家风提供理论资源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虽然社会动荡，纷争不断，但其“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无不有与前一时期相比是新的东西，而与以后各时期又迥然有别的特点”。^①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传统在当今社会已然嬗变，但是其中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的春节团拜会上所指出的：“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谐，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建康成长……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②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传统在重家庭（宗族）、家教、家风和促进家庭（宗族）和睦、亲人相亲相爱、下一代建康成长等方面无疑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有内在契合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此前提下，挖掘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传统中具有“古今通理”意义的合理内核，同时舍弃其中的不足，做到对它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与发扬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中的维护亲情之内核，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③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孝悌情感的转移，这虽是梁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但孝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在文脉传承中熠熠生辉。继续传承与发展“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背后的思想内核，使社会成员都追求兄友弟恭、家庭和睦，不仅有利于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利于培育良好的家风，营造人人向善、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建康发展。

领导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消除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的宗族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有利于端正党风政风。2015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④梁代“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目的是让宗族人才步入仕途，为其宗族提供政治保护，宗族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应该抛弃这种宗族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树立清正廉洁的家风，认清家庭教育和亲族间相互辅助的目的是为国家育人、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专为一家一姓谋利。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宗族与个人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南朝那种“汉唐士族宗族制”的宗族形式更是早已瓦解，连士族都不复存在了。那么以世家大族为行为主体，且要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也必将发生变化。因此，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家风思想为指导，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抚孤”行为，虽然不至于都达到“过于己子”的程度，但是其在敦睦亲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作用必然会得到充分地发挥。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

② 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第2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经济日报》2013年11月1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1日，第2版。

发展问题研究

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

——基于贵州省的调查数据

胡彬彬, 齐 昕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居民社会信任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社会交往, 而居住格局正是通过打造居民交往互动的空间基础进而对居民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基于2021年对贵州省48个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 居民社会信任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分布状况; 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存在明显区别。发挥社会信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需要在社区层面充分利用居住空间对社会信任的形塑作用; 大力强化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的引导作用; 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社会信任的差异化生成路径。

关键词: 居住格局; 社会信任; 居住空间; 交往空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3-0096-1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 难点也在基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①可见,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本、联系群众最紧密的单元, 在当前我国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具有越来越关键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信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升社区治理共同体韧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一定不能忽视社会信任在社区地域空间上的精神凝聚作用。因此, 居住格局对社区信任的作用机制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既被视为反映族际关系的重要指标, 也被视为形塑族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社会信任是一种态度, 是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 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对人的一种依赖^②。学界对信任的类型学划分主要包括“二元论”——自家人/外人^③、特殊信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0CSH004)。

作者简介: 胡彬彬,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 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齐昕,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27日,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022年5月10日。

② 郑也夫:《信任论》,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年, 第14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第32—40页。

任/普遍信任^①、亲人信任/陌生人信任^②、低信任文化/高信任文化^③，人际信任/制度信任^④，以及“三元论”——家人信任/熟人信任/生人信任^{⑤⑥}，以及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⑦。本文沿用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分类，将社会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层次，其中特殊信任是居民对与其存在血缘和情感交换关系的人的信任；一般信任是居民对与其在工作或生活中具有一般合作关系的人的信任；普遍信任是居民对与其具有不确定或不稳定交往关系的人的信任。

对于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分别是个人因素影响论、社区因素影响论、社会因素影响论^⑧。社会信任的个人因素影响论强调个体客观背景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研究认为男性相比于女性，年龄较大者相对于年幼者，在婚者相对于单身/离婚/丧偶者，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相较于较低受教育水平者，有较高收入者相较于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而社区因素影响论则强调社区客观特点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认为社区异质性可能发挥多重作用：一方面，社区异质性程度较低的居民对他类似的人更加信任，产生更高的“集体效能感”和社区归属感，因此会产生更高的社会信任度；但另一方面，社区异质性程度较高时，居民交往也可能产生将特殊信任扩展为普遍信任的结果^⑨；同时，如果异质性程度过高到身份“分割”的程度，又会带来信任范围的收缩，提高内群体信任而降低外群体信任。社会信任的社会因素影响论则强调社会客观实际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各类社团组织。因为社团成员的定期参与、组织规范、外群体接触等因素能明显提高组织成员的互动频率、共识程度和群间信任，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现有的研究虽关注到民族互嵌式居住对社会信任关系的影响，认为互嵌式居住格局能够改善族际社会态度、减少疏离感，构建融洽关系^⑩，却少有学者同时将社会信任的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同时考虑，更多地重视社区中的种族成分、民族比例等社区因素与社会信任的关联，而忽视了公共场所、社区组织等社会交往因素对信任的影响，因而不能立体全面地呈现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将全面考察居住格局与居民社会信任的内在关联，在控制住个体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将社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居住空间、交往空间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社会信任的生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地区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的对比分析。

①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9—320页。

② 雷丁：《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

③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④ 翟学伟：《信任、现代性与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6期，第4—10页。

⑤ 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88年，第55页。

⑥ 张忠：《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特征与建设路径——基于第七波WVS数据的实证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59—69页。

⑦ 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46—51页。

⑧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7—152页。

⑨ 何晓斌、柳建坤：《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户籍隔离、群内互动与邻里信任分化》，《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第100—117页。

⑩ 李强、李洋：《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4—11页；汤夺先：《论城市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城市回族为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61—65页。

二、研究假设

长期以来,社区居住格局一致被视为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居住格局越互嵌,社区内部的族际关系越好。从族际接触理论来看,族际接触能通过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机制来提升族际关系,而社区内部的居住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族际接触和族际交往的水平。普特南认为,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根植于由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换之中^①。一个缺少互动、封闭的社区无法产生对他人的信任^②。而互嵌式居住格局为社区居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居民之间易产生普遍的交流 and 联系,减少彼此之间的敌意,形成积极的交往态度。人们在由此形成的关系网络中的嵌入也会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并保障社会信任关系的实现,成为社会信任的载体和保障。因此,我们认为:社区居住格局的互嵌性越强,居民社会信任越高。由此,本文从居住空间和交往空间两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1. 居住空间假设

居住空间考察的是社区各民族居民在空间分布的结构,即社区各民族的居住模式^③。居住空间会影响居民社会信任,是因为各民族居民杂居、混居的空间分布是其交往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关系着各民族居民之间接触机会和社会关系的形成,由此影响着居民社会信任的生成。马宗保通过对银川市回族居住模式的研究,得出了回汉混居格局有利于推动回汉间社会交往的结论^④。居住空间是人们社会交往的起点,族际居住的身份区隔必然会阻碍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进而对正常族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⑤。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相应的居住空间假设:社区在居住空间上的混居有利于提升居民社会信任。

2. 交往空间假设

社会信任是长期交往经验内化的心理体现,其根源是现实的交往活动,是交往的结果所造成的^⑥,因此交往空间也是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关键变量。互嵌式的居住格局在有了居住空间的互嵌之后,还要提供娱乐、休闲、健身、服务等方面的共同空间场域。这样,交往空间考察的就是社区内可供居民交往接触的空间,包括社区公共场所和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提供的公共场所、社区组织越多,人们的互动和接触就越多,由此有助于社会信任的形成。有学者发现,越是积极参与各种社团组织的居民,越能从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互助、合作、友善、共识、公益等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在协调彼此关系、增进社会福利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它们又构成了社会信任的核心特征,这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⑦。据此,本文提出交往空间假设:社区交往空间越充足,居民社

① Putnam, Robert D.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② 唐有财、符平:《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59—67页。

③ 马戎:《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第57—65页。

④ 马宗保、金英花:《银川市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19—30页。

⑤ 郝亚明:《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4—26页。

⑥ 罗运洪:《民族地区社会信任状况及其归因分析——以湖北某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01—106页。

⑦ Bellah, R., R. Madsen, W. Sullivan, and S. Tipton,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会信任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该课题以贵州省作为整体抽样框，调查范围覆盖贵州省7个市（自治州）、32个县（区）、48个社区。问卷调查实施于2021年1—8月，抽取了贵州省的黔东南州、黔南州两个民族自治州中的19个社区，遵义市3个族自治县的4个社区，以及遵义市、铜仁市、六盘水市、毕节市、安顺市的非民族自治地区共计25个社区。共计发放问卷1425份，在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1423份有效问卷。其中，来自民族自治地区的样本共656份，来自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样本共767份。

表1 样本数据基本特征 (N=1423)

变量	均值/百分比	变量	均值/百分比
性别 (男=1)	55.6%	月收入	
年龄	39	2000元以下	49.1%
民族 (汉族=1)	41.1%	2000~5000元	37.7%
政治面貌 (党员=1)	8.1%	5000~8000元	10.9%
婚姻状况 (已婚=1)	61.3%	8000元以上	2.3%
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水平	
小学及以下	28.1%	下等水平	8.7%
初中	28.0%	中下水平	29.8%
高中	12.7%	中等水平	54.5%
大专、本科	29.5%	中上水平	6.5%
研究生	1.8%	上等水平	0.6%
社区居住年限	25.08	社区类型	
地区类型		普通商品房社区	12.5%
民族自治地区	59.9%	旅游业影响社区	4.9%
非民族自治地区	40.1%	人口变迁较少社区	18.9%
		普通村寨社区	63.6%

注：分类变量报告百分比，连续变量报告均值

(二) 变量测量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居住格局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分别对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进行了如下操作化。

1. 因变量：社会信任

本研究借鉴已有的社会信任量表，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变量进行适当调整，确定了测试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状况的量表。经过调整后的选项为：①单位同事；②单位领导；③邻居；④普通朋友；⑤亲密朋友；⑥直系亲属；⑦其他亲属；⑧路人、陌生人；⑨推销员、小商贩；⑩便利店老板；⑪网友。对上述变量采用五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方法，将信任程度分为5个等级，让调查对象分别选择对这些对象的信任程度，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较不信任”、“很

不信任”，分别记5分、4分、3分、2分、1分。为了更直观地测量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对该量表进行降维处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表2），KMO度量值为0.783，巴特利特球型度检验卡方值为589.45，sig显著的为0.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对测量居民社会信任的11个项目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共得到3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并且3个公因子累积解释的方差比例为64.194%，可以认为提取3个公因子具有合理性。

表2 居民社会信任量表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

信任对象	普遍信任	一般信任	特殊信任
单位同事	0.148	0.867	0.013
单位领导	0.143	0.857	0.002
邻居	0.115	0.666	0.345
普通朋友	0.186	0.570	0.198
亲密朋友	0.037	0.477	0.519
直系亲属	0.018	0.122	0.810
其他亲属	0.091	0.058	0.787
路人、陌生人	0.829	0.181	0.090
推销员、小商贩	0.862	0.123	0.033
便利店老板	0.765	0.133	0.106
网友	0.771	0.121	0.218
特征值	2.718	2.617	1.767
方差贡献率（%）	24.711	23.792	16.063

注：***表示显著性 P<0.001

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图可以看出，第1个因子主要解释居民对“单位同事”、“单位领导”、“邻居”、“普通朋友”4类对象的信任度，从其内容来看可将其命名为“一般信任因子”，用来测量居民对在工作或生活中具有一般合作关系的人的信任度；第2个因子主要解释居民对“亲密朋友”、“直系亲属”、“其他亲属”3类对象的信任度，可将其命名为“特殊信任因子”，用来测量居民对存在血缘关系或情感交换关系的人的信任度；第3个因子主要解释居民对“路人、陌生人”、“推销员、小商贩”、“便利店老板”、“网友”4类对象的信任度，可将其命名为“普遍信任因子”，用来测量居民对社会上其他关系（不确定或不稳定交往关系）的人的信任度。

然后，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居民社会信任的总体得分，生成“社会信任”总因子。计算公式为：社会信任总体水平 = “特殊信任” × 0.16063 + “一般信任” × 0.23792 + “普遍信任” × 0.24711。对提取的3个公因子和社会信任总因子进行信度检验，特殊信任因子、一般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和社会信任总因子的信度值分别为0.845、0.783、0.838和0.809，均大于0.7的阈值标准，具有较高的内在可信度。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各信任因子的总体水平，本文运用公式将因子值转换为1—100的指数。转换公式为：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 B) × A。其中 A = 99 / (因子最大值 - 因子最小值)，B = (1/A) - 因子最小值^①。得分越高，表明信任度越高，从而将居民社会信任的4个因子处理为连续变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①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18页。

2. 自变量：居住格局

本文综合了马戎、马宗保、王建基、卢爱国等人对居住格局的概念界定以及柴梅的居住格局量表，将居住格局操作化为居住空间、交往空间2个部分。

(1) 居住空间

本文从社区居住模式来测量社区的居住空间状况，将其划分为4类：①充分散居；②散居为主，聚居为辅；③聚居为主，散居为辅；④充分聚居。由于该指标是一个定类变量，在分析中将其处理为二分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2) 交往空间

本文从社区拥有的“公共场所”以及“社区组织”的数量来测量社区的交往空间状况。对于社区的“公共场所”数量，通过一个表格式问题调查居民对各项目的实际拥有状况，项目内容包括：①小型公园；②便利店；③小广场；④健身场所；⑤学校；⑥图书馆；⑦娱乐中心；⑧其他，对这些项目的回答“有=1，没有=0”，并对这8项进行加总，得出一个范围为0-8分的定距变量，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对于社区的“社区组织”数量，通过一个表格式问题调查居民对各项目的实际拥有状况，项目内容包括：①歌舞队；②志愿服务组织；③业委会；④治安巡防队；⑤卫生护卫队；⑥读书小组；⑦运动协会；⑧其他，对这些项目的回答“有=1，没有=0”，并对这8项进行加总，得出一个范围为0-8分的定距变量，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3. 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对居民社会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社区居住年限、社区类型、地区类型11个方面。将社区类型划分为普通商品房社区、旅游业影响较大社区、普通村寨社区和人口变迁较少社区四类，以普通村寨社区作为参照变量。

四、数据分析

(一) 社会信任状况

表3报告了居民社会信任的统计结果。从居民总体社会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得分为58.172分。在其内在结构方面，从特殊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得分最高，为70.969分；从一般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得分为54.719分，介于“可以信任”和“说不准”之间；从普遍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得分最低，为40.510分。这表明了居民的信任结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再分别以“亲友—同事—陌生人”为半径推开出去所构成的同心圆，由里到外构成了“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三个层次。信任度也由内到外逐渐降低，形成了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差序格局。综合而言，居民社会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分层状况。这也印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依旧呈现出“从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的差序格局状态，对家人的信任极高，对熟人的信任较高，对生人的信任依然很低^①。甚至有学者指出，当代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结构的“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特征^②。

① 张忠：《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特征与建设路径——基于第七波WVS数据的实证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59—69页。

② 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74—80页。

表 3 社会信任状况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总体社会信任	58.172	14.534
特殊信任	70.969	14.132
一般信任	54.719	14.872
普遍信任	40.510	16.161

(二) 社区居住格局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

为了厘清社区居住格局以及其他因素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情况，我们建立了 4 个回归模型。以社会信任因子为因变量，以社区居住格局为自变量，同时加入居民的性别、年龄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社区居住格局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

类别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标准误	B	标准误	B	标准误
性别 ^a	1.889 **	.826	1.861 **	.829	1.966 **	.821
年龄	-0.016	0.041	-0.018	0.041	-0.025	0.041
民族 ^b	-0.669	0.875	-0.747	0.893	-0.835	0.897
政治面貌 ^c	2.518 *	1.522	2.775 *	1.523	2.537 *	1.509
婚姻状况 ^d	1.851 *	.978	1.896 *	0.974	1.824 *	0.969
文化程度	1.341 ***	0.455	1.240	0.459	1.023 **	0.456
个人月收入	0.826	0.568	0.872	0.569	0.789	0.564
家庭经济水平	1.107 **	0.527	0.972 *	0.547	0.866	0.542
社区居住年限	0.025	0.035	0.027	0.035	0.035	0.035
地区类型 ^e	2.948 ****	.873	1.517 **	.979	0.609 *	1.014
社区类型 ^h						
普通商品房社区	3.591 **	1.464	4.422 ***	1.514	4.659 ***	1.502
旅游业影响较大社区	3.907 **	1.803	3.509 *	1.848	4.273 **	1.837
人口变迁较少社区	1.017	1.358	2.248	1.425	1.442	1.426
居住模式 ^e						
充分散居			2.380 *	1.430	2.476 *	1.432
散居为主			5.727 ****	1.573	5.732 ****	1.559
聚居为主			3.000 **	1.302	2.331 *	1.305
公共场所					0.186	0.327
社区组织					1.416 ****	0.342
常量	49.647 ****		47.392 ****		45.288 ****	
样本量	1423		1423		1423	
调整后 R ²	0.051		0.058		0.076	
F 值	6.685		6.302		7.324	

注：1.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2. 参照组（取值为 0）：a 为女性，b 为少数民族，c 为非党员，d 为未婚，e 为“充分聚居”，f 为“纯单一民族，其他民族比例极小”，g 为“民族自治地区”，h 为“普通村寨社区”。

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因素包括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地区类型、社区类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性别的回归系数为 1.966，与总体社会信任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信任明显增强。信任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在对社会对象产生信任时会存在潜在的损失，而由于男女的生理差异，导致女性在面对社会对象时潜在的风险会比男性更大，因此女性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提高了自己的信任阈值^①。同时，党员相对于非党员有更高的社会信任（得分显著提高 2.537 分）；已婚群体相对于未婚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信任（得分显著提高 1.824 分）；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社会信任都有显著提高（得分显著提高 1.023 分）。在地区类型方面，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呈现显著差异，相对于民族自治地区，非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要提高 0.609 分。在社区类型方面，相较于普通村寨社区，普通商品房社区与旅游业影响较大社区居民的社会信任度也有明显的提高，分别提高 4.659 分和 4.273 分。地区类型和社区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人口异质性对社会信任的塑造和强化作用。

同时，居住模式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影响比较显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充分聚居”的社区相比，“充分散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要提高 2.476 分，“散居为主，聚居为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要提高 5.732 分，“聚居为主，散居为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要提高 2.331 分。散居的居住模式在物理上为居民之间的日常交往提供了机会，通过日常交往，居民之间形成积极的个体态度，信任也由此发展出来。本文的居住空间假设得到证实。

在交往空间因素中，仅有社区组织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影响显著。社区组织的回归系数为 1.416，在 0.00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后，居民拥有的社区组织每增加 1 个，总体社会信任将提高 1.416 分，即社区社会组织越充足，居民社会信任越高。充足的社区组织为居民提供了交往交流的组织基础，共同的活动参与、共同的制度认可、共同的组织文化等因素都是信任的生发条件，这充分说明了社区组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以往的一些研究也证实，发达的社团组织，以及大量的中间组织有利于信任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自于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② 本文的交往空间假设被部分证实。

（三）居民社会信任的地区差异分析

在总模型中可明显发现地区类型变量是差异显著的变量，为了探讨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各自的作用逻辑，进一步分别建立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区居住格局与居民社会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后，在民族自治地区的居住模式方面，“散居为主，聚居为辅”的居住模式对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散居为主”相比于“聚居为主”的居住模式，居民社会信任度显著提升 7.150 分；而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居住模式并没有显著影响作用。在交往空间方面，民族自治地区公共场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而社区组织数量每增加 1 个，居民社会信任度会显著提升 1.460 分；非民族自治地区公共场所和社会组织的增加都能显著影响到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区分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总体社会信任模型中，公共场所是一个不显著的影响变量。但是在非民族自治地区模型中，这一因素的影响

①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23—39 页。

② 福山：《信任：社会德性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台北：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年，第 27 页。

作用却变得非常显著(公共场所每增加1个,社会信任显著提升1.078分)。可见,公共场所对社会信任的作用受到地区类型的影响,民族自治地区公共场所对社会信任的作用被其他或“显”或“隐”的结构性因素削减。正如其他研究指出的,信任的产生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以及交往双方的熟悉程度、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人格特质等密切相关^①。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有着相对不同的社会信任生成逻辑,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予以针对性考虑。

表5 社区居住格局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

类别	模型1(民族自治地区)		模型2(非民族自治地区)	
	B	标准误	B	标准误
充分散居	2.239	1.749	-1.331	3.413
散居为主	7.307***	2.418	0.127	3.695
聚居为主	0.254	1.579	0.094	3.446
公共场所	-0.550	0.485	1.078**	0.447
社区组织	1.460***	0.490	1.518****	0.473
控制变量	YES		YES	
常量	45.590****		49.111****	
样本量	852		571	
调整后R ²	0.077		0.091	
F值	5.030		4.531	

注:1.*P≤0.1;**P≤0.05;***P≤0.01;****P≤0.001

2.参照组(取值为0):a为女性,b为少数民族,c为非党员,d为未婚;e为“充分聚居”,f为“纯单一民族,其他民族比例极小”,h为“普通村寨社区”。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社区关系呈现出“陌生化”、“碎片化”、“淡漠化”等特征,信任关系缺失,共同体色彩不断减弱,社区的“熟人社会”开始消解,“陌生人社会”特征日益显现,使得传统社区精神逐渐消逝并陷入“共同体困境”,从而给社区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民族互嵌式社区通过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互嵌式建构,可以很好地促进和实现社区居民及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并维持不同民族间社会团结的结构关联^②。互嵌式社区居住格局试图改变不同民族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性,为族际交往及族际关系的改善提供空间基础。本文依托于族际接触理论,同时将个体要素、社区要素与社会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梳理出居住格局在社会信任生成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第一,居民社会信任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分层状况。居民的社会信任由内到外构成了“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三个层次,信任度也逐渐降低,形成了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差序格局。这与国内其他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结论相呼应。

第二,居民社会信任受到个体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的显著影响。在社区层面,居住空间是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充分聚居”的社区相比,不同程度散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有显著提高。在社会层面,社区社会组织对居民社会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组织越充足,居民社会信任也显著提高。

① 张云武:《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2—132页。

② 郝亚明:《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4—26页。

第三，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存在明显区别。社区类型中异质性程度较高、居住模式中的“散居”会显著提升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但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影响则不显著；公共场所所在民族自治地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但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却有显著影响；社区组织无论在民族自治地区还是非民族自治地区，都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变量。

上述结论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必须从社区居住格局上加强引导：既包括居住空间上的规划，也包括交往空间上的布局；既要强化制度政策的根本引领，也要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既要考虑信任机制生成的整体“共性”，也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结构“特性”。

首先，要充分利用居住空间对社会信任的形塑作用。国家需要从制度层面通过对人口政策、户籍政策、福利政策的完善，进一步推动各民族散杂居，强化社区居民的身份异质性，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群际接触和交流，从而提升社会信任度。有学者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正是党中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①。可见，要充分利用社区的“空间互嵌”为社会信任提供前提条件，才能进一步推动“文化互嵌”、“关系互嵌”和“心理互嵌”，最终打造出共同居住环境、共同身份认同、共同利益联结、共同价值追求的民族共同体。

其次，要大力强化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的引导作用。2018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和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强调要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2020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强调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组织通过让居民参与到方方面面公共领域的监管及实践，能够起到结构性地提升社会发育水平、弘扬公益精神、改善参与质量的作用^②。可见，要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急需强化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引导居民有序地进行社区参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组织基础。

再次，要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社会信任的差异化生成路径。社会信任是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间接生成的^③。由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互融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系文化与制度，也为社会治理带来了不同的优劣势因素。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地区的社区治理。相对于民族自治地区而言，非民族自治地区由于更高的身份多元性和异质化，削弱甚至消弭了居住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因此，民族自治地区要注重在社区居住类型上的进一步散居化，各民族成员的深度杂散居仍然非常重要；而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则要更强调保留充分的公共活动场所，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深度沟通提供条件。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的强力冲刷之下，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已经濒临瓦解，而新的社会信任机制的形成面临着全新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从“熟人社会”信任向“陌生人社会”信任的拓展是社会环境不断复杂多元、利益格局不断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未来面向。社会信任的产生既需要物理地域上的空间，也需要精神文化上的场域。因此，我国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利用居住格局的引导塑造作用，从居住模式、公共场所和社区组织方面有意识地进行制度设计，调动社区参与，提升群际信任，强化基层治理，助力我国新阶段社会建设的总进程。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王世靓、伍嘉冀：《信任视角下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证研究——基于青海藏区的调查分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96—101页。

② 潘泽泉、谢琰：《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结构与参与类型的实证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28—135页。

③ 杨慧：《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第77—82页。

新乡贤“告老还乡”：动力、困境及实现路径

费 婷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区委党校,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特有的乡村内生权威, 因其与乡村的天然联结而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乡村善治的现实需要以及人口流动周期的隐性推动, 促使新乡贤由内而外生出“告老还乡”的动力。在实践中, 新乡贤却面临着村民自治组织的有限接纳、“熟人社会”的消逝、乡民的质疑以及相应政策的缺失等困境。积极落实政策托底、平台培育和制度激励有助于破解该困境, 提升新乡贤“告老还乡”后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是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发挥乡贤力量的现实可行路径。

关键词: 新乡贤; 告老还乡; 动力; 困境; 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 D6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106-07

一、问题提出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我国乡村面貌实现了大幅度改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释放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信号。可见, 乡村的发展是关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时代命题。在各地纷纷寻求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时,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新乡贤^①作为新时代条件下特有的产物, 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②。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日渐加深,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 根植于浓郁乡土民情的乡贤文化是一块不该被扔掉的“传家宝”^③。

新时代下, 各地逐步将“新乡贤”参与治村作为乡村治理的一剂良方, 试图从中寻求乡村问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社科研究基地专项课题(145J036)。

作者简介: 费婷,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

① “新乡贤”是针对传统乡贤而言的群体称谓, 该名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绍兴日报》的《新乡贤倾情弘扬乡贤文化, 青少年“知、颂、学”乡贤精神》一文; 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钱念孙在两会上提出了让新乡贤“告老还乡”的建议, “新乡贤”一词正式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② 付翠莲、张慧:《“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行政论坛》2021年第1期,第53—58页。

③ 杨义堂、陈力、于宏文:《新乡贤回归》,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题的破解之道。面对乡村的期盼，新乡贤“心在身不在”，甚至因“久不在乡”而“心渐疏远”的尴尬逐渐暴露出来。相较于由于社会变迁与城乡结构重整而一心离开故土的年轻一代而言，老一辈新乡贤有一种名正言顺回归故土的方式，即“告老还乡^①”。然而，农村两委会的有限接纳、“半熟人社会^②”的陌生感、“污名化”历史的负面影响以及设施配套的短缺等都成为了横亘在新乡贤与故土之间的鸿沟。面对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和新乡贤显性或隐性的反哺家乡的渴求，如何最大限度激发新乡贤的内生动力，破解新乡贤“告老还乡”后面临的困境，找到真正让新乡贤顺利“返场”的实现形式，是当前乡村治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学者们关于新乡贤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分布在内涵（概念界定）、类别、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机理、困境、对策等方面。

在内涵（概念界定）问题上，学者普遍将新乡贤的特点集中在有财富、有能力、有威望、有情怀等几个主要方面，但是在具体表述上均有所差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固定的概念。有学者提出新乡贤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德才兼备、心系家乡、受人尊敬的人，具有地域性、先进性、内生性和非正式性的特点，^③有学者认为新乡贤是在乡土社会中拥有一定财富、技能、文化、品德和政治觉悟的人，^④也有学者认为新乡贤“新”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服务城乡融合、具备现代知识、具有法治思维，“贤”在能够在助力发展、引领风气、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作用，^⑤更有学者综合不同观点，规避了一些概念偏误，提出新乡贤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达人，^⑥这也是笔者认为对新乡贤概念界定得相对客观、全面的一种表述。

在新乡贤的类别划分上，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维度分析出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根据所在地域和能力层级不同，将新乡贤划分为在场精英、不在场精英、在场平民乡贤和不在场平民乡贤等四大类，^⑦有学者根据专长和领域的不同将新乡贤划分为德高望重型、退休官员型、致富反哺型、高知善举型、文化能人型和道德模范型，^⑧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是能为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做出贡献，无论是乡村能人，还是离乡的成功人士，都能视作新乡贤的不同类别。^⑨

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机理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在动力和内生动力两大类。

① 本文“告老还乡”并非封建社会传统意义上官吏的提前退休制度，而是在新的语境下新乡贤在满足各方面条件之后重回故土的一种形式。

② 黄爱教：《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理论月刊》2019年第1期，第78—84页。

③ 彭瑞康、周婉婉、吴雪玲：《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考》，《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5页。

④ 高万芹：《乡村振兴进程中新乡贤的类型界定、功能实践与阻力机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87—95页。

⑤ 钱静、马俊哲：《国内新乡贤文化研究综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51—55页。

⑥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0—29页、144—145页。

⑦ 高万芹：《乡村振兴进程中新乡贤的类型界定、功能实践与阻力机制》，第87—95页。

⑧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2期，第92—97页。

⑨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第20—29页、144—145页。

外在动力主要包括：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①、乡村振兴任务的呼唤^②、国家政策及各级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引导^③等；内生动力主要包括血缘、亲缘、族缘的维系，造福村民和自我救赎等。

在新乡贤回归面临的困境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社会和舆论的质疑，如村民受历史上乡贤遭受的“污名化”历史记忆而对新乡贤的动机存疑、由“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过渡让村民对乡贤失去信任^④；二是现实政策及保障的缺位，如现行土地、就业政策法规与人才安居、福利需求存在偏差^⑤，目前，新乡贤返乡后住房、养老等生活保障方面缺失。很大程度上，政策造成乡村精英的流失^⑥；三是新乡贤与基层组织待融合，新乡贤在现有国家政治体系中不可能把控基层权力，因此在参与村级治理工作时，首先村里的支部书记就会有顾虑^⑦，进而影响村级治理的效果。

在破解新乡贤回归困境的对策上，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是明确身份，合理定位新乡贤角色，扮演好治理中介者、资源组织者和文化引领者^⑧；二是搭建交流平台，推进乡贤组织化建设；三是政策托底^⑨，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另外，还有健全激励机制、加强人才培育、加大文化宣传等。

“告老还乡”的说法在我国古已有之，又称“告老还家”，特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提前退休的一种制度。从某种程度讲，它对于促进人力资源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会起到一定作用^⑩。而新时代的“告老还乡”，少了针对退休官员的特有指向性，泛指所有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因感怀家乡的哺育而重新回归加以回报的过程。对于鼓励新乡贤“告老还乡”，有学者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给农村注入发展活力，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等城市退休人员是最佳人选，他们不仅在城市生活大半辈子，吸收了先进的生活理念，而且具备相对丰厚的知识储存，有文化、有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退休人员脑海中还留着对农村生活的美好向往。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该项鼓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地仍要打一个问号。在他们看来，在工业文明和信息传播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文化的景仰、崇拜，已然被对文化的消费所取代，指望着过去年代温馨的乡贤文化重回现实生活，在农村地区重新出现一个全新的“乡绅阶层”，难度恐怕非常之大。

综上，学界关于新乡贤的研究虽然丰富，但大多倾向于乡贤回归的“前半篇文章”，对于乡贤真正“返乡”后的相关安置、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虽然也有学者涉足，但尚不够充分全面，还有充实、丰富的空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① 杨义堂、陈力、于宏文：《新乡贤回归》，第74页。

② 苏志豪：《新乡贤回嵌乡土的动力机理、阶段过程和功能发挥路径》，《理论导刊》2020年第12期，第69—74页。

③ 付翠莲、张慧：《“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第53—58页。

④ 黄爱教：《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第78—84页。

⑤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第92—97页。

⑥ 贺雪峰：《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5页。

⑦ 杨义堂、陈力、于宏文：《新乡贤回归》，第74页。

⑧ 苏志豪：《新乡贤回嵌乡土的动力机理、阶段过程和功能发挥路径》，第69—74页。

⑨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第92—97页。

⑩ 靳友成：《我国历史上的告老还乡制度》，《中国人大》2009年第15期，第50页。

三、新乡贤“告老还乡”的动力与机理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下特有的乡村内生权威，因其与乡村的先天联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拥有天然的优势。放眼现实社会，新乡贤“回归”却常常因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各级基层党委政府的政策吸引等而陷入被动，主体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同时，因外在条件而“返场”的新乡贤，其“反哺”故土的形式往往限于资金帮扶，并不利于乡村持续性发展。因此，要积极促成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动员—自发”的逻辑转换^①，充分激发新乡贤的乡土情结及价值观等内源动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等外源动力，最大限度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一）历史维度：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历史决定了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导致了“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百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集中居住，历来奉行“小家”——“大家”的“家国同构”社会秩序，对权威的遵从让拥有良好德行的乡贤在传统社会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阶级成分登上历史舞台，那些曾经拥有土地且具有良好品行的乡村“精英”、“权威”，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直到1979年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才撕掉身上的标签。经历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结构不断调整，乡村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税费改革后，政府的权力上收、服务下移，基层政府满足乡村各项供给的能力逐渐衰弱，乡村公共事业走向凋敝。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传统乡村价值观的式微，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给当代新乡贤“告老还乡”提供了可能空间。

（二）现实维度：乡村善治的现实需要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群体的权利得以扩展，同时也伴生着不少乡村问题。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同农村公共事业的不断衰落，让相当部分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空心村”现象出现并不断加剧，乡村土地大量抛荒，农业发展问题凸显。同时，委派到村级事务管理者头上的“必须要完成”的强制任务大大减少，对村级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要求也大幅度降低，可以说，在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乡村治理可以说采取的是“无为而治”，而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乡村必定“积压了很多矛盾^③”。而改革开放头三十年间，乡贤群体与乡村的远离，致使乡村失去了重要道德力量的约束，拉票贿选成风、赌博恶习泛滥、彼此信任缺失等问题不断涌现。乡村治理需要寻求一种既传承了传统管理观念，又富于现代理念的柔性治理力量，从而实现乡村的“善治”^④。新乡贤“生于乡、长于乡”，又拥有乡村之外的生活经历，可以说为乡村善治的实现提供了选择。

（三）内在维度：人口流动周期的隐性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各个社会阶层发展越来越充分，进而导致我国社会人口的大量流动，可以说，建国以后我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发生在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间^⑤。通过

① 付翠莲、张慧：《“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第53—58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③ 贺雪峰：《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第1—5页。

④ 俞可平在《走向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一书中指出：“善治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概念的借用，更是对当代西方 good governance 的借用，力图将中西含义结合起来”。

⑤ 桂华：《“乡贤”返乡，顺势而为》，《环球时报》2021年3月24日，第15版。

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带有显著的“家庭本位”色彩^①。这样的流动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人口流出往往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就学、就业、就医等,一个家庭中成员的流动总是以实现整个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国乡村的传统观念总是促使在外人员在拥有一定时间的域外经历之后“落叶归根”。对于在20世纪60—80年代外出的人口而言,内心的乡愁和乡情是促使他们“告老还乡”的原始动力,尽管半个世纪已然过去,原来的“熟人社会”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已愈来愈趋向于城市,而当代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乡贤“告老还乡”。

四、新乡贤“返乡”的现实困境

基层治理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庞大体系,任何一种单一的力量都无法收获全效。新乡贤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补充力量,在乡村“三治融合”治理模式中承担着“德治”的重要使命。然而,城乡结构的变迁导致从前的“熟人社会”已今不比昔,无论是乡村的基层自治组织还是广大的乡民,对于新乡贤“返场”的接受度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加上“半熟人社会”带来的疏离感和外在保障的缺失,构成了新乡贤“回归”的现实困境。

(一) 权力基础:基层自治组织对新乡贤的有限接纳

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时代结束,村民自治组织成为乡村权威,其中又以村民委员会^②为主要代表。这意味着,新乡贤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基层权力。新乡贤返乡,是一场“嵌入式”的“回归”。这种“回归”模式,容易让新乡贤陷入触碰政策界限的尴尬境地^③,而这种“越界”,往往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因新乡贤的身份合法性问题导致的村委会对其的抵触。村委会作为资源组织者和村级秩序的主导者,面对新乡贤的“嫁接”,常常会有被冒犯的戒备心理,这种警惕性对于新乡贤融入及发挥作用无疑是不利的;二是新乡贤对“越界”的敏感度决定了新乡贤组织的异化程度,而新乡贤对“越界”的容忍度越高,其对乡民可能造成的利益损害就越大。此外,在当下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村委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均已明确,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及村委会内部管理之外,新乡贤及其组织的管理将成为村委会的“额外工作”,这对于原本就满负荷运转的村委会而言,恐怕是又一重负担。因此,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的“排斥”是新乡贤回乡需要面对的第一道“关卡”。

(二) 情感基础:“半熟人社会”让新乡贤望而却步

费孝通先生曾以“差序格局”来形容与阐释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这样的结构与秩序同乡贤群体恋乡、乐于并善于处理村级公共事务的传统本性是相契合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当前的社会结构早已发生变化,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逐步向“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的社会基础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熟悉程度的不断下降,同时也是地方性共识的消逝,传统的乡规民约等道德约束力量日渐式微,更是乡民们治理乡村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丧失。基于此,新乡贤因对“乡里乡亲”的熟悉感而产生的对故土的眷恋会相应减弱,要共同建设家乡的情感共鸣也会相应降低,尤其是面对“半熟人”乃至“陌生人”们的评判,“返乡”后与村委会难以避免的工作交集会让新乡贤产生顾虑,群众舆论会直接影响新乡贤“反哺”家乡的形式与程度。

(三) 治理基础:乡民对新乡贤回归持观望态度

由于历史原因,乡贤群体在中国乡村社会也有过一段时间的“离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

① 吴晓华、张克克:《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中国城乡人口流动问题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第5—13页。

②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③ 黄爱教:《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第78—84页。

中国社会连年战乱，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乡村贤达因此流落各地。而国家为了弥补财政空虚，便将权力触手伸至乡村，通过培植代理人的形式对广大乡民横征暴敛。这类代理人成为了当时的“乡村权威”，但是与以德行服人的传统乡贤不同，他们在乡村依靠的是暴力和国家政权的授权，他们代表的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而非乡民的利益，这显然与传统乡贤“庇护一方、造福于民”的名节相悖。大量贤德人士因不愿附和权力而纷纷选择退出并远离乡村，土豪劣绅成为乡村权力的实际把持者，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乡贤被“污名化”。新中国成立后，土豪劣绅成为革命的对象，传统乡贤也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离场”。正是经历了这一“离场”，让如今新乡贤的“返场”充满挑战。部分乡民因为受限于受教育程度以及对事物的认知习惯等，难以摆脱传统乡贤被“污名化”的历史印象，难以理性区分不同时代的乡贤文化，对新乡贤“回归”的期待值下降，甚至质疑其为封建思想的复燃。从这个角度看，新乡贤在当代乡民中消除偏见、重塑权威显得任重而道远。

（四）政策基础：相关保障尚待完善

新乡贤“返乡”是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回归”，它不是传统乡贤的简单复活，而是传统乡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生。2014年至今，在国家层面不止一次提及新乡贤：2014年，中宣部要求新乡贤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在乡村扎根；2015年，《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到“乡贤文化”，并将其视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来源；2018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将新乡贤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限定在社会建设领域，明确其身份为社会治理参与者。可以发现，党和国家始终将新乡贤视为基层治理的一支力量。然而在现实实践中，相关政策总是点到即止，关于新乡贤的具体身份、权责界限等并没有给予明文规定。从颁布的各个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党和国家的目标和逻辑是让新乡贤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新乡贤“返乡”后如何安置的问题却并无过多阐述，而这恰恰关乎新乡贤参与治村的现实可行性。

五、新乡贤“告老还乡”的实现路径

（一）政策托底：强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新乡贤“告老还乡”是一场“始于情、终于行”的“回归”，正因如此，国家需要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确保新乡贤在“告老还乡”后的治村生涯有章可循。

1. 新乡贤的身份与角色亟待进一步细化明确。国家相关政策表明，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需要在基层自治组织的框架下发挥作用^①。新乡贤“返乡”后，不可避免将接触村级公共事务，并与村民自治组织及其他乡村治理力量产生交集，尤其是近年来，国家资源向乡村倾斜、服务向一线下沉，村两委经手的资源日益增多，只有充分锚准定位，明权确责，才能确保新乡贤在处理村级事务的过程中有立场、明底线。

2. 新乡贤“返乡”后的生活条件亟需政策保障。新乡贤回到故土，解决“住”的难题是首要之举。离乡数十载，“告老还乡”的新乡贤往往面临祖屋破败无法居住的境地。各地应积极探索方式方法，维护“返乡”乡贤的合法权益。基层党委政府可帮新乡贤在农村租房、与农民合作建房、租赁土地、合法继承父母老屋^②等，尤其应当借助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的契机，积极创新，提供帮助。其次要解决新乡贤“养”的难题。面对城乡公共资源的不平衡，“养老”问题恐怕是新乡贤“告老还乡”顾虑最多的问题之一。各地要注重在“养”上补齐短板，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网络覆盖、生活设施、远程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积极促成公共资源均等化，为新乡贤减少“后顾之忧”。

（二）平台培育：优化新乡贤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它的实现需要各个治理主体的协同配合。新乡贤“告

^① 桂华：《“乡贤”返乡，顺势而为》，第24页。

^② 刘木华：《吸引更多新乡贤返乡》，《人民政协报》2021年1月7日，第3版。

老还乡”不是单枪匹马作战，而是要融入到相互协同的治理格局当中去。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构建平台往往能事半功倍。

1. 搭建交流平台，发挥新乡贤“智库”优势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乡村治理需要不同的声音，仅仅依靠村两委难以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告老还乡”的新乡贤多为有能力的致富能人、退休干部、知识分子、退役军人等，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处事经验，在看待问题和分析事物上往往能相对客观、理性并具备独到性。各地应积极搭建桥梁，建立新乡贤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对话机制，充分发挥其地方“智库”作用。统一建章立制，成立区、镇、村三级乡贤参事会，定期召开议事会议；在镇（街道）、村成立以“告老还乡”新乡贤为主体的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室，让其最大限度扮演好新时代乡村“智库”角色。

2. 搭建招商平台，挖掘新乡贤“人脉”资源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内涵是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最大限度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国整体均衡发展。积极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充分挖掘新乡贤“人脉”资源，将民间资本与乡村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相互融合^①，可谓是助推均衡发展的有效手段。以“告老还乡”新乡贤作为推介嘉宾，为村子发展招引民间资本，促进城乡融合；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举办乡创大会，切实推动乡土、乡贤和乡创人才的全面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态势。

（三）制度激励：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情感认同

传统乡贤往往要经历“在地—贤于乡—被认同”三个互动环节^②，如今新乡贤所处的历史条件、城乡结构及社会秩序都已发生变化，“在地”和“贤于乡”并不能完全成为新乡贤的必备条件，而“被认同”则是传统乡贤与新乡贤的共性内核所在。各地要重视提升新乡贤的情感认同，切实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效度。

1. 以制度优化激发新乡贤自我价值感

新乡贤“告老还乡”是乡村的无形资产，需要将其“用”足“用”好，各地应当秉承遵循实际、因地制宜的原则改革宏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制定新时代“告老还乡”人员的聘任制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告老还乡”人员的余热，另一方面，可让“告老还乡”人员尽可能补充到乡村的教师、医生、技工等队伍当中去，充实基层力量。

2. 以精神激励提升新乡贤政治地位

“告老还乡”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相较于物质回报，往往更倾向于身份认同。各地要把提升政治地位、加强政治褒奖作为激励“告老还乡”人员的重要内容，如安排“告老还乡”人员列席村两委会，凸显在其中的议事地位，帮助其更好融入村级事务的研判与处理；在乡镇（街道）乃至更高行政级别开展相应表彰活动，注重从精神层面的嘉奖。

3. 以组织宣传增强新乡贤引领作用持续性

乡贤文化能带动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对乡贤文化及乡贤事迹的宣传亦是增强新乡贤情感认同和成就感的有效手段。各地要积极颂扬、宣传优秀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典型事迹，立标杆、树先进，切实发挥榜样人物的带动作用。应定期组织新乡贤与乡民恳谈会，为两者沟通交流牵线搭桥，帮助扩大“告老还乡”人员在乡民中的影响力，拉近与乡民的距离，加强“乡谊”联结。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金晓彤、左晓萌、赵雨柔：《我民间资本与农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73—79页、141—142页。

^② 黄爱教：《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第78—84页。

图书馆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有效服务路径研究

——以红河州为例

李 炜

(红河州图书馆,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肩负着重大使命, 乡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大工程, 必须跟踪其发展, 研究其规律。红河州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均衡, 尤其是乡村图书馆建设相对薄弱, 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有效服务中发挥效力不明显、不充分, 建议从体制建设、资源整合、业务指导和经费投入等方面加强乡村图书馆建设, 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公共文化; 图书馆建设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3-0113-08

2019年9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写道: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服务方式, 推动全民阅读,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①。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 明确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均衡发展”^②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 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精神, 也为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确定了新的方向和重点。

红河州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多元的民族文化资源富集于乡村, 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为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建立, 图书馆^③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 红河州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均衡, 尤其是乡村图书馆事业相当薄弱, 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有效服务中发挥效力不明显的现象比较突出。探索一条适合红河州图书馆发展的有效路径, 促进红河州建成独具特色且社会适应

基金项目: 红河州2021—2022年(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1ZC09)。

作者简介: 李炜, 红河州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①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 2019年9月9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9/content_5428594.htm, 2022年7月7日。

②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2021年6月10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3/content_5620456.htm, 2022年6月25日。

③ 文中“图书馆”均指公共图书馆。

性和现时应用性较强的综合型图书馆服务体系,不断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红河州公共图书馆概况

(一)红河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红河州辖4市9县,截至2021年底,全州共有公共图书馆14个,其中州级馆1个,县(市)级馆13个,少儿图书馆1个;全州13个县(市)建有13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141个乡镇(街道、农场)建有综合文化站,1343个行政村(社区)建成了集文化宣传、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100%,全州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已搭建完毕^①。

(二)红河州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情况

根据2017年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红河州建成了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镇文化站(社区)图书馆为分馆,各村委会(服务点)为基点的连接县、乡(镇)、村三级图书馆的服务网络。截至2021年底,红河州图书馆已建成县级图书总馆13个、分馆143个、服务点528个的总分馆制体系,形成总馆主导下的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和人员统一培训的体系^②。

(三)图书馆在红河州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特色服务

自2012年全面执行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以来,红河州各县(市)图书馆发挥各自优势,为当地公共文化发展作出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和贡献。

泸西县图书馆:曾经的辉煌——围绕特色产业培植需要,以“农文网培学校+合作社+农户”为运行模式,开展“农民素质提升工程”教育培训活动,把培训学校办成村民的业余学校,提高了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致富能力,推动了新农村建设。今天的创新——为5个镇3个乡配置“文旅一体”机、摄像头视频数据采集和客流监测系统,在红河州率先实现总分馆异地监测管理;三塘乡分馆尝试建立人脸识别免押金办证服务,建成全州首家自助图书馆分馆;新坝村图书服务点建于群众活动中心、村史馆之间,与村小学毗邻,较好地融合了村史教育、图书借阅、群众活动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相较普通乡村图书室对读者更具有吸引力。

弥勒市图书馆:全程参与农家书屋的管理和运行^③,积极开拓思路,率先在城市书房、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将分馆、服务点、农家书屋融入建设,将各类全民阅读活动、优秀数字资源延伸到各个农家书屋,农家书屋管理和服务水平在全州独树一帜。

石屏县图书馆:利用文献名邦资源优势,将分馆、服务点融合到景区景点建设,成功打造石屏县图书馆古城分馆,并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最美阅读空间”荣誉称号,在其中建立的儿童科普教育基地,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打卡地;通过丰富的阅读推广方式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创建“状元故里 书香石屏”品牌;优化县域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与各部门联合、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如利用村民聚会的小亭子、民宿等打造服务点;利用好上海对口帮扶,推动了从物质帮扶到全面有效的资源帮扶;建立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涵;吸纳社会志愿者,围绕“建、管、用”等关键环节,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乡村群众文化获得感。

建水县图书馆:重视在寒暑假及节假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阅读活动。携手当地妇联、乡镇分馆,对乡镇小学贫困学生、留守儿童开展“暖冬行动”志愿慰问服务,把“爱

① 数据来源为笔者调研数据。

② 数据来源为笔者调研数据。

③ 农家书屋管理运作权一般均在各地新闻出版局,而非图书馆。

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文明县城创建”及阅读服务送到孩子们身边，在乡村小学生心中埋下热爱阅读的种子；围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精心组织少年儿童喜爱的绘本阅读、优秀少儿电影展播、朗诵大赛等；在西庄镇分馆、团山村美丽乡村女子学堂开展“‘元’圆满满，‘宵’口常开”亲子活动，以故事讲述、亲子手工、游戏表演的形式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推广亲子阅读，体验读书之乐。

屏边县图书馆：设立“公职类考试备考资料”专柜，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公职类考试备考图书捐赠”活动，助力当地考生参加公职类考试；与屏边县民族小学、屏边县新华书店联合举办“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主题教育读书朗诵比赛，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引导师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河口县图书馆：利用边疆“国门”特点开展“国门文化”交流系列活动。“4·23世界读书日”期间，组织“书香国门”朗读活动，并发放《2021年“书香国门”读者朗读活动》资料，激发市民的阅读兴趣；7月建党节期间，组织读者及党员参加“书香国门”爱国电影观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先进典型现身讲”活动，请原河口边防官兵讲述对越自卫还击战经历；在农场开展“屯垦戍边（知青文化）”朗读活动，聆听老知青讲那过去的历史。

二、乡村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红河州公共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各县（市）基层图书馆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服务方式与内容不断创新，与此同时，乡村图书馆（室）受诸多主客观条件制约，尚处于“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对县（市）图书馆依赖性较强，全州城乡图书馆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

（一）体制机制不配套，乡村图书馆缺少专人管理

调研发现，红河州各级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不足的情况。乡村振兴外派驻村干部以及工作人员被上级机关借用是工作人员不足的主要原因。各乡镇（社区）图书分馆、村委会图书室（服务点）工作人员则多由乡镇、村委会干部兼职，部分乡镇、村委会图书室（服务点）因为缺少工作人员，不得不聘用临时人员，难以保障服务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工作人员身份性质与业务管理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乡村图书馆人员体制与工作机制不配套的局面。

表1 2021年红河州13县（市）图书馆从业人员及分馆、服务点调查表

单位名称	从业人员	实际在岗	分馆	服务点
个旧市图书馆	16	12	10	46
开远市图书馆	11	9	9	28
蒙自市图书馆	11	7	10	3
建水县图书馆	11	11	17	15
石屏县图书馆	8	7	10	118
泸西县图书馆	11	5	9	10
弥勒市图书馆	12	8	13	134
元阳县图书馆	11	9	14	18
屏边县图书馆	8	8	7	80
金平县图书馆	5	5	14	21
河口县图书馆	7	4	9	26
绿春县图书馆	4	1	9	10
红河县图书馆	5	5	13	19

注：表中从业人员与实际在岗数一致的，经核实，未减去驻村队员、外借人员等。

从表1^①可以看出,红河州各县(市)馆职工承担的分馆及服务点总数是职工实际在岗人数的1.7—19倍,特别是“南部六县”^②,实际在岗人数均为“个位数”,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北部七县(市)相比处于劣势,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与七县(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一方面是各级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足,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各乡镇图书分馆、村委会图书室(服务点)工作人员忙于乡镇或村委会本职工作,相当一部分乡村图书馆(农家书屋)存在着“有馆开不了”、“有书无人管”的现象。

(二) 财政投入不足,图书馆缺少吸引力

自2012年红河州普遍实行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以来,各县(市)图书馆业务开展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免费开放资金),但购书经费尚未完全纳入政府预算。由于乡村图书馆(室)经费有限,业务管理及活动开展依赖于县(市)图书馆的支持,而各县(市)图书馆免开资金使用没有统一标准且有很大的局限性,严重制约着对乡村图书馆(室)的业务输入,导致大部分乡村图书馆(室)设施设备严重老化,业务培训、举办活动贫乏,书籍、期刊品种少、更新速度慢,图书总量低,缺少吸引力。

表2 红河州13县(市)图书馆2012、2017、2021年财政收入情况调查

单位名称	2012			2017			2021		
	本年收入合计 (千元)	免费开放资金 (千元)	购书专项经费 (千元)	本年收入合计 (千元)	免费开放资金 (千元)	购书专项经费 (千元)	本年收入合计 (千元)	免费开放资金 (千元)	购书专项经费 (千元)
个旧市图书馆	1826		200	2964	180	124	2876	198	
开远市图书馆				1808	200	100	214.1	200	100
蒙自市图书馆				3205.12				200	
建水县图书馆	1264		30	1989	200			200	
石屏县图书馆	1057			1839	200	60	1828	200	90
泸西县图书馆				3487	200	220	2677.78	187	27
弥勒市图书馆							2502	187	
元阳县图书馆				469	180		2645.52	198	
屏边县图书馆	440		20	1436	200	50	1377	199	50
金平县图书馆							180	180	
河口县图书馆								200	60
绿春县图书馆				673	180	20	812.43	214	10
红河县图书馆				715	180		715	180	

从表2^③各馆财政收入可看出,除免费开放资金均得到保障外,各馆购书经费参差不齐,大部分县(市)馆至今没有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据各县(市)图书馆财政收入状况分析,2017年各馆财政收入达到建馆以来的“巅峰”,但自2018年机构改革重组后,不排除疫情等因素影响,2021

① 文中表格数据均取自13县(市)图书馆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文旅基3表”。

② 南部六县:指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屏边、河口六县。

③ 根据13个县(市)图书馆提供数据整理。

年部分图书馆收入甚至滞后于五年前。

表3 红河州13县(市)图书馆2012、2017、2021年举办各种活动、新增各种藏量调查

单位名称	2012				2017				2021			
	举办讲座	举办展览	举办培训班	本年新增藏量	举办讲座	举办展览	举办培训班	本年新增藏量	举办讲座	举办展览	举办培训班	本年新增藏量
个旧市图书馆	5	2	13	3089	16	10	1	4535	8		2	3688
开远市图书馆					36	12	26	8413	162	25	5	2500
蒙自市图书馆						3	2	20000	12	12	4	806
建水县图书馆	11	3	9	3029	5	15	41	7894	10			14208
石屏县图书馆					15	13	12	3556	11	10	6	38261
泸西县图书馆					9	6	10	12251	4	35	6	5581
弥勒市图书馆									11	11	1	6529
元阳县图书馆					16	4	3	1000	10		2	1500
屏边县图书馆			15	200		6	13	6847	2	17	7	1186
金平县图书馆									1	4	35	20
河口县图书馆									1	7	2	1230
绿春县图书馆					1	3	2	3160	4	24	4	14031
红河县图书馆					5	3	6		8	15	3	50

以2021年红河州13县(市)图书馆调查数据为例,从表3^①可知,图书馆新增藏量以及开展举办的各项活动所需经费与图书馆财政收入呈正相关。由于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各级政府专项拨款,所以,基层图书馆文献藏量与质量并不乐观,无论是纸质文献还是电子资源都严重不足。由于财政紧张,领导重视不够,购书经费得不到保证,每年采购新书很少,加上大多数基层图书馆馆舍容量小等因素,导致绝大多数基层图书馆馆藏规模小、馆藏资源陈旧老化、信息资源更新缓慢,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求。

(三) 读者阅读文化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逐年改善,增收致富渠道多样化,从书本获取知识改变命运的原动力小了很多。大批农民弃农离乡、进城务工,农村日常在乡人口锐减,老人、小孩成为红河州大部分农村的常居人口,这部分群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阅读的需求并不高。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网络进村入户,各种自媒体平台更新不绝,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呈多样化,人们更乐于接受有视听享受和有形表演的快餐式媒体平台,对于阅读态度冷淡,书上了架也是堆着。

(四) 阅读推广不够深入,各地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

红河州大部分乡村图书馆(室)阅读推广活动受当地经济、文化条件影响,不同程度存在受众面小,活动形式和参与者单一、阅读推广活动不均衡现象,特别是“边六县”大部分乡村图书室常年处于“无人问津”状态,公共文化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现象严重。

^① 表三数据由13县(市)图书馆提供。

（五）对图书馆的文化建设服务理念不到位

由于文化建设短时间内不能收到明显成效，容易导致地方领导“重旅轻文”，重视了旅游工作却忽视了文化建设。行动上的消极应付，业务上的疏于管理，导致大部分边远落后乡村图书馆（室）长期处于“荒漠化”，难以发挥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有效服务路径探索

红河州乡村图书馆（室）存在的问题多而杂，只有寻找其中规律，找出切合乡村实际，适合基层图书馆运作的服务路径，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作用，不断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

（一）深入推行总分馆制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文献集中配置，人员总馆管理，统一工作规范，文献通借通还”的管理体制，使基层图书馆网点与县（市）图书馆的关系由过去的松散型业务指导转变为紧密型业务领导，有利于发挥县（市）总馆直接全面领导本县（市）基层图书馆网点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效力；基层的业务经费和资源配置权上收，由县（市）馆全盘调度；网点管理由县（市）图书馆制定规范，或授权或派出人员实施规范管理。县（市）馆必须按照总馆的要求建设和强化自己，改变工作思路，树立整体思维，投入总分馆制服务网络建设中，结合政府财政能力、群众需求、地域优势、馆室条件等实际，梳理明确县、乡、村各级馆室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推行总分馆制，探索适合乡村群众的服务模式。

（二）解决乡镇文化站、村图书室体制机制不配套问题

建议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深入研判各级图书馆驻村干部履职情况，将各级图书馆驻村干部分配到乡镇文化站或乡村图书馆（室）从事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与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村干部一起，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既可尝试解决乡镇文化站、乡村图书馆（室）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不配套问题，又能使乡镇工作人员从兼职文化站、图书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投身本职工作，共同为乡村振兴提能增效。

（三）加大对乡村图书馆（室）的业务指导和队伍建设

各级政府要制定出台配套扶持政策，鼓励州、县图书馆下乡开展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提高从业队伍的职业素养，力所能及地帮助乡村图书馆（室）解决业务和人员技术问题，并纳入相应图书馆评估定级考核机制，将图书馆从上到下的连接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有实效。其次是开展馆际间互帮互学，挖掘自身动力提升业务指导和队伍建设水平。如“北部七县”可借鉴石屏图书馆图书增量、综合服务实力强等先进经验，“南部六县”图书馆可参考绿春县图书馆如何保持极高的图书增量，学习借鉴先进图书馆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增强服务乡村图书馆的效能和水平。

（四）确保经费落实

建议财政部门为乡镇图书馆（室）设立专项资金，每年做到早安排、早落实，减少资金拨付环节，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对于部分经济困难的乡镇、自然村要加大补助力度和配套资金支持。乡镇图书馆（室）要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扶持，争取相关经费和实物支持，如积极申报农家书屋以获取每年稳定的购书经费和藏书，向相关单位募捐各类文献资料、硬件设备、电子资源等。鼓励图书馆从业人员积极申报课题，开发文创产品等，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多渠道增加图书馆建设经费。

（五）持续开展全民阅读工程

1. 激励阅读，培养阅读习惯

将动员和激励阅读作为基层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常抓不懈。由于不断涌现的各类新媒体平台导致人们关注点经常发生变化，各级基层图书馆要主动适应不同环境读者的需求，在适当的条件下与各种媒体“共舞”，延伸阅读的功能和范围。探索政府主导、图书馆搭台的阅读激励机制、荣誉机制，打造适合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品牌的阅读活动，培养乡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2. 探索数字阅读，丰富阅读需求

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声读物“听读”已然走进了大众阅读空间。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利用碎片化时间，用耳朵完成“阅读”，这既为阅读提供了便利，也丰富了人们的阅读需求。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有声行业市场活跃用户规模达8亿人次，相比2020年的5.7亿人次，其增长速度、增长规模令人惊叹^①。此外，疫情防控期间公共文化服务“线下关门，线上开花”，提升了数字文化的供需服务。各级图书馆要积极创建数字阅读的条件和环境，增强乡村百姓对阅读的兴趣，不断丰富阅读需求。

（六）开展不同形式的资源整合

1. 建立馆际“联盟”，整合馆际资源

积极开展馆际间交流与合作，打破不同级别、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之间的限制，建立不同需求的“图书馆联盟”，如“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图书馆展览联盟”等，互通有无，实现馆际资源共享，扩大图书馆服务能力与影响。

2. 成立专家智库，整合人才资源

由州级图书馆牵头，政府授权任命，成立一支集权威、专业、高素质的专家队伍组成的“专家智库”。吸纳、整合全州各县（市）各部门的技术骨干、农科带头人、乡镇干部、司法工作者、教体文卫专业人员等优秀人才资源，面向乡村进行不同领域的教育宣传培训和智力扶持，拓展图书馆服务形式，丰富乡村服务内容，充分展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优势。

3. 完善志愿者队伍建设，整合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

一是充分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大中专学生“三下乡”、“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社会实践活动，吸纳年轻血液充实到图书馆日常工作中；二是主动吸纳返乡青年、热心公益的有志人士并颁发图书馆志愿者聘书，参与图书馆各项公益活动；三是为中小學生设置“小小志愿者”岗位，利用假期参与一些简单的图书馆工作，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公益事业、热爱阅读的习惯与品德，不断完善图书馆志愿者队伍建设。

4. 社会力量的资源整合

随着红河州“十四五”规划的不断深入开展，社会资源越来越丰富，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成为必然。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规范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制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办法、评估标准；鼓励利用多种方式，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活动项目打造、服务资源配送等，充分整合社会力量投入图书馆建设。

5. 深入开展捐赠书活动，整合社会闲置图书资源

发动社会各界、各级各类学校的开展捐赠书活动，实现闲置图书资源整合再利用。一是利

^① 杨凤：《未来我们可能会怎样阅读》，2022年5月8日，https://news.gmw.cn/2022-05/08/content_35717862.htm，2022年6月20日。

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网站等平台发布面向社会大众的捐赠书活动，不断丰富文献资源数量和种类，使资源能够涵盖农村各个方面的需求；二是有针对性面向全州各级学校毕业生发布教材教辅募捐，对乡村中小学贫困生开展爱心捐赠书活动，赋予闲置图书二次生命，实现乡村学子的阅读梦。

（七）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红河州乡村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图书馆可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或特色资源，提升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在景区景点、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开展图书馆特色分馆、主题图书馆、全民阅读流动服务点建设试点，为游客身心健康注入文化元素。收集、整理、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名胜、先贤哲人、历史文化、乡风民俗等文献资料，提升旅游产品文化品味，打造乡村文化名片，因地制宜探索图书馆和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八）推动图书馆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型，建设开放、智慧、包容、共享的现代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绝不能只限于文献服务的社会责任，而必须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正视红河州乡村图书馆存在的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推动图书馆功能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型。

一是为乡村的创新提供发展支持，如关注农民阅读需求变化，适时调整工作方法和目标，购买适合当地农科技术、产业发展的文献资料；二要定期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如外出打工青年的求职培训、农民农业产业技能培训、传统文化传承培训等，为当地个人发展和自我提升提供支持；三要深入挖掘和保护传统文化项目，强化图书馆在传承文明、弘扬优秀文化方面的价值与作用；四要努力建设管理规范、具有当地特色鲜明、与城镇融合共生的主题阅读场所，将乡村图书馆（室）建设成为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责任编辑：李亚强

云南社院“共识大讲堂”第1期开讲

7月21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再见做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共识大讲堂”，以“国家治理中的民主监督”为题作主题报告。学院党组书记蔡勇，常务副院长何云葵，一级巡视员袁光兴，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出席活动，副院长陈友康教授主持。



报告会上，钱再见从理论逻辑、政治逻辑、行动逻辑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中国国家治理中民主监督的理论来源、历史脉络、现实发展和实践路径。钱再见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实现机制。新时代，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的优势和作用，要在进一步明晰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定位和原则的基础上，以制度建设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建立健全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不断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友康指出，钱再见的授课既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也非常切合民主党派的履职实际，对我们更好地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我们要自觉系国之大者，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提升建言资政和专项民主监督实效，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立足优势、发挥作用、展现价值，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陈友康指出，钱再见的授课既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也非常切合民主党派的履职实际，对我们更好地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我们要自觉系国之大者，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提升建言资政和专项民主监督实效，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立足优势、发挥作用、展现价值，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22年民盟云南省委新任委员暨盟务骨干培训班、2022年民进云南省委新会员培训班学员，省级民主党派机关和统战团体干部，省社院全体教职工聆听了主题报告。

共识大讲堂，是云南社院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发挥联合党校作用，坚持用学术讲政治、用文化育共识，推动形成新时代统一战线教培工作新机制，精心打造的一个共识教育课堂。该讲堂的创设也是云南社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实施意见》、中共云南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的一项重要举措。

(文字、图片：念兴昌 责编：李亚强)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2年9月 第3期(总第95期) 第24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2年9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Sept. 2022 No.3 (Sum.95) Vol.24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Sept. 20, 2022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27

定价:9.00元